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BOYLSTON HALL
CAMBRIDGE, MASS., U. S. A.
OCT 21 1957

5061/5600.1

中國語文

总第60期

6

1957

1957年6月号(总第60期)目录

略論汉语構詞法張 寿 康 (1)

汉语复句学說的源流和解决問題的方法黎錦熙、刘世儒 (9)

再說“所以”的上古用法刘 冠 群 (14)

答《再說“所以”的上古用法》和其他楊 伯 峻 (16)

海鹽通圖方言的代詞胡 明 揚 (17)

試論北京語音的“声調音位”徐 世 荣 (23)

关于普通話音位程 祥 徽 (25)

汉语的声調在音位系統中的地位尹 仲 賢 (27)

尖音系統不應該恢复李 濤 (29)

清代的古音学創始人顧炎武(中国語言学史話之六)王 显 (31)

汉语盲文音素化和系統化的改进潘 山 (38)

語文短評 (42)

書刊評介

罗常培、王均:《普通語音学綱要》劳 君 方 (44)

岑麒祥:《普通語言学》力 山 (44)

王勤:《北京語音常識》茅 开 (45)

《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科学)》李学魯、張有一、肃父 (45)

信箱

也談关于介詞結構作謂語史 振 曄 (48)

一封討論文字改革的信关 錫、陈夢家 (48)

語文筆記

对《关于汉语構詞法》的几点意見唐君勳、繆樹晟 (13)

“連”字是助詞張 友 建 (26)

海南方言中同义字的“訓讀”現象詹 伯 慧 (封4)

动态

安徽省召开方言普查工作會議楊 長 礼 (24)

西南师范学院方言普查工作簡况翟 时 雨 (41)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举行座談会潘 慎 (47)

略論漢語構詞法

張壽康

構詞法是一種體系，它的研究對象是語言中的詞的構造系統，並闡明這種構造系統的內部發展規律。

構詞法是語法中詞法的一部分，它與語音學、詞彙學、構形法、造句法有極密切的關係。構詞法的研究成果可以給詞典編纂法、拼音文字的拼写法提供有力的參考性建議，因此構詞法同詞典學、拼写法也有很密切的關係。

古代的訓詁學者早已發現詞中的雙聲、疊韻、重言、變聲調等等的情況，這種發現應當說是屬於構詞法現象之列的。但是系統地探討詞的構造却是《馬氏文通》以後的事情。

幾十年來，在泛論語言學的專著、語法專著或者談詞兒拼寫的論文中，有許多談到構詞法的地方，給進一步探討構詞法的問題打下了基礎。《馬氏文通》中首先提出了構詞中的同義聯合、反義對待的類型^①，1913年胡以魯探討了漢語的構詞方法與梵文的六合釋作了對照，並指出了漢語構形方面的內容。^②劉復的《中國文法通論》按字的合音、合義、分體、复合劃了四種類型^③，1920年黎錦熙先生在詞類連書條例中比較細致地分析了名詞的構詞法。^④其後，瞿秋白^⑤、呂叔湘^⑥、王力^⑦、高名凱^⑧、趙元任^⑨、林漢達^⑩、陸宗達、俞敏^⑪、張志公^⑫、胡附、文鍊^⑬等都提出了自己對構詞法的看法或構詞法體系。最近一年來並有專論構詞法的論文發表，如陸志章^⑭、岑麒祥^⑮、邢公畹^⑯等人的文章；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漢語課本中也提出了構詞法的教學體系。這表明構詞法的研究已逐漸深化，進入了構詞法研究的新階段。

在深入探討構詞法的時候，有些問題是應當討論的，比如“構詞單位”與構形法、造句法的聯繫等等。現在提出個人一些意見向大家討教。

一 論構詞單位

構詞單位是詞素，不是字。

“詞”既是詞彙學研究的對象，又是語法學研究的對象，同時詞同語音又有關係，語音是詞的物質外殼。所以從各方面來概括詞的內涵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如果從各部門的角度來談詞的定義，就可以有不同的說法。

① 見《馬氏文通校注》30—140頁。

② 《國語學草創》，55—57頁。

③ 《中國文法通論》，54—57頁。

④ 黎錦熙的《國語講壇》，1921年版，附錄1—8頁。

⑤ 《瞿秋白文集》第三卷，712—724頁。

⑥ 《中國文法要略》，修改本，6—15頁。

⑦ 《中國現代語法》，上冊10—16頁，下冊188—232，299—314頁；《中國語法理論》，下冊151—195，256—268頁；《中國語法綱要》，23—32頁；《漢語講話》，39—44頁。

⑧ 《漢語語法論》，34—36頁。

⑨ 《北京口語語法》，22—30頁。

⑩ 《漢語的詞兒和拼写法》，91—135頁。又1955年4月和5月號《中國語文》的兩篇論文。

⑪ 《現代漢語語法》，28—37頁。

⑫ 《漢語語法常識》，5—13頁。

⑬ 《現代漢語語法探索》，52—73頁。

⑭ 《構詞學的對象和手續》，見《中國語文》1956年12月號。

⑮ 《關於漢語構詞法的幾個問題》，見《中國語文》，1956年12月號。

⑯ 《現代漢語的構形法和構詞法》，見《南開學報》1956年2期。

从語音·詞彙学的角度說，詞是声音和意义結合的最小語言單位，每个詞都有比較明确的意義，每一种意义都是詞(物質外壳是語音)給固定下来的。因此，詞是詞彙学中的最小語言單位，詞是詞彙学的研究对象。比如“噴”这个詞是用“pen”这个声音固定下来的，是“很猛地往外吐，像是放射”的意思。詞彙学就是用“噴”这样的东西(也許是两个音节、三个音节或更多的音节)作研究的最小單位，研究它們的意义、用法，研究是不是多义詞，有沒有同义詞、同音詞、反义詞，等等。

从詞彙·語法的角度說，詞是具有明确意义和一定形态的能自由运用的最小的語言單位。比如“噴”具有明确的意義，在語法上有特点，噴可以重叠說成“噴噴”，也可以用“不”否定說成“不噴”，重叠后当中可以加“一”，說成“噴一噴”，后面可以加“出来”、“出去”，說成“噴出来”、“噴出去”，可以肯定否定構成問句，說成“噴不噴？”，在語言中，并能自由运用。因此“噴”在語法上可以确定为動詞。語法就是研究“噴”这样的單位的变化規則和用这种單位造句的規則的，所以“噴”也是語法研究上的最小單位。

因此，从語音·詞彙学的角度給詞下定义則是“声音和意义結合的最小的語言單位”，从詞彙·語法角度給詞下定义則是“具有明确意义和一定形态的能自由运用的最小的語言單位”。

从構詞法的角度看，詞是由詞素構成的，比如“語言”是“語”和“言”两个詞素構成的，“噴”是一个詞素構成的，“人民”是“人”“民”两个詞素構成的。所以从構詞法的角度說，詞是“由詞素構成的最小的語言單位”。

詞素就是“構成詞的具有意义的構詞單位”。

詞素是構成詞的具有意义的要素，这种要素是語言随社会的發展按照自己的内部規律發展而形成的。換句話說，詞素是历史地形成的。

社会發展了，社会的事物繁复了，人的認識改变了，新事物产生了，科学發展了，語言就要随着發展，語言就要去标識这些新事物和新認識。于是語言的結構也就或多或少地随着起变化，汉语由古汉语的單音詞占优势發展为复音詞占优势，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比如“語言”中的“語”和“言”，在古代都是單音节的詞。許慎的《說文解字》解釋为“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刘熙的《釋名》說“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叙也，叙己所欲說也”(正是交际工具之意)，可見“語”“言”在古代都是單詞。然而在現代汉语中，“語”“言”这两个古代的詞合成为“語言”这一个詞，“語”和“言”在現代汉语中不再單独自由运用(古代“語”和“言”已有合用的事实，《論語》中“言語”已合用，《釋名》有“釋言語”一篇，这正証明“語”和“言”有合成的可能；現代汉语中一些古汉语的痕迹，如“何以言之”之类的說法，屬現代汉语中的古語遺存現象)。“人民”这个詞中的“民”，《說文》：“民，众萌也”(据段注本)，《孟子》上說：“則天下之民，皆願而为之氓矣”，可見“民”在古代是可以單独自由运用的單詞，然而在現代汉语中“民”已經不能單独自由运用了，“民”已經和“人”合成为一个詞。“人民”这詞中的“人”和“民”是“人民”这一詞中的構詞單位。“人”在現代汉语中虽然能單独自由运用，但在“人民”一詞中，“人”已經和“民”合成一个意义了(古代也有“人民”合用的事实，如《孟子》：“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这說明“人”与“民”有合成的可能性)。

但是，我們很明显地可以觉察出来，在“語言”、“人民”中，“語”、“言”、“人”、“民”都具有一定的意义(这种意义是古代的詞發展为現代的合成詞的历史繼承性所賦予的，虽然有的已經不能用古代的詞的意义来解釋)。这种具有意义的構詞單位，就叫詞素。

“子”和“兒”也是一种詞素，它們是由古代的詞發展变化而成的，是古代的詞虛化了的表

現，亦即質变的結果。

“詞素”是構成詞的具有意義的單位，因而是構詞法上的單位。但是如果從詞彙學的角度和語法學的角度來看，詞素既是詞彙學上的詞的構詞單位，也是語法學上的詞的構詞單位。“語言”合在一起構成一個詞，這個詞在詞彙學上是一個最小單位，同時在語法上也取得了名詞特點。“噴子”這個詞，用“子”變噴為名詞，在詞彙學上，“噴子”和“噴”有兩個不同的意義，在語法上，“噴”是動詞，“噴子”是名詞。

“詞素”為什麼不說成“字”呢？

我們先說清楚“字”是什麼，“字”是文字學研究的東西，“字”是文字的單位，也就是形體的單位。文字學要研究文字的發生和發展，研究字的結構和字體的變遷。它研究文字的本質和社會作用，研究文字改革的理論、步驟。比如說，漢字中的“卿”，它是“形聲字”，“虫”是形旁，“知”是聲旁，讀出的聲音是 zhi，等等。文字是紀錄語言的工具，是語言的表達符號，從這個意義來看，文字單獨不能表達意思，文字表達的只是語言的意義。文字並不就是語言，語言和文字各有特點，各有自己的發展規律，雖然文字同語言有密切的關係。

容易使人迷惑的是有時寫出來的一個形體，這個形體正好是紀錄了語言中的一個詞，或者是語言中具有意義的一個詞素。比如“火”在文字學上講，它是一個象形字，在語言上這個形體紀錄了語言中的一個詞（一個詞素構成），或者紀錄了“火車”中的“火”（一個構詞單位，詞素）。可見詞素和字是不容混淆的。

詞素是語言科學中的一個概念。平常我們用“字”這個聲音的時候，它表達的意義很複雜，比如“你這個字寫錯了”，這句話中的“字”指文字學上的“字”；“這句話里這個字用得不好，換個字好不好”，這句話中所用的“字”的含義是“詞”的意思。這是“字”的多義性造成的，日常對“字”的含義的了解並不等於科學上的概念。

在古代，“字”的意思是“形聲相益”，“孳乳而浸多”。這仍是指“字”本身的蕃衍說的，“字”蕃衍“字”，不是“字”蕃衍“詞”。蕃衍出來的“字”去表達語言中的詞。文字孳生文字，指由“知”孳生出“卿”、“痴”、“智”，等等。這些孳生出來的“字”，可能表達語言中的詞素，也可能不是語言中的詞素。

隨著語言科學的發展，“正名”這一工作是非常必要的。我們應當把“字”還給文字學，明確具有意義的“詞素”才是構詞單位，“名不正則言不順”，循名責實是有認識論的意義的。

二 詞素的分類問題

詞素的分類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按音節給詞素分類，可以把詞素分成單音詞素和多音詞素。比如“魚”、“語”、“民”、“言”等等是單音詞素，“潘查希拉”、“葡萄”、“沙發”、“徘徊”是多音詞素。

按詞素在詞中所含意義的虛實，可以給詞素分成實詞素和虛詞素。上文說過的“語”、“言”、“人”、“民”是詞中的實詞素，“画儿”、“噴子”中的“儿”“子”是虛詞素。

實詞素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可以單獨成詞的詞素，名為“獨用詞素”；一類是不能單獨成詞的詞素，名為“非獨用詞素”。

比如“火”是一個獨用詞素構成的詞，是一種意義，“車”是一個獨用詞素構成的詞，是一種意義。“火”和“車”合起來成為“火車”一個詞，這個詞是兩個獨用詞素構成的，產生了新的意義，組成了一定的結構。“人民”中的“人”是一個“獨用詞素”，“民”是一個“非獨用詞素”，兩個

詞素合成了一个詞,产生了一种意义,組成了一定的結構。“語言”則是兩個“非独用詞素”構成的。

虛詞素也可以分成兩类:前加虛詞素(老、阿,等等),后加虛詞素(儿、子、头、性、化,等等)。

实詞素在構詞时,一般地說,可以在前面同其他詞素構詞,也可以在后面与其他詞素構詞。像“語”,可以在前面構成“語言”、“語法”、“語义”、“語音”,在后面構成“俄語”、“英語”、“世界語”、“旗語”,等等。

構詞法中的合成詞可以分成兩大类:一类是实詞素与实詞素合成的;一类是实詞素与虛詞素合成的。实詞素与实詞素合成的分成“联合式”、“偏正式”、“支配式”、“述說式”;实詞素与虛詞素合成的分成“标志式”和“变詞式”。

詞素能不能按名、动、形分类,分成“名詞素”、“动詞素”、“形詞素”呢,我以为不能。所謂“联合式”等等都是就詞素的意义关系說的,“人民”、“語言”是联合关系,“飞机”、“冰凉”是偏正关系,“出席”、“討好”是支配关系,“心疼”、“眼紅”是述說关系。我們不必去分这些詞素的語法的类。这些詞素在詞中不会有語法上的类。詞类是根据詞彙·語法范畴划出来的,詞具有語法的外部形式,具有詞类的特点,而詞素在詞中就没有什么外部形式,因此只能从意义看关系,不能确定詞素的語法上的类。^①拿“学校”、“学生”这两个詞來說,其中的“学”我們不知道它是“学而时習之”的学,还是“古者七岁入小学”的“学”,但是我們知道它的意义,可以憑意义确定“学校”是联合式,“学生”是“偏正式”。詞中的詞素一般地說在古代都是單音詞,联合式中的詞的單位之間在古代經常是相互解釋的單詞,現在分析一下。

語言:“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說文三上)

法則:“法,則,常也”。(爾雅釋詁)

宇宙:“四方上下为宇,往古来今曰宙”。(三倉,小学鉤沉卷三)

比喻:“喻,譬諫”。(倉頡篇,小学鉤沉卷一)

嬰兒:“男曰兒,女曰嬰”。(倉頡篇,小学鉤沉卷二)

雷霆:“霆,霹靂也”。(倉頡篇,同上)

朋友:“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倉頡篇,同上)

游泳:“泳,游也”。(爾雅釋言)

忍耐:“耐,忍也”。(倉頡篇,小学鉤沉卷二)

誼誼:“誼,言語詢詢往來也;誼,言語讀誼也”。(三倉,小学鉤沉卷三)

算計:“算,計也”。(倉頡篇,小学鉤沉卷一)

捐弃:“捐、弃也”。(同上)

怀念:“怀、念也”。(爾雅釋詁)

懈怠:“懈、怠也”。(爾雅釋言)

宁靜:“宁、靜也”。(爾雅釋詁)

迅速:“迅、速也”。(爾雅釋詁)

辛辣:“辛甚曰辣”。(三倉,小学鉤沉卷四)

惊駭:“駭、惊也”。(廣雅,疏証本卷一下)

这些例子可以說明:1)詞素間的关系可以从意义看;2)詞素的意义是語言的历史賦予的;3)这种詞素在古代是詞。

把詞素划分成“独用詞素”和“非独用詞素”是有实际意义的。这种意义在“标志式”和“变詞式”中看得最明显。例如:

A. 标志式:

- (1) 椅子 桌子 瓶子 鼻子
窗子 帽子 稻子 姪子
- (2) 門子 头子 臉子 馬子 腰子
- (3) 石头 木头 骨头 瓶儿 鼻儿
- (4) 風头 肉头

B. 变詞式:

- 刷子 滾子 扣子 剪子 噴子
- 胖子 傻子 驢子 辣子
- 画儿 兜儿 盖儿 吃儿
- 看头 甜头 准头

^① 詞素还可以有意义上的类。

在标志式中，“子”、“儿”、“头”成为名词的标志，没有变词作用。在(1)(3)两行中，词中的实词素都是“非独用词素”，构成的词与实词素的意义无甚差异。(2)(4)两行，即“门子”、“脸子”、“风头”、“肉头”一类，词中的实词素都是“独用词素”，“独用词素”与“子”“儿”“头”合成之后，意义方面的变化很大，有的词带有严重的贬义，如“脸子”、“头子”、“门子”，有的意义上的变化(与独用词素的意义比较)就出了独用词素的意义界限，试比较“腰”和“腰子”、“风”和“风头”、“肉”和“肉头”。

在变词式中所有的词，词中的实词素都是“独用词素”，这类词素也可以进一步说成是独用词素构成的词，在变词式中，前一单位可以按词的语法分类来划类，即把变词式中的前一单位看作已经构成一个词，然后用加“子”、“儿”、“头”…的办法去改变前一个词的词类。如“喷”是实词素构成的动词，加“子”后变为名词，“辣”是形容词，加“子”后变为名词，“看”是动词，加“头”后变为名词，其余类推。因此把实词素分为“独用词素”和“非独用词素”，就能更进一步地窥探词的内部构造。

把实词素分成“独用词素”和“非独用词素”，还可以解决“词素”与“词”的界限问题。应当说明，“独用词素”是用词的语法定义划分出来的。

三 构词法同构形法、造句法的关系

构词法的研究对象是词的构造，构形法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词的词形变化；对汉语来说，就是研究词的重叠、增添辅助词(大部分是助词)、嵌音等方式所表示的语法意义。

两者同是形态学(词法)的研究内容，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在某些场合甚至存在两属的现象。但是正像《苏联大百科全书》《语法》条作者库兹涅措夫所说，“对于任何语言，划分构词形式和词形变化的形式之间的界限是很重要的。构词的形式指的是从同一个词根构成不同的词，(原注略；康按：在汉语中就是词素构成词的方式。)词形变化的形式指的是同一个词的各种不同的变化。词法范畴不但能够具有词形变化的性质，而且也能够具有构词法的性质”。

语言学者对构词和构形的认识不是一致的，有人把“子”、“儿”虚词素与实词素合成为词的现象解释为构形^①；有人把合成词中实词素与实词素合成为词的现象也算作构形。^②我认为实词素与实词素合成为词的现象是语言创造新词的现象，应当属于构词法。“子”、“儿”等虚词素同实词素合成为词的现象，经过上文的分析，知道“桌子”一类，“子”就是构词单位，“桌”是非独用词素；“脸子”一类，“脸”虽然是独用词素，但加“子”之后，应该认为词义上有了较大的变化而形成了另一个词；至于“扣儿”、“喷子”之类则是变词的现象(由动词变为名词)，不属于动词本身的变化形式。

汉语是有“词形变化”的，只是我们还须要进一步地加以研究。现在举动词为例来谈一谈汉语动词的构形法。

(一)动词可以用重叠的方式表示语法意义。汉语中单音词的动词几乎全部都可以重叠。双音节动词中又可分两类情况，一类是支配式合成动词，它的重叠式是“注注意”、“鼓鼓掌”、“看看书”，即“AAB”的形式；一种是联合式合成动词，它的重叠式是“研究研究”、“调查调查”，即“ABAB”的形式。支配式和联合式的动词中有一部分可以重叠。动词重叠后表示动作的“尝试即行”的情态。

① 如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

② 如赵元任的《北京口语语法》。

(二)單音节動詞和支配式合成動詞重叠后，还可以在当中嵌入“一”这个輕音节或嵌入“了”这个輕音节来表示語法意义。

“說說”可以变化成“說一說”，“鼓鼓掌”可以变化成“鼓一鼓掌”，表示加强的“嘗試即行”的情态。^①

“說說”可以嵌入“了”說成“說了說”，“鼓鼓掌”可以說成“鼓了鼓掌”，表示“嘗試完成”的情态。

(三)多数動詞可以增添輔助詞，利用輔助詞来表示語法意义(輔助詞都是虛詞素構成的)。

(1)加趋向動詞“起来”，如“他愉快地笑起来”，这个“起来”表示動詞“笑”的“开始”的情态。

(2)加助詞“着”，如“他笑着进来了”，“他注意着这个人”，“他跑着”，“着”这个助詞表示動詞的“进行”的情态。

(3)加趋向動詞“下去”，如“他說下去”，“我用心地看下去”，“下去”这个趋向動詞表示動詞“說”、“着”的“繼續”的情态。

(4)加助詞“了”，如“我看了”，“我讀了这本书”，“我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助詞“了”，表示動詞的“完成”的情态。支配式合成動詞还可以用“的”这个助詞表示“完成”和“已行”的情态。

如“我今天七点鐘起的床，八点鐘上的学，十一点鐘回的家，十二点鐘吃的飯，晚上九点鐘看的电影”。这个“的”就表示動詞的“完成”和“已行”的情态。

(5)加助詞“过”，“我去过这个学校”，“我参观过工厂，看过官厅水庫”，这个助詞“过”表示動詞的“已行”的情态。

(6)用“被”表示被动态，如“他被批評了”。“被”原是“介詞”，这样用的时候，是輔助性的助詞的性質。

動詞的構形法可以总结如左表。

从左表看来，可見汉语是有詞形变化的，汉语動詞的詞形变化并不是貧乏的。应该肯定表內的動詞的变化形式只是詞的詞形变化，并没有因为变化而構成另外一个新詞。

值得注意的是“前正后偏”式的動詞“打倒”、“記住”、“看見”一类。这一类的動詞比較复杂：

(1)“打倒”、“看見”、“記住”都是两个实詞素構成的，前一个詞素和后一个詞素合成为一个詞，这种现象不同于“看看”(重叠式)，也不同于“看下去”、“看过”(加輔助詞式)。不同于重叠式是很显然的，与“看过”不同的地方是“看过”不是“看”之外的另一个詞，只是“看”的变化形式，而“看見”、“記住”、“打倒”則是两个詞素合成的另外一个詞。因此，“看見”、“打倒”、“記住”属于構詞法，而“看过”、“看下去”属于構形法。

(2)“打倒”、“看見”、“記住”之类都可以在当中加“不”和“得”。加“不”是否定結果式，如“看不見”、“記不住”、“打不倒”；加“得”是可能結果式，如“看得見”、“記得住”、“打得倒”。但

① 有些联合式合成動詞，当中可以加“了”，如“研究了研究”。

是这种当中加“不、得”的形式与“看一看”、“看了看”也有区别。“看了看”、“看一看”和“看不见”、“看得见”，都是当中嵌音，这一点是相同的，“看了看”、“看一看”是动词重叠后的嵌音式，而“看得见”、“看不见”是两个构词单位中间的嵌音式，这一点则是不相同的。所以“看见”、“记住”、“打倒”这种合成词也就具有了当中加“得”（可能结果式）加“不”（否定结果式）的构形作用。

(3)“打倒”、“看见”、“记住”都是词，而“搞好”、“洗干净”、“说清楚”是词组。当中加“得”加“不”是前正后偏式动词的特点，也是偏正词组（洗干净之类）的特点，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它们之间的相同点，也看到它们之间的不同点。

另外像“白花花”、“热乎乎”之类的合成词，就其“白花花”同“白”不是一个词、“热”和“热乎乎”不是一个词的角度看，属于构词法。而“白花花”、“热乎乎”又确具有“白”“热”的“强调态”的意味，从这一点看，又具有构形法的意义。

庫茲涅措夫認為：“詞形變化形式和構詞形式在某些情況下是很複雜的，而且存在着值得爭論的情形”。^①上述“看見”、“白花花”兩類的情況就值得大家討論。

構詞法與造句法的主要關係，我同意陸志韋先生如下的說法。他說：“一個語言片段的內部結構有種種類型。一個類型，單就它的各部分的意義上的關係來說（着重點是我加的——壽康），可以是構詞法和造句法所同有的。”我覺得這樣說比“詞法的形式是澄清了的句法形式”這種說法還要明確。

前面談過的“聯合式”、“偏正式”、“支配式”、“述說式”，是就詞的內部的意義的關係說的，這種意義上的關係也是造句法上詞的組合的主要意義關係。然而應當注意的是，造句法以詞為單位，而詞是以詞彙·語法範疇劃定了的，詞具有了語法上的形式，因此詞的組合就不只憑意義，更重要的是外部形式。構詞法則不然，構詞法以詞素為單位，詞素雖然是歷史形式的，但是不能說詞素在詞內有什麼外部形式，只是以意義來看內部結構，因此詞中的詞素間的關係是從意義上看的（變詞式不在內）。不然，“飛機”、“雪白”、“瓜分”就不能說成“偏正關係”，要分別說成“動賓”、“主謂”關係。

注意構詞法和造句法的相同點和不同點是很重要的事情，只看到相同之處就等於取消了構詞法（詞也是詞構成的），只看到不同點就割斷了語言的各部門間的內部聯繫。

“獨用詞素”和“非獨用詞素”這種分法，可能解決“詞”與“詞素”間的劃分界限問題，但是它不能解決“詞”與“詞組”的界限問題。

什麼是“詞”，要從兩方面着手分析。一方面是從詞素這方面，讓“詞素”和“詞”劃開；一方面是句法（詞組）方面，讓“詞”和“詞組”儘可能劃開。

劃清“詞”和“詞組”的界限很不容易，因此有人認為“詞”和“詞組”的界限不必強劃。我們覺得“詞”和“詞組”的關係上的複雜現象還沒有完全揭露出來，應該進一步地加以研究。

劃分“詞”和“詞組”的界限，要確定原則和方法。我們覺得劃分“詞”和“詞組”界限的原則應當是“詞彙·語法”原則，即從詞的語法特點（形態、結構學上的特點）和詞組的語法特點（結構學）兩下着手，同時注意與語音·詞彙的關係。

規定一種語言單位是詞不是詞，主要的根據是詞組的語法特點。^②比如偏正詞組的語法標誌是什麼，“動賓詞組”的特點又是什麼，等等。規定了什麼是詞組，然後再回來看詞，也許可以好辦一些。

① 《語法·語言的語法構造》，人民出版社，19頁。

② 詞組的語法特點還研究得很不透徹。

划分“詞”和“詞組”的主要方法可以是“扩展法”。① 不过，我們觉得运用扩展法，要在上述原則指导之下来进行。比如，“的”是以名詞为中心的偏正詞組的标志法，那末：

木头房子=木头的房子

电車≠电的車

馬路≠馬的路

墨水≠墨的水

藍墨水=藍的墨水

茶杯≠茶的杯

茶杯盖儿=茶杯的盖儿

这样，用“的”驗證之后，可以知道“木头房子”、“藍墨水”、“茶杯盖”是詞組，剩下來的自然就是詞了。

“打倒”一类麻煩一些，“不”“得”既是詞的形态，也是詞組的标志。現在仍用詞的特点和詞組的特点来衡量，看一看“單位内部有沒有詞”。一个動詞或者形容詞都可以先肯定后否定来構成問句，如“說不說？”“美不美？”，同样，“干淨”、“好”、“清楚”可以說“干淨不干淨？”“好不好？”“清楚不清楚？”，因此：

看清楚 看得[清楚不清楚]

說明白 說得[明白不明白]

搞 好 搞得[好不好]

洗干淨 洗得[干淨不干淨]

这可以說明“看清楚”、“說明白”、“搞好”、“洗干淨”中的“清楚”、“明白”、“好”、“干淨”是“詞”，也就是造句的單位，而不是構詞的單位。再看：

看見 看得見不見(×)

建成 建得成不成(×)

吃完 吃得完不完(×)

記住 記得住不住(×)

“看見”一类的單位，沒有“×得×不×”的格式，这証明这类單位中的后一个成分不是詞而是構詞單位。

上列兩种类型的單位都有下列的第二种格式：

第一种格式

搞好

說清楚

看見

記住

第二种格式

搞得好搞不好？

說得清楚說不清楚？

看得見看不見

記得住記不住

第三种格式

搞得好不好？

說得清楚不清楚？

×

×

虽然第二种格式相同，但是内部結構是不同的，“搞得好搞不好”是“詞組”重叠構成問句；而“看得見看不見”是“詞”的重叠構成問句。加“不”加“得”，是这类詞和詞組的共同性，然而不同点也是很明显的。用这种方式来分析，“說对”、“吃饱”、“看透”就都是“詞組”。

支配式合成詞中，“裹腿”、“戒指”構成名詞，是詞不成問題。“出席”、“留神”可帶賓語，詞的特点也显著，一些文言詞如“失色”、“洗塵”、“越軌”也無問題，構成形容詞的如“吃香”、“抓瞎”也無大問題。有問題的是“革命”、“跳舞”、“洗澡”、“鞠躬”一类。这类單位，我同意赵元任先生所說“这种結構的性質介乎造句和造詞之間”的說法。

这一类可以命名为“离合動詞”，因为这一类詞在句法上經常作一个成分。如：“我洗澡了”，这句话中“洗澡”作謂語而不是“洗”作謂語，“澡”作賓語。可是他們的内部構造用“詞”的語法特点去衡量，就又合于詞組的資格。所以这类用支配式構成的“离合動詞”，合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詞”，拆开来用(如跳了一个苏联舞)的时候是一个動賓詞組。

構詞法和造句法之間的关系是复杂的，在研究过程中应当注意原則，同时要有相应的方法，这样才可能研究出它們之間的不同点和它們之間的内部相制約、相联系的本質。

① 見陆志章《構詞学的对象和手續》，《中国語文》1956年12月号。

汉语复句学說的源流和解决問題的方法

黎錦熙 刘世儒

一 汉语复句学說的源流和术语

第一部系統地講汉语語法的是馬建忠的《馬氏文通》(1898)，因此，談“复合句”的源流，須要从这部書談起。

馬氏認為：“句与句或自相联屬”，可以“試別其式為四”(校注本頁544)。哪四式呢？

一、排句而意無軒輊者。其例：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

二、疊句而意別深淺者。其例：

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左傳，隱公元年)

三、兩商之句。其例：

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史記，淮陰侯傳)

四、反正之句。其例：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史記，秦始皇本記)

不难看出，馬氏的“四式”，其實都是屬於“等立复式句”的。① 說到“包孕句”、“主从句”，馬氏則認為只該屬于單句。例如：

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論語，公冶長；云：“用為起詞者”)

孰謂鄆人之子知亂乎？(論語，八佾；云：“用為止詞者”)

王無異于百姓之以王為愛也。(孟子，梁惠王；云：“用為轉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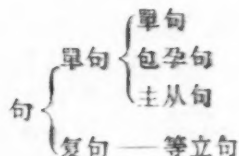
馬氏認為這是“讀”②(子句或短語)之“用如名字者”，可見他把包孕句歸入單句了。又如：

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誰讓項羽，沛公幾殆。(漢書，樊噲傳)

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史記，李將軍傳)

馬氏認為這是“讀”之“用如狀字(副詞)者”，可見他把主从句也歸入單句了。

總括馬氏的复句体系，可如下式(凡不加着重點的都是舊用术语，不是原作者的术语)：



严复氏的《英文汉詁》(1904)的复句体系，基本

上是比照着一般英語語法書塑造出來的。他的复句体系是这样：

一、合沓句。他說：

有数簡句，积迭排比，然又各自立，輕重相等，而挈合字为之連續者，則其句法為合沓之句(頁159)。其例：

花好月圓人壽。(頁160)

顯然這就是“等立复句”了。

二、包孕句。他說：

一句之中，函區別(形附)、疏狀(副附)諸子句，或以短句為句主(主語)、為受事(賓語)者，是為包孕句法(頁159)。其例：

I know that he did it. (我知道他做過那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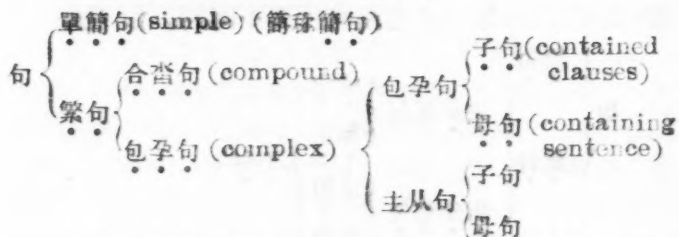
這是“實字子句”，“代實字用者”(這例就是“乃同一受事名物”者)。

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簷花淺水邊。(頁169)

我欲仁，斯仁至矣。(頁168)

這是“疏狀子句”，“其用同于疏狀字者”(頁166)。顯然，严氏的包孕句把主从句也都給包括進去了。這和馬氏的說法，實質上還是一樣的，只不過馬氏把包孕、主从一同歸入單句，严氏把它一同歸入“繁句”罷了。

严氏的复句体系可总括如下表：



到了《新著國語文法》(1924)才開始把复句析為三大類：

一、包孕复句(頁250)，“母句”包孕着“子句”，子句只當母句中的一個詞看待。其例：

他不來是一件怪事。(用作主語名詞的子句)

我不知道他往哪兒去了。(用作賓語名詞的子句)

天資聰明的學生很不少。(用作形容詞的子句)

① 馬氏于四式之外，還談到“結句”“起句”。該歸何式？馬氏只說“迄無定則”，以不了了之了。

② 馬氏的“讀”，照定義，“凡有起詞、語詞而辭氣未全者曰讀”(頁521)，該是等于現在所常說的“子句”“从句”之類，但有時“短語”亦多混入，如對“愈來京師，于今十五年……”(上學倫書書)云：這是“記時之讀”，類似這類的例子很多，顯然和定義不合。

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說个不了。(用作副詞的子句)
二、等立复句(頁265)，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句，彼此聯絡，平等并立，互為分句。其例：

風息了，雨也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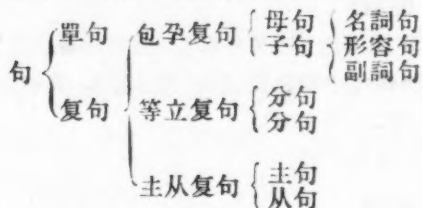
牙齒時常咬痛舌頭，但是他們終究是好朋友。

三、主从复句(頁282)，不能平等并立，一為主句，余為从句。其例：

我今天因為天氣不好，沒有出門。

如果我能够办，我一定办。

現在也把它的复句体系括為下式：



1929年刘复氏的《中国文法通論》出版了。它的出版虽然是在《新著國語文法》之后，然而它的复句体系，却还是因襲《英文汉詁》的。它給复句所下的定义是：

凡以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子句合成的文句，叫作复句 (complex sentences)；不是这样的，就叫作簡句 (simple sentence) (頁74)。

据此，他把汉语的复句分成：

一、主从复句(sub-complex)，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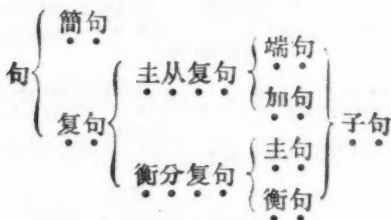
我知道他一定来。(頁74)

假使他要来，我一定去。(頁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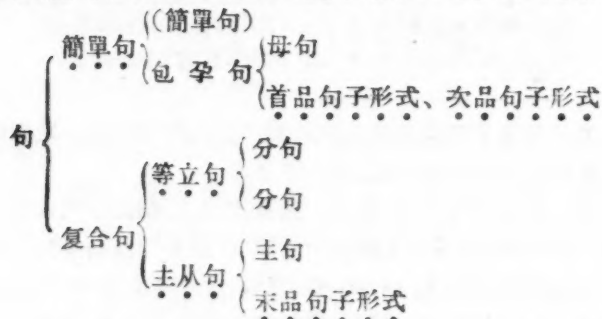
二、衡分复句(co-complex)，如：

礼义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后丧喻前丧。(頁77)

不难看出，刘氏的复句体系，除了术语不算外，内容上和《英文汉詁》是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如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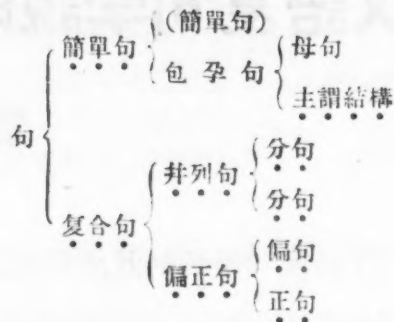


王力氏的《中国語法理論》(1943)的复句体系，一方面贊成《新著國語文法》把主从句和包孕句分开，另一方面却又主張把包孕句归入單句(頁67)。这样，它的复句体系就只有兩大类了(頁115)。如下式：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的《語法講話》

(1952—1953)的复句体系，基本上就是《新著國語文法》、《中国語法理論》的复句体系的綜合，看下式可知：



《汉语語法教材》(1953—1955)的复句体系，基本上也是这样处理的，但也有不同。那就是它对于包孕句的“跨类”的处理法。^①看下式：



最后还要談到的是呂叔湘氏的《語法學習》(1953)。这書的复句体系和以上各家的都有不同。他一方面認為复合句从結構上不能分出等立、主从的类系来，他說：“講复合句的結構，一方面是看各分句的主語的同和不同，省略和不省略；另一方面是看各分句之間用些什么詞語来連接”(頁77)。另一方面他認為，这种类系(等立、主从等等)的区分，純然是以“分句和分句中間的意义上的关連”(頁77)，也就是所謂“意念的关系”(頁83)为依据的。比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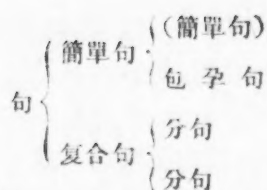
云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雪有亮光，山也有亮光。
(頁85)

倘若你不肯，我也不叫你为难。(頁88)

从“意念的关系”上看，这两句是有区别的，那就是前句是“比較”而后句是“假設”；如果从“結構”的关系上看，那这就只能是一类即复合句了。按照“这里講复合句，限于結構方式”的办法(頁77)，这書的复句体系可总结如下式：

① 《語法教材》說：“复式句共分三大类”，等立句、主从句、包孕句。又說：“包孕句基本上只是个單式句”，但“它是一个母句包孕着子句的；既多了个子句，就不止一句，所以归类于复式句”，这就使包孕句跨类了。(參看頁974)

又，最近曹伯韓先生似乎也很傾向于此說，參看本刊1957年4月号《談談包孕句和單句复句的关系》。



这就等于把汉语中复句从结构上再分类的可能性一律给否定了。

从1898年到1953年,中间大约经过有55年之久,在这一期间,大家对于汉语复合句都曾经或多或少地进行过研究。其中有些问题还有待于继续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里讨论。

二 问题的发生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粗略地把汉语复句的各家学说作了一个大致的介绍。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家对于汉语复句的体系,在很多问题上,意见还是有不同的。大致说来,这些不同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下边三个方面:

(1) 包孕句和主从句应该厘而为二,还是合而为一?

(2) 包孕句和主从句应该归入单句还是复句?

(3) 复句内部再分类的标准应该是什么?

这三个问题如果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剩下的枝节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先谈第一个问题。包孕句和主从句应该厘而为二,还是合而为一?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看看这两类句型在语法构造上究竟有没有足以使它们彼此互相区别的本质特征。有,那就应该分属两类;没有,那就应该合为一类。这里有的只是合不合语言的客观事实的问题,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问题。

包孕句和主从句有哪些异同之点呢?从本质的特征上看,我们以为至少有下列几点是应该指出的:

(A) 相同之点: 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小句子构造成的。

(B) 相异之点:

一、包孕句的子、母句中不存有连词范畴①,

例如:

我知道[?]他一定来。

主从句不然。它的主、从句中间存有连词的范畴②,

例如:

假使他要^去,我^{一定}去。

当然,这种连词有时也可以不用,如:

[如果]他^不去,我^也不去。

然而这只是不用,不是不能用,和包孕句的子句、母句中绝对排斥连词不能混为一谈。可见包孕句的子句和母句,它们是铎在一起的,浑成的;主从句的主句和从句,它们是拆在兩起的,分开的。

二、主从句的主句和从句,就其内部的构造看,都是具有相对的句子完整形式的,如:

假使他要^去,我^{一定}去。

包孕句不然。它的母句(主要是名词性子句的母句)作为一个简单句来看,常常是残缺不全的,甚而是不能成其为一个句子的:

我知道[他一定来]。

这是[毛主席领导得好]。

[他不来]是一件怪事。

单看“我知道”和“这是”,这就缺少宾语和足语了;单看“是一件怪事”,这就不成其为一个句子了。

三、包孕句的子句可以作为母句的一个句法上的成分,如上例,“他一定来”,这就是宾语成分了;“他不来”,这就是主语成分了;“毛主席领导得好”,这就是足语成分了。主从句呢?不行。如:

他若不去,我也不去。

这就难说“他不去”也是“我也不去”这个单句中的一个成分了。

四、包孕句(主要是由形容词句和副词句所构成的包孕句)的子句和母句间,可用“特用介词(的、地、得)来结合,如:

大禹治水的传说是很早就有了的。

大家步伐整齐地走。

他说得我也笑了。

主从句在从句和主句间绝对没有这种可能。比较:

假使他要^去[地],我^{一定}去。

五、凡由形容词句或副词句构成的包孕句,在子句、母句间不能有任何性质的语音停顿。主从句在从句和

① 严复、刘复二氏也看到了这点。严氏说:“中文句主与谓語,常須切密而后意显,不能如西文之無妨悬隔”(《英文汉诂》頁164)。刘氏说:“在西文中,往往用一种形式词(form-words),做加句的記号,如英文中,最通用的,是that一字。中文里并没有这种形式词”(《中国文法通論》頁74)。可惜他们还是把它归入复句,这就未免是不以语言事实为憑了。

② 金兆梓在他的《国文法之研究》一书中认为:“合两个以上的子句所成的文句,就叫他为复句”(頁107)。其例:

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为柔。(頁106)

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郑。(頁108)

这都是由“主从句”联成的复句,也就叫主从复句”(頁109),这就可见他也是把主从句、子母句混为一谈了。尤其使人吃惊的,就是他认为“凡两子句以主从关系相合,则必有介词(按即主从连词)做一个联合标帜”(頁109),人们不能不问:像“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为柔”这类的包孕句中究竟能用上什么样的介词,而且必有介词为联合的标帜?这种一味比拟印欧語的学风,在当时是不足为怪的,但在今天重提就更不好理解了。例如本刊1956年10月号宋祚胤同志的《論所謂从属連詞的詞性和它們在复合句中可用可不用的問題》就主張仍照馬氏、金氏的办法,把主从連詞統統納入介詞,就是很值得商榷的。

主句之間則沒有這種規矩。①比較：

包孕句 { 大禹治水的，傳說…。
大家步伐整齊地，走。
他說得，我…。
主从句 { 假使他要，我一定去。
如果天下雨，我就不來了。

當然，主从句也有可以不停頓的，如：

他不去我也不去。

人家“要”翻了臉咱怎麼辦？

然而這也只是不用，不是不能用，和那些子句、母句中
間絕對排斥停頓還是不能並為一談的。

由此看來，包孕句和主从句不同之點是多於相同
之點的。靠着這些本質不同的特點，它們是可以彼此互
相區別開來的。因此像馬氏、嚴氏、劉氏等都把包孕句
和主从句並為一談（馬氏並為單句，嚴氏並為“包孕
句”，劉氏並為“主从句”，見前節），顯然是不妥當的了。

再談第二個問題。包孕句和主从句應該歸入單句
還是複句？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要先弄清楚另一個問
題：包孕句和主从句的界限何在？按王力氏的意見，凡
包有“名詞句”或“形容句”的統歸包孕句；凡含有“副詞
句”（不包括後附的“副詞句”）的統歸主从句。他說：

一、包孕句里，只能包含着首品句子形式，和次品
句子形式（中國語法理論，頁111）。

二、複合句里，它能包含着末品句子形式和等立的
句子形式（頁112）。从句可稱為末品句子形式（頁67）。

第一條所說，沒問題，第二條所說就有可商之處。
果然照這個原則貫徹下去，像下邊的句子：

主任“嘴快”地說。

大家“步伐整齊”地走。

仙女們就“你拉我、我拉你”地飛到人間來。

豈不都應該劃歸複合句？因為這兒所包含的分明都是
“末品句子形式”呀！然而這種類型的句子，它之不應該
或不可能歸入複合句又是顯而易見的。除了在（1）項
中已談到一些理由外，這兒還可以再作一個比較：

隊伍“步伐整齊”地走過去了。

“步伐整齊”的隊伍走過去了。

从句法組織的特徵上考查，我們實在看不出這兩句為
什麼第二句就該判歸“包孕句”（簡單句）而第一句就
該判歸“複合句”（主从句）！就因為第一句所包含的是
“末品句子形式”而第二句所包含的是“次品句子形式”
么？顯然地，這種分界的說法是難以站住腳的了。

那麼包孕句和主从句應該怎樣分界呢？前邊已說，
凡小句子和小句子之間不存有連詞範疇，並且這些小
句子之間其中有一個或幾個小句子可以被劃定為另一
個小句子的句法成分的，就該歸入包孕句；否則，相對
地就該歸入主从句。

包孕句和主从句的界限既定，剩下的問題就是它

們該歸單句還是複句的問題了。包孕句應該歸入單
句，就漢語的句法組織特點看，是顯而易見的。最主要
的理由就是因為在它的內部——子句和母句的接榫處
是絕對地排斥任何從屬性質的連詞的。這正是單句各
成分在組合上的特徵所在，所以咱們就沒有理由不把
它歸入單句了。②《馬氏文通》把包孕句歸單句，原本
是對的，問題只在誤把“主从句”也混為一談；《新著國語
文法》把包孕句從主从句中獨立起來，自成一類，是看
清了漢語句法組織的特點的；可惜仍把它列為複句就
又不妥了。③嚴氏、劉氏既把包孕句和主从句混為一
談，又都籠統地列為複句，這純然是比照西文的分類
法，其不妥更是顯而易見。王力氏除在包孕句和主从句
的劃界上還有些不妥外（已見上），一般說，把包孕句歸
入單句卻是正確的。近年來講語法的，如《語法講話》、
《語法學習》都承認包孕句該歸單句，看來在這個問題
上大家的意見已很接近，這就用不着多作討論了。

主从句呢？當然該歸“複句”。理由在前邊已說過，
主要就是因為它的內部，在主句和从句之間存有連詞
範疇，从句不能被劃定為主句的句法成分。（不能用
“的、地、得”來連接，不能用名、代詞來重指，這些都
是可借以幫忙鑒定的。）馬氏把主从句也都塞入單句，和
一般包孕句相提並論，顯然是不能成立的。——無怪
這種說法一直沒有人敢於相信，到現在幾乎成了一
種“絕學”，既然如此，也就不必多作討論了。④

① 王力也說：“末品句子形式比首次品句子形式更富於
獨立性”（《中國語法理論》頁114）。但這句話還有毛病，如
“他嘴快地說”，“嘴快地”也是“末品句子”，將何以“獨立”？

② 參看劉世儒的《試論漢語中單句複句的區分標準》，
見本刊1957年5月號。

③ 《新著國語文法》說：“主句就相當於母句，从句就相
當於子句。但何以不照包孕句一樣定名為母句、子句呢？須
知主从句的關係，是主句統率从句，从句跟隨主句，兩者還
是異體的；不像包孕句，母句包孕子句，是合體的”（頁282）。
這實質上已承認包孕句是單句了。把主从句和包孕句明確
地劃分開來，這是《新著國語文法》在複句學說上的新貢獻。
後來王力諸氏把包孕句歸入單句，就只是改換名稱和系屬的
工作了。

④ 只有金兆梓的《國文法之研究》，還運用着馬氏的這
種“絕學”。他說：“本書中却把主從聯詞隸入介詞”（頁100）。
“不論介字或介句，只要是表主從的關係，都叫他介詞”
（頁86）。這就和馬氏的說法完全相同了。但馬氏把“用如
狀字者”的“讀”，其前連詞也統歸入“介字”，因而把這種句子
也統歸入單句，還能自圓其說；而金氏則認為，“凡兩子句以
主從關係相聯合，則必有介詞做一個聯合標幟，而這種子句，
也就叫做主從子句，所聯成的複句，也就叫做主從複句”（頁
108），這就不可理解了！介詞是單句範疇中的關聯詞，複句中
也叫介詞，那麼單、複句又將怎樣區分呢？

下边是第三个问题。等立句和主从句的划分标准是什么呢？这是近年来发生的问题。它的能否得到解决，直接牵涉到复句的能否分类的问题。毫无疑问，汉语的复合句在语法上是可以再划分成若干类的。很难设想：汉语复合句只能从“意念的关系”上分成若干类，而这些所谓“意念的关系”上的类在语法上不能得到相应的物质的表达手段。^①

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汉语复合句的分类可以只依据语法形式，而不必照顾逻辑，那显然也是行不通的。“我们应不以形式主义的定义与形式上的特征为根本依据，而应以这种或那种句法结构的意义上的相互关系、不同的意义与情味、以它们的功能为根本依据”。^②

形式和内容、语法结构和逻辑关系不是对立的，是密结不可分的。偏废任何一方面都是不能解决汉语中复合句分类的问题的。说到这里，“汉语复合句内部再分类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现在请再总结一句话：语法·逻辑范畴就是汉语复合句内部再分类的标准。

至于复句到底怎样分类和可以分为几类等问题，当再撰文讨论。

① 除了正文所说的理由外，还可以再补充两点：(A)大家知道，等立句、主从句所用连词不同，基本上就说明这两类

句子，在汉语中是可以划分得开的。既然承认“看各分句之间用些什么词语来连接”可以作为“讲复合句的结构”的条件之一(頁 77)，那么，又断言汉语的主从、等立各种类型的“分类”只能是各种“意念的关系”(頁 84)，这就未免自相矛盾了。(B)按照吕叔湘氏的意见，词组是可以“按它的内部关系来分类，仿语可以分成两类”(見頁 17, 71)：

“联合仿语——它的构成部分是平等相联的；例如‘你和我’，‘或多或少’，‘迅速而巧妙(地)’。”

“主从仿语——由一个基本词和一个附加语构成。”其例：‘慢慢来’，‘快点走’，……”

这种分类显然不能说是纯然“意念的关系”的分类，因为所谓“基本词”“附加语”什么的，根本就是属于语法范畴的分析。既然承认词和词的组，可以从语法上“按它的内部关系”来分为“联合”和“主从”两大类，何以句和句的联结就不能了呢？结构学(синтаксис)是“说明词组(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е)和句子(предложение)的科学”(参看苏联科学院《俄语语法》第一编第一册頁 6)，在这同一部门内对于同样的语法结构，在处理的方法上、理论上必须具有一贯性，否则前后矛盾，就不免造成混乱。在我们看来，等立、主从的区分法，绝不单是“意念关系”的范畴；而是“逻辑·语法”的范畴。就是说它们一方面可以照逻辑关系区分开，同时这种区分在语法的结构关系上也有相应的语法形式。(其详可参看《论汉语的联合结构》。)

② 参看日丹诺夫(Н. А. Жданов)的《俄语中的主语从属句》，见《俄语复合句论文集》頁 17。

对《关于汉语构词法》的几点意见

唐君勱 廖树晟

我们读了张寿康先生的《关于汉语构词法》一文(见《语法和语法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以后，觉得这篇文章的确值得我们好好地钻研、学习，但是我们也觉得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讨论。

(一)字和词的问题：张先生不主张讲“字和词”而主张讲“词和词素”。可是张先生谈到派生词与非派生词的时候又说：“‘天’字，它是非派生词，因为人们并没有依靠别的词来创造这‘天’字”。从这句话中看来，张先生似乎也承认“天”既是“词”，也是“字”。这就和他自己的主张有些矛盾了。同时这句话还会使人误会“字”是词造成的，因为张先生说“人们并没有依靠别的词来创造这‘天’字”。这样就可能使人误解为别的“字”可能是词造成的了。因此，我们认为这句应该改成“‘天’这个词，是非派生词，它不是由几个词素构成的。”

(二)构词法与造句法问题：张先生对造词法与造句法的区别，各处都有说明，为了避免读者误认为造词法就是造句法，这种说明是完全必要的，但我们觉得这些说明有些地方不够严密。如张先生认为动词修饰名词这种构词方式是造词法中所特有的。因为造句法中动词修饰名词需要“的”来帮助，不然就是动宾关系而不是偏正关系。如“吃的饭”，“穿的衣”，没有“的”来帮助，就成了“吃饭”、“穿衣”。可是造词法不同，“跳”修饰“棋”，“跑”修饰“鞋”，都不需“的”来帮助就可以构成“跳棋”、“跑鞋”等偏正式合成词。这是对的，但遇到双音动词修饰双音名词时，这种说明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如“学习时间”、“支配地位”等都是动词修饰名词的偏正结构。可是它们都不需要“的”来帮助就可造成偏正结构，表示修饰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单音动词修饰单音名词不需要“的”来帮助的这种结构方式，才是构词法中仅有的。

(三)形容词修饰动词的合成词是否都是形容词：张先生认为形词素修饰动词素的合成词都是形容词。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够全面的。如张先生所举的“轻视”就不是形容词而是动词。因此，我们认为形词素修饰动词素构成的合成词，除了形容词外，还有动词和名词。如冷笑、假装、多谢、细看、静听、迟到等是动词；小说、新闻、热炒等是名词。而且形词素修饰动词素构成的合成词，动词最多，形容词次之，名词最少。

我们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还望张先生及语法界的同志们指正。

再說“所以”的上古用法

——兼商榷“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鑒定中国古籍的写作年代”的可靠性

刘冠群

楊伯峻先生最近写了《論“所以”的上古用法》^①，文章否定了我在《說“所以”》^②一文中提出的对“所以”的上古用法的見解。應該感激楊先生，他給我許多啓示，使我不得不对这一問題作进一步的鑽研。但是，楊先生並沒有能够說服我，因为：1) 楊先生沒有解決我提出的問題；2) 不少的事實說明先秦文献中，“所以”用于表結果的分句。

我的《說“所以”》一文，是針對楊先生在《文言語法》中对“所以”的上古用法所作的解釋而發的。^③ 这里有必要重提一下楊先生的原話：“‘所以’兩個字，上古只有‘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史記，平原君列傳）这种用法。这种‘所以’，相当于口語‘…的緣故’。若用在表結果的分句，像現代口語一样，只是后起的現象。”^④（着重点是我加的）

一切問題就是从这一段产生的。現在我还有以下的疑問就教于楊先生：

(1) 上古的“所以”，真像楊先生所說的“只有‘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这种用法”嗎？楊先生說，“这种‘所以’相当于口語的‘…的緣故’”，难道我在《說“所以”》中所举出的1—19例，都可以用“…的緣故”去解釋嗎？比如《墨子·天志篇》：“今人处若家得罪，將犹有异家所以避逃之者矣；今人处若国得罪，將犹有异国所以避逃之者矣；今人皆处天下而事天，罪得于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这里面的三个“所以”要是解为“…的緣故”，恐怕是連楊先生本人也不会同意的吧？那么，楊先生至少也应该承認“‘所以’兩個字，上古只有‘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这种用法”這句話說得太滿了。楊先生声明道：

《文言語法》是一本为适应一般讀者而写的論著，其中有若干为著者所初次提出的論点，为篇幅和体例所限，不能不只粗略地举出其結論，而不便加以深入而詳盡的論証；甚至举例，也竭力避免那些疑似之間以及艰深費解的句子。但其結論，都是經過專題研究而后写下的。^⑤

不錯，写書要看对象。但是，正因为对象是一般讀者，作者就更不应该把本来有几种用法的詞、語說成只有一种用法。要是—般讀者完全相信了楊先生的話，認為“所以”在古代只有“…的緣故”一种用法，这样去讀古書，不是弄得昏头昏腦，便是弄得錯誤百出。我也正是在讀古書中碰到許多問題而写下《說“所以”》一文

的。难道楊先生經過專題研究而后写下的对“所以”的結論，就是絲毫不能动摇、修正的嗎？

(2) 楊先生認為上古的“所以”沒有用在表結果的分句的用法。那么請考虑下面这一例：

礼者，治辨之極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荀子，議兵篇）

請問，“得天下”难道不是“王公由之”的結果嗎？“隕社稷”难道不是“（王公）不由”的結果嗎？这里的兩個“所以”难道不是用在“表結果的分句”嗎？即使退一步說，用楊先生自己的解釋，把這兩句譯为“王公照礼做去，这就是得天下的原因，不照礼做去，这就是隕社稷的原因”，“照礼做去”与“不照礼做去”既然是“得天下”与“隕社稷”的原因，反过來說，“得天下”与“隕社稷”不正就是“照礼做去”与“不照礼做去”的結果嗎？

(3) 楊先生認為“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列子·說符）中的“所以”的用法，才是与現代相同的^⑥，又認為“‘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是‘此其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的省略，‘所以不願人之文綉也’也是‘此其所以不願人之文綉也’的省略。这都是判断句，不能看作表結果的叙述句。”^⑦ 我們先來研究后一例：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义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广誉施于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綉也。（孟子，告子上）

这里边，兩個“所以”作为連接詞用是十分明显的。联系上下文看来，也只有这样解釋才—气貫通。它当然

① 《中国語文》1957年3月号。

② 《中国語文》1957年1月号。

③ 我的《說“所以”》一文，早在1956年6月便写成了，最初投交《語文學習》，該刊不便發表汉语史方面比較專門的文章，后来我才投交《中国語文》發表的。当时，楊先生的《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鑒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一文还没有發表，因而，我的文章也就只討論了楊先生在《文言語法》中所提出的对“所以”的看法。

④ 《文言語法》，北京大众出版社，301頁。

⑤ 《中国語文》1957年3月号。

⑥ 同④，302頁。

⑦ 《新建設》1956年7月号，44頁。

不是判断句,而是表結果的叙述句。但是,楊先生是用“省略”来解釋的,并且举出《孟子·滕文公上》“…皆所以明人倫也”来証明它是判断句。这种濫用省略牽就自己的看法的解釋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不知道“皆所以明人倫也”怎么能够証明語法結構跟句型都不同的另一句話属于判断句。如果說“省略說”可以無往而不利,那么,《列子·說符》一例,又何尝不可以解釋为“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这就是我回来的原因了”?那么,楊先生一再強調的判断句与表結果的叙述句的分別,其判別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4) 楊先生認為要像下面的“所以”,才真正是“純粹的表果連詞”:

言神人治始于任賢立政,以礼治,成以乐,所以太平。

(益稷,孔安国“傳”)①

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世說新語,言語篇)②

那么,請楊先生再看下一例:

名亦既有,天亦將知之;知之,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海。(道德經,聖德第三十二)③

这里的“所以不殆”跟前兩例的“所以太平”、“所以不拜”有什么区别呢?这难道不足以說明上古的“所以”已經有在表結果的分句中作为連接詞的用法了嗎?(如果楊先生仍然用“此其…的原因”来解釋“所以不殆”,那是难以服人的,因为这个公式仍然可以套到“所以太平”、“所以不拜”的上去。)

以上,我提出了四个問題向楊先生請教。如果能够給我科学的、不是隨意解釋的答复,那么,我是願意放弃我在《說“所以”》中提出的看法的。否則,楊先生就不能責备別人不懂得他發現的“‘所以’和謂語結構相結合便变它为名詞短語的句法功能这一規律”了,我也將要坚持在《說“所以”》中提出的看法:“所以”在上古的用法不止一个;用在表結果的分句,象現代口語一样的“所以”,在先秦的著作中已見其例。

楊先生說道:

正確地了解“所以”用法的历史,不但可以使我們能够正確地了解古代的句法和內容,而且还有助于鑒別古書的真偽。

是的,了解“所以”用法的历史是重要的。正因为这样,我才不厭其煩地申述自己的見解。从漢語史的角度来鑒定中国古籍的真偽以及它的写作年代,不失为科学的方法之一。但是,我們也不能把这方法的可靠性估計得太高。讀了楊先生的《从漢語史的角度来鑒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一文后,我觉得楊先生过分地相信这一方法了。楊先生說:

我們可以肯定,如果我們精通漢語史,任何一部偽造的古籍,不管偽造者如何巧妙,都能在語言上找出他的破綻來。我們根据这些破綻,便可以判明它是偽書,甚至鑒定它的写作年代。④

我認為,我們在从漢語史的角度去鑒定中国古籍时,應該考慮到以下三点:

(1) 我国古代的典籍,并不是全部都流傳下来了,現存的只是少数。这現存的少数古籍的語言是否就包括了古代漢語的語言現象,是很难断言的。(但是可以断言这現存的少数古籍包括了古代漢語一般的、多数的語言現象。)因而,从漢語史的角度鑒定古籍,还是采取比較保留的态度好些。

(2) 不同的作家、作品,还有不同的語言風格,特殊的詞、語。古代並沒有搞过“漢語规范化”,我們不能設想古人的語言都是机械地一致的。(这是在今天的“漢語规范化”提出之后也是作不到的。)我們應該考慮到,某一作品中的某一特殊語言現象,在当时可能是特殊的,但到后来,却成为一般的了(例見后),这就得采取比較謹慎的态度。

(3) 現代还保存着的古籍虽然較之散失的少得多,但是,仍然有可觀的数量,我們是不是真正的做到了全面考察、毫無遺漏?如果沒有絕對把握,那么,話不宜說得太滿,應該給別人留一点商討的余地。

前兩点是客觀方面的,后一点是主觀方面的。

如果我們能够考慮到以上三点,那么,对古人、对今人、对后人都会有益处的。

我得声明一句:我不是打算証明《列子》不是偽書。我也認為《列子》是一部偽書;但是我的判断并不是完全从語言上得出的。这不是我要討論的問題。

我之所以要談到這個問題,是因为楊先生对《漢語史的角度来鑒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所提出的論点和論据(包括“所以”)太过分地自信了。难道楊先生所提出的都是顛扑不破、絲毫不能動搖的真理嗎?我可以这样答复:不完全是。我們抛开上面所談的三条中前兩条,即客觀方面的兩条不談,且談第三条,即主觀方面的那一条,楊先生真是做到了全面考察、毫無遺漏了嗎?如果說再談“所以”,也許是我有成見,那么我們談談別的吧!

楊先生說:

在上古漢語里,“如”字若作为動詞用,便有一个有趣的現象:如果“如”字之上不加否定副詞“不”“弗”,这“如”字一定只当“像”字講。如果“如”字之上有否定副詞“不”“弗”,这“如”字一定只当“及”字講。“如”和“不如”、“弗

(下轉22頁)

① 《中国語文》1957年3月号,16頁。

② 《新建設》1956年7月号,45頁。

③ 《道德經》的写作年代虽然还有很多爭論,有人說成于春秋,有人說成于战国,但是絕沒有人說成于兩汉。無論是成于春秋或战国,都是可以証明我的論点的。

④ 《新建設》1956年7月号,38頁。

答《再說“所以”的上古用法》和其它

楊伯峻

刘冠群先生这篇文章承《中国語文》杂志社轉給我先看一看，并且囑我也写点意見，一同發表。我認为这种办法很好，因为爭論双方的文字同时發表，对讀者說来，要方便得多。因此在匆忙中簡單地作一答复。

綜合刘先生的文章，有四点我須要答复：(1)《文言語法》說“所以”只有“…的緣故”一种用法，究竟对不对？(2)“所以”用为表結果的連詞，先秦究竟有無此例？(3)“不如”在先秦是否只有“不及”的一个意义？(4)“被”字是否先秦已作为表被动的助動詞？关于前三个問題，我的答复是，仍然不能同意刘先生的見解。关于第四个問題，刘先生的說法是正确的。

《文言語法》15.32 說，“所以”只有“…的緣故”的一种用法，是針對“所以”用为表結果的連詞为先秦所無一現象而言的。难道刘先生不明白嗎？就在《文言語法》同一書里我也曾提到“所以”的另几种用法，如《墨子，公輸篇》的“吾知所以距子矣”，《三国名臣序贊》的“夫江湖所以济舟，亦所以复舟”的不同用法而加以解釋了①，难道刘先生竟“視而不見”嗎？“只有‘…的緣故’一种用法”，这是在闡述“結果句”一段中所說的話，所談的范围当然仅限于表結果的复合句，因之原文“只有”兩字只有相对的意义。如果不管別人說話的环境，把某一句話，甚至某一兩個字割裂开来，把它絕對化了，再作为小辯子来批評，是不應該的。

“所以”作为表結果的連詞，为先秦所無，我今天仍如此看法。刘先生所举《荀子，議兵篇》的例子，“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正只能这样講解：“王公由之就是得天下的原因；不由，就是隕社稷的原因”。这样，才合于原来的訓詁和語法。这一道理，我在《列子著述年代考》文中已言之甚詳。刘先生又一例句出于《老子》，原文是“知止所以不殆”。②从表面看来，句末無“也”字，难以看为判断句，似乎很有說服力，殊不知此乃偽証。这一句，張之象本“所以”作“可以”，而景龙碑、易州罗卷館

本無論“所以”也好，“可以”也好，這兩個字都沒有。根据俞樾《諸子平議》的考証，原文只作“知止不殆”。③我在写《列子著述年代考》時曾对这一問題作过考查。《老子》一書，用表結果的連詞最多，計用“故”字者五十次，用“是以”者三十七次，用“是故”者兩次，沒有用“所以”的。用“所以”三次，都是当“…的緣故”解，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刘先生的这一例証是不能成立的。

“不如”在先秦只能当“不及”解。至于刘先生所举《荀子，王霸篇》“如是，則夫名声之部發于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則又当別論。首先，我們應該了解，無論訓詁規律，語法規律，有一般，有特殊(有規律的例外)。以疑問代詞常在介詞之前，如“奚自”、“何为”这一規律而論，它的有規律的例外是：介詞若是“于”、“於”，則仍后置，如“于何”，“于焉”，“予以”④。又以否定句的賓語若是代詞常置于動詞前，如“不吾知也”，“子不我思”这一規律而論，它的規律的例外是：動詞若是“及”“如”諸字，則仍后置，如“吾不及此”(左傳，昭公十五年，)“誰不如我”(又僖公九年)。⑤訓詁也如此。这种句子要把“如…然”相結合来看，古書一般用“若…然”字，《孟子》便有“無若宋人然”，“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今言王若易然”，“木若以美然”諸句。《荀子》以“如”代“若”是極罕有的例外(仅此一見)，然而也是有規律的例外。因之这一例句不能看作“不如”連文，而應該看作“不”字是否定“如…然”的。正和我在那一篇文章中所举的“無不如志”一例一样，不能和正規例句混为一談。此外，我至今还未發現真正足以破坏这一結論的例句。

至于“被”字，在战国末年便已有用作表被动的助動詞的。我在写《列子著述年代考》時，陷于主觀，說他起源于后汉，那是錯誤的。当那篇論文發表以后，便得到友人周光午教授的信，他說，“被”字用为表被动的詞，在《韓非子》中凡三見，在《战国策》中凡二見，在《吕氏春秋》中一見。有此一例，便足以破坏我之論断，何况有六次之多？我已对那一篇論文有所修改了。⑥

代 郵

徐亞倩同志：請速告通馭处，以便寄上稿費。

① 見《文言語法》227 頁，北京大众出版社版。或者 162 頁，北京出版社版。

② 刘先生原文“知止”作“知之”，誤。

③ 詳見馬敘倫《老子校詁》107 頁，古籍出版社版。

④ 詳見楊樹達《詞詮》附录《論詩經于以書》。

⑤ 关于否定句代詞賓語的位序問題，特殊規律不止这一条，但非此文所能詳。

⑥ 可參看不久可以出版的拙著《列子集釋》(科学出版社)的附录三。

海鹽通園方言的代詞*

胡明揚

1. 代詞分爲人稱代詞、指示代詞、疑問代詞三類。

一 人稱代詞

2. 通園方言共有八個人稱代詞，列表如下：

人 稱	單 數		複 數
	第一式	第二式	
第一人稱	fi'o'no [我]	u [我]	wə'la [我們]
第二人稱	nei [你]		na [你們]
第三人稱	ji'nei [他]	i [他]	ji'la [他們]

第三人稱的人稱代詞不能用來指稱動物或事物。如果需要指稱動物或事物，只能用指示代詞(+量詞)，例如：

ga? tsa? ga? ka?
[這] 只 [這] 个

3. 人稱代詞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的單數各有兩種詞彙意義相同而語法形態不同的形式。

第一式和第二式在用法上有嚴格的區別，兩可的場合極爲少見。

4. 第一式和第二式的用法如下：

(1) 在動詞謂語前面用第一式，在動詞謂語後面用第二式。例如：

fi'o'no giā tshə? dō
[我] 想 吃 糖。
fi'o'no tsentsə iə tə thōyə tēhi
[我] 今朝 要 到 通園 去。
fi'o'no və? pho i
[我] 勿 怕 [他]。
māma ji'nei tā u
媽媽， [他] 打 [我]。
fi'o'no və?zən tā i ji'nei sə? huō
[我] 勿曾 打 [他]，[他] 說 謊。

ji'nei giōli u i? tən
[他] 凶[罵][了] [我] 一 頓。

(2) 在介詞後面用第二式，如：

na a?kei lə ləli mā nei dziuka?
[你們] 阿哥 [如果] 來[了][的話] [你] [立刻]
le zə u o
來 朝 [我] 話。
nei dō u kuən
[你] 同[給] [我] 滾!

fi'o'no ga? pən py pən i tshatheli
[我] [那] 本 書 [給] [他]扯場[破][了]。

(3) 如果前後都有動詞，那末使用第一式或第二式，決定於前面的動詞和這個人稱代詞之間有沒有語音上的停頓。如果有語音上的停頓就用第一式，如果沒有語音上的停頓就用第二式。但是細分起來，還可以分成三小類。

A. 如果前面的動詞是0“話”，而後面是一個間接引語性質的分句，那末中間一定有語音上的停頓，一定用第一式。例如：

ji'nei zə u o ji'nei mentsə iə tə
[他] 朝 [我] 話， [他] 明朝 要 到
ielō tēhili
堰[上] 去[了]。

sa nin zə nei o/ fi'o'no və? zī
哈 人 朝 [你] 話 [我] 勿 是
phu'iālō nin
浦漾[上] 人?

B. 如果前面是一個表示敦促、指使意義的動詞，後面是表示這個代詞所表示的人所進行的動作的動詞(相當於兼語式)，那麼中間一定沒有語音上的停頓，一定用第二式。例如：

fi'o'no tēiə i tə kalō tēhili
[我] 叫 [他] 到 街[上] 去[了]。

ji'nei iə u dō i i? də tēhi
[他] 要 [我] 同 [他] 一 [塊兒] 去。
ji'la tēhin i tēhi kə py tēhili
[他們] 請 [他] 去 教 書 去[了]。

C. 如果前面是一個表示感覺的動詞，如 piətə? 曉得，khatēi 看見，ko?za? 覺着等等，那末如果在前一動詞後面有語音上的停頓就用第一式，沒有語音上的停頓就用第二式。例如：

sa nin piətə? i lo?ho? tsu sa
哈 人 曉得 [他] [在] 做 啥!
sa nin piətə?/ji'nei lo?ho? tsu sa
哈 人 曉得 [他] [在] 做 啥!
fi'o'no khatēi/ji'nei lo?ho? gia zī
[我] 看見 [他] [在] 寫 字。
fi'o'no khatēi i lo?ho? gia zī
[我] 看見 [他] [在] 寫 字。

* 這是作者《通園方言語法研究》的一部分。通園是浙江省海鹽縣的一個小鎮。通園方言是吳語的一種。

nei ɣiəʔ/ɦoʔno tɕiniɛ tɕi sei
[你] 曉得 [我] 今年 几 岁?
nei ɣiəʔ u tɕiniɛ tɕi sei
[你] 曉得 [我] 今年 几 岁?

这种語音上的停頓是不容易在听觉上觉察出来的，但是說話的人自己会感觉到这种停頓。如果動詞后面沒有語音上的停頓，那末動詞和后面的人称代詞是一口气說出来的，也就是属于一个气群 (breath group) 的。在这种場合，人称代詞粘附在動詞后面。如果要表示動詞后面的成分結成一个整体，那末在動詞后面要換一口气，这就产生了語音上的停頓，那怕这种停頓是十分短暫的。在这种場合，后面的人称代詞就不是处在和前一動詞同一气群的末了，而是处在另一气群的开始。通園方言人称代詞第一式和第二式的用法主要决定于这一点。

(4) 在語气助詞 na (提示語气)，kəʔ (強調語气) 后面第一式和第二式都可能出現，条件和上一項相同，也就是完全取决于語音上的停頓与否。例如：

na/ jiʔnei natsən tən tɕhi ɦali
[×] [他] [現在] [住] [在] [哪兒]?

ɦa i natsən tən tɕhi ɦali
[×] [他] [現在] [住] [在] [哪兒]?

na/jiʔnei mə zɿze zɿ hə ei
[×] [他] [的話] 自然 是 好 [的]!

ɦa i zɿzə zɿ hə ei
[×] [他] 自然 是 好 [的]!

kəʔ / ɦoʔno i ɲpəʔ khō
[×] [我] 又 嚙不 空!

kəʔ u i ɲpəʔ khō
[×] [我] 又 嚙不 空!

在語气助詞后面第一式比第二式更为普遍。

(5) 在判断詞 zɿ “是” 后面，如果人称代詞后面不再有其他動詞，那就用第二式，如：

leilɔ zɿ sa nin zɿ u
樓[上] 是 啥 人? 是 [我]。

但是也可以用第一式：zɿ ɦoʔno

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用这种句式，而用：

leilɔ sa nin ɦoʔno
樓[上] 啥 人? [我]。

如果 zɿ “是” 后面的人称代詞后面还有其他動詞，那末这个 zɿ “是” 就帶有強調特指的意义，人称代詞就用第一式。例如：

gəʔ tsaʔ uə zɿ sa nin tã se ei
[这] 只 碗 是 啥 人 打 碎 [的]?

zɿ ɦoʔno tã se ei
是 [我] 打 碎 [的]。

但是也有用第二式的：

zɿ u tã se ei
是 [我] 打 碎 [的]。

(6) 如用人称代詞用作名詞的附加語，表示領有关系，那末只能用第一式，即使前面有及物動詞。例如：

ɦoʔno ei ɣy jiʔnei ei izō
[我] [的] 書。 [他] [的] 衣裳。
tsusələ nei iə iō ɦoʔno gəʔ tɕy piʔ
[为什么] [你] 要用 [我] [这] 枝 笔?

nei vəʔ ɣiəʔ ɦoʔno ei khutɕhy
[你] 勿 曉得 [我] [的] 苦处。
nei khə ɦoʔno gəʔ dɕiɛ izō həkɦə vəʔ
[你] 看 [我] [这] 件 衣裳 好看 [嗎]?

5. 人物代詞用作定語时的特点：

(1) 人称代詞直接用作定語时表示親屬关系。在这种場合只能用复数的人称代詞。例如：

na ɣiōdi tɕiniɛ tɕi sei li
[你們] 兄弟 今年 几 岁 [了]?

na daniā gəʔ liā niʔ hə vəʔ
[你們] 大娘[妻子] [这] 兩[几] 日 好 [嗎]?

wəʔla ɲma iutɕhi oʔli
[我們] 姆媽 [在] 屋里。

nei khətɕiɛ jiʔla dɕiuniā vəʔ
[你] 看見 [他們] 舅娘 [嗎]?

jiʔla oʔli iutɕhi khaʔnin hoʔ
[他們] 屋里 [有] 客人 [×]。

oʔli 屋里[家里]虽然不是一种親屬稱謂，但也和其他親屬稱謂的用法一样。

从以上的例子看来(特別明显的是第二句)，即使指的是一个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須用复数的人称代詞。

(2) 人称代詞用作名詞的定語时表示領有关系，必須加用結構助詞 ei [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用單数或复数的人称代詞。例如：

na ei vōtsɿ pi wəʔla ei hə
[你們] [的] 房子 比 [我們] [的] 好。

jiʔnei ei zɿthi nei ɣiəʔ vəʔ
[他] [的] 事体 [你] 曉得 [嗎]?

ɦoʔno ei iʔ khuei tɕyadei pən i
[我] [的] 一 塊 絹 头[手帕] [給] 他

gue dia li
甩 掉 [了]。

nei ei nieɕiɛ dɕinzaʔ mi
[你] [的] 拈綫[針] 寻 着 未[沒有]?

如果我們要強調親屬關係或需要對比的時候，也可以用帶 ei 的格式，如：

ji?nei z1 fio?no ei a?kei i vø? z1
[他] 是 [我] [的] 阿哥，又 勿 是

nei ei a?kei
[你] [的] 阿哥。

wø?la ei mma z1 vø? mo nin ei
[我們] [的] 姆媽 是 勿 罵 人 [的]。

在這種場合，單複數的人稱代詞都可以用。

如果名詞前面有指示代詞，那末 ei 必須省去：

nei gø? tøy pi? høgia va?
[你] [這] 枝 筆 好 寫 [嗎]？

fio?no gø? dzie izō nei khø høkha
[我] [這] 件 衣裳 [你] 看 好看
va?
[嗎]？

sa nin giøtø? ji?nei gø dōlie iō tō
啥 人 曉得 [他] [那些] 銅錢 [用] 到
fiāli tēhili
[哪兒] 去 [了]。

6. 人稱代詞本身不能帶定語。

二 指示代詞

7. 通園方言共有八個指示代詞：

(1) 指事物：

gø?/kø? gø/gø?ge kapin
[這，那] [這些，那些] [這麼些，那麼些]

(2) 指處所：

lōtha?/lō gø?tha? gø?dei
[這兒]——近指 [那兒]——中指 [那兒]——遠指

(3) 指性狀：

zø?ga ka
[這樣，那樣] [這麼，那麼]

通園方言指示代詞的體系是和普通話顯然不同的。這首先表現在普通話中的“這”和“那”在通園方言中就合而為一，沒有區分。如果在通園方言中要明確地指出“這個”、“那個”就必須合成指示代詞（見下文）。此外，如“每”、“別的”等等也沒有專門的指示代詞，而通過其他詞彙手段來表達。

8. gø?/kø? [這，那]

gø? 和 kø? 是同一指示代詞的兩種不同的語音形式，在詞彙意義和語法特征方面基本一致，在一定場合可以自由換用；基本的形式是 gø?。但是兩者之間還有一些區別。

如果用在句首，那末只能用 gø?，如：

gø? pən øy z1 sa nin ei
[這] 本 書 是 啥 人 [的]。

如果不在句首，那末兩種形式都可以用，問題在於 gø? 有自己的重音，在語音上是相對的獨立的，而 kø? 則沒有重音，在語音上附着於後一音節，如：

nei kø? tøy pi? ni
[你] [那] 枝 筆 呢？

nei kø? ka? nin tsən iō bən sa?
[你] [這] 個 人 真 要 笨 [死]

li
[了]！

fio?no gø? tøy pi? ni
[我] [那] 枝 筆 呢？

gø? 和 kø? 之間的這些區別，僅是語氣上的差別：用 gø? 時強調指示意義，例如：

nei iō gø? tøy pi? hō li
[你] 用 [這] 枝 筆 好 [了]。

在這裡不能換用 kø?，因為這裡的指示意義特別強烈。無論在動詞前或動詞後，兩種形式都可以出現：

fio?no iō tā sa? nei gø?/kø? kø? nin
[我] 要 打 [死] [你] [這] 個 人！
detsi lō gø?/kø? pō tō z1 sa nin ei
[那] 把 刀 是 啥 人 [的]？

為了簡便起見，在其他部分都一律寫為 gø?。

9. gø/gø?gø [這些，那些]

gø/gø?gø 是 gø?/kø? 的複數形式。

gø 和 gø?gø 之間的關係等於 gø? 和 kø? 之間的關係，唯一不同的是 gø?gø 也可以用在句首，例如：

gø/gø?gø øy z1 sa nin ei
[這些] 書 是 啥 人 [的]？

gø/gø?gø z1thi nei sō kuakua
[這些] 事體 [你] 少 管管。

不在句首的例子：

wø?la gø/gø?gø nekø ni
[我們] [那些] 南瓜 呢？

ji?nei no wø?la gø/gø?gø hō zē ba?
[他] 拿 [我們] [那些] 花 [都] 拔

diō li
掉 [了]

fio?no a iō tshø? nā zo?ni tshø?
[我] 也 要 吃 [你們] 昨日 吃

gø/gø?gø
[那些]。

10. 在指事物的代詞 gø?/kø? [這，那]，gø/gø?gø [這些，那些] 前面的 ei [的] 必須省去：

fio?no gø? pən øy nei gø tēhi fiāli
[我] [那] 本 書 [你] [放] [在] [哪兒]？

wa?la zo?ni ma ga zāsənku ni
[我們] 昨日 買 [那些] 長生果[花生] 呢?

11. ka?in [这么些, 那么些]

这是一个表示具有足够数量的指示代詞。例如:

nei iutphi ka?in ho? fiε iə ma
[你] [有] [这么些], [×], 还要 买?

ka?in nei tshə? tə? lo? va?
[这么些] [你] 吃 得 落 [嗎]?

ka?in 可以用作定語, 例如:

nei iutphi ka?in zāsənku ho keili
[你] [有] [这些] 長生果[花生] [×], 够[了]。
ka?in zɿthi sa nin i?gi?va?za? tsu tə?
[这么些] 事物 啥 人 [立刻] 做得
wa
光?

12. lətha?/lə [这儿]

lətha? 和 lə 在詞彙意义、語法特征上都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这些区别沒有人称代詞那样严格和那样有启發性, 因此暫且把它們归并起来。

(1) 在句首、句中只能用 lətha?, 例如:

lətha? zɿ fiukazā
[这儿] 是 胡家場。

lətha? iu ŋ sə? tɕi ka ninka
[这儿] 有 五 十 几 家 人家?

nei tə tātha? lə zu
[你] 到 [这儿] 来 坐。

na tɕizɿ tə lətha? lə
[你們] 几时 到 [这儿] 来?

(2) 在句末的動詞后面用 lə, 例如:

nei dō u zu lə
[你] 同[給] [我] 坐 [这儿]。

nei zu lə hohotɕio tshə?
[你] 坐[这儿] 好好[地] 吃。

(3) 在句末介詞后面如果用 lətha? 就強調指示意义, 用 lə 不強調指示意义:

nei dō u zu lə? lə/lətha?
[你] 同[給] [我] 坐 [在] [这儿]!

ga? tsa? uə nei fō lə lə/lətha?
[这] 只 碗 [你] 放 [在] [这儿]。

lə 在語音上附着于前面的介詞或動詞。

13. ga?tha? [那兒]

ga?tha? 表示中指, 也就是指示稍远一点的事物, 例如:

ga?tha? iutphi po tɕietə ho?
[那兒] [有] 把 剪刀 [×]。

nei ga? dzie izō iutphi ga?tha? nei
[你] [那] 件 衣裳 [在] [那兒], [你]

khatɕie va?
看見 [嗎]?

14. ga?dei [那兒/边]

指示代詞 ga?dei 显然是由 ga? [那] 和 -dei [头]組成的。ga?dei 指示相当远的事物, 并且可以指不在眼前的事物。例如:

ga?dei zɿ sa difō
[那边] 是 啥 地方?

ji?la zε iutphi ga?dei
[他們] [都] [在] [那边]

ga?dei iu sa hō bi?ɕiā
[那兒] 有 啥 好 [玩兒]?

15. 如果要确指“这”、“那”、“这些”、“那些”, 那就用下列指示处所和指示事物的代詞的組合形式:

(近指)	lətha?	ga?/kə?	[这]
	lətha?	ga/gə?go	[这些]
(中指)	ga?tha?	ge?/kə?	[那]
	ga?tha?	ga/gə?go	[那些]
(远指)	ga?dei	ga?/ke?	[那]
	ga?dei	ga/gə?go	[那些]

在这种組合形式中不能用 lə [这里]。

16. 指示代詞 lətha? [这儿], ga?tha? [那兒], ga?dei [那兒]用作定語时必须用 ei, 例如:

lətha? ei fōsɿ va? hō
[这儿] [的] 風水 勿 好。

ga?tha? ei uetse fiāli tɕhili
[那兒] [的] 碗邊 [哪兒] 去[了]?

ga?dei ei dziādei theli
[那兒] [的] 牆头 塌[了]。

17. zə?ga [这样, 那样], ka [这么, 那么]

zə?ga 和 ka 都是指性狀的指示代詞。

zə?ga 在句子里头用作补語、謂語、定語、動詞的狀語:

nei na?ha?lə ɕiō lə zə?ga ei
[你] [为什么] 凶 来 [这样] [的]!

thie ni? lə zə?ga ei iə ni? sa?
天 热 来 [这样] [的], 要 热 [死]

nin li
人 [了]。

nei zə?ga iu sa iōzā
[你] [这样], 有 啥 用場[用处]?

zə?ga ei nin fiō?no ve?zən tɕieku
[这样] [的] 人 [我] 勿曾 见过。

z1 ji?nei tpiɔ u zə?ga tsu ei
是 [他] 叫 [我] [这样] 做 [的]。

ka 在句子中用作形容詞的狀態:

ka piɔ ei nin ho?no və?zen tpiɛku
[这么] 凶 [的] 人 [我] 勿曾 見過。

ka die ei dō nei tsha?ku va?
[这么] 甜 [的] 糖 [你] 吃過 嗎?

三 疑問代詞

18. 通園方言共有疑問代詞八個,即:

(1) 問事物: sa 啥 sapin [什么]

(2) 問數量: tpi 几 tpiho [多少]

(3) 問性狀: na?ha? [怎樣]

(4) 問時間: tpiɔ 几时 [什麼時候]

(5) 問地點: fali [哪兒]

(6) 問原因: na?ha?la?/-lə/-lə

19. sa 啥, sapin [什么]

sa 和 sapin 的詞彙意義完全相同,但是語法意義不同。sa 在句子中用作賓語或定語; sapin 在句子中用作主語。例如:

sa nin ieli nei lo?ho? tsu sa
啥 人 來[了]? [你] [在] 做 啥?

na iə tsha? sa go?pi? sa zenkuō li
[你們] 要 吃 啥? [現] 嚕 辰光 [了]?

sapin lo?ho? piā
[什么] [在] 啊?

sapin ho?no tin va? tpiɛ nei kuō
[什么]? [我] 听 勿 見, [你] 講

piā tie ho va?
啊 點 好 [嗎]?

sa 可以用作定語, sapin 不能:

sa nin sa tōpi
啥 人 啥 東西

可是不能說:

sapin nin sapin tōpi
[什么] 人 [什么] 東西

在判斷詞 z1 “是”後面用 sa, 例如:

gə z1 sa
[這些] 是 啥?

在表示存在、狀態的句式 “...tphi...ho?” (相當於普通話的存現句) 中的動詞後面也用 sa, 如:

pinl5 gia tphi tie sa ho?
信[上] 寫 [x] 點 啥 [x]?

nei deli go tphi tie sa ho?
[你] 幾里 [幾] [x] 點 啥 [x]?

20. tpi 几, tpiho [多少]

tpi 和 tpiho 的詞彙意義相同,但是語法意義不同。

tpi 用來問數,後面一定有量詞; tpiho 用來問量,後面不帶量詞。例如:

nei iu tpi pən py
[你] 有 几 本 書?

ji?la o?li iu tpi ke? nin
[他們] 屋里[家里] 有 几 个 人?

nei iu tpiho dōdie
[你] 有 [多少] 銅錢?

mi fie iu tphiho
米 還 有 [多少]?

21. na?ha? [怎樣]

na?ha? 用來問性狀、動作,在句子中可以用作定語、謂語、補語、狀語。

gə izō nei viə tsha nei iə tsha
[這些] 衣裳 [你] 勿要 穿, [你] 要 穿

na?ha? ei izō
[怎樣] [的] 衣裳?

(na?ha? 用作定語時必須加 ei [的]。)

ke?me nei iə na?ha?
[那么] [你] 要 [怎樣]?

na nei iə zə le na?ha? ia
[x] [你] 要 [鬧] 來 [怎樣] 啊?

nei piə? wən z1 z1 na?ha? gia ei
[你] 曉得 “魂” 字 是 [怎樣] 寫 [的]?

nei na?ha? tsu mə ho?no a na?ha?
[你] [怎樣] 做 [x] [我] 也 [怎樣]

tsu
做。

指示代詞 na?ha? 的用法基本上和普通話的“怎樣”一致。

22. tpiɔ 几时 [什麼時候]

tpiɔ 用來問日期,例如:

ji?nei z1 tpiɔ lə ei
[他] 是 几时 來 [的]?

nei tpiɔ dōsan
[你] 几时 動身?

這兩句問句的可能回答是:“昨天來的”,“大后天動身”,等等。

要問一天之內的時間就用疑問代詞 sa 和名詞 zenkuō “辰光”的組合形式,例如:

we?ia sa zenkuō tsha? ia və
[我們] 啥 辰光 吃 夜飯?

ji?nei sa zənkuō tøy ei
[他] 啥 辰光 归 的?

23. fali [哪兒]

fali 問處所,如:

ji?nei gə?əi? iutəhi fali
[他] [現在] [在] [哪兒]?

na tō fali təhi
[你們] 到 [哪兒] 去?

əy nei gə təhi fali
書 [你] [放] [在] [那兒]?

如果要問地名,應該用 sa difō “啥地方”,例如:

ji?nei z₁ sa difō le ei
[他] 是 啥 地方 來 的?

ji?nei z₁ thōyō le ei
[他] 是 通園 來 [的]。

24. na?ha?la?/-lō/-lō [為什麼]

na?ha?la?, na?ha?lō, na?ha?lō 三種形式的詞彙意義、語法特征完全一樣,僅僅是語音上的變化不同而已。

這個代詞顯然是由 na?ha? 和 -la?/-lō/-lō 組成。lō/lō 是一個結構助詞表示條件。na?ha?+lō/lō 意即“何故”,也就是“為什麼”。-la? 可能是由同化作用引起的語音現象。

na?ha?la? 在句子中可以用作狀語:

nei na?ha?la? təhi tēi? le zə?ga ei
[你] [為什麼] 氣 急 來 [這樣] [的]?
ji?nei na?ha?la? tsentsə və? le
[他] [為什麼] 今朝 勿 來?

na?ha?la? na iō zə?ga ni
[為什麼] [你們] 要 [這樣] 呢?

除了 na?ha?la?/-lō/-lō 以外,相當於普通話“為什麼”的還有一個習語性的詞組,那就是 tsusalō/-lō “做啥[×]”,但是 tsusalō 強調目的,問別人做這件事情的目的何在。用 na?ha?la? 的時候強調原因。例如:

nei tsusalō iō tēi i
[你] [為什麼] 要 打 [他]

na tsusalō və? tēhi
[你們] [為什麼] 勿 去?

(接15頁)

如“不能構成肯定,否定的一對。而是不同的兩個詞。“如”“不能有否定”,“不如”和“不肖”一樣,不能有肯定。①我倒沒有遍查古籍,但是在讀《荀子》時却發現這麼一例:

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于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荀子,王霸篇)

這裡的“不如”顯然只能作“不像”解,絕不能作“不及”解,這就證明楊先生所堅信的上古漢語中“如”字不能有否定的結論並不正確。難道楊先生又會根據這一個“不如”肯定《荀子》是偽書嗎?

楊先生又說:“總之,(在先秦以至西漢的古籍中)所用的表被動的助動詞,只有‘見’、‘為’、‘所’諸字,沒有被字。‘被’字在西漢以前,除作名詞(寢衣、被褥)用外,還作動詞用,如《尚書·堯典》的‘光被四表’,絕對沒有作助動詞用的。‘被’字之用為助動詞,表示被動,據我所知,起源于後漢,盛行于魏晉。下面是些例句:

或有忠而被害,或有孝而見殘。(崔駰,大理箴)

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遣戍。請師見拒,辭行被拘。…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後漢書:臧洪傳,答陳琳書)

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系。(又,虞詡傳)②

楊先生既然把上几例中的“被害”、“被拘”、“被戮”中的“被”認為表示被動的助動詞,那麼,下列兩例中的“被

侵”、“被害”、“被戮”中的“被”也應該得到同等的待遇:

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
(韓非子,五蠹篇)

錯卒以被戮。(史記,酷吏傳)③

雖然《韓非子》、《史記》中的“被”字,有作為表被動的助動詞的用法,可是誰也沒有懷疑這兩部書是偽書。

但是,我還要再聲明一句,我一點也沒有打算貶低楊先生的著作的意思,恰相反,我對楊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是極敬佩的。以上我指出的一些小漏眼,在我看來,也不過是“智者千慮之一失”。(要是楊先生不承認是“失”,自然另當別論。)請考慮,請指正!(1957,3,31)

① 《新建設》1956年7月號,46頁。

② 同上,41頁,原文中尚有14例,均與此3例近似。從略。

③ 此處兩例是劉世儒先生發現的,劉先生認為“這只能算是被動式的萌芽,還不能就說是正規的被動式。因為在這個時代,這種“被”字後邊的動詞,一般都能加上形容性的副加語。”(《語文學習》1956年8月號,32頁)如果根據劉先生的說法,那麼,楊先生所舉出的《大理箴》、《答陳琳書》等例中的“被”,也不宜看作正規的被動式。如果按照楊先生的看法,那麼,此處所舉《韓非子》、《史記》兩例,就應該被認為是被動式用“被”的起源。總之,無論根據劉世儒先生的說法或楊先生自己的看法,我都可以作出結論:楊先生認為“被”字之用為助動詞,表示被動,是起源于後漢,這是不正確的。

試論北京語音的“声調音位”

徐世榮

提起“音位”来，大家就想到它不过是一种語言的音素的归納方法。这个方法，不可諱言，咱們是从外国学来的。用这个方法，可以把語言中一些活动变化的音素概括起来，各以类从，使学习的人化繁为簡，化零为整，也就是把散乱的整理为有組織的；这不單学习起来方便，研究語音問題也有条理可寻。关于音位理論，許多位同志都已經講得很清楚了，不必煩絮。不过，我总觉得要把外国人归納音位的方法用到汉语的研究上，不能不特別考虑汉语語音的特点。

声調是汉语的特点之一，声調的作用关系語义的区别，絕對不可忽略。如果承認音位的区分要以能不能区分語义为一个条件的話，汉语的“声調音位”就不能不考虑了。在归納北京語音音位的时候，有的人主張把几个元音按声調分列就算解决了問題。我觉得这还值得商榷。音位本是“归納”来的，归納就要簡括，如果归納之后，把六个元音变成好几十个帶着声調的音位，那豈不反倒麻煩了。不管从語音理論上还是从教学实用上来說，这都是不妥当的。

声調是整个音节發音时高低、升降、曲直、長短的錯綜配合。离开音节談不到声調的存在。我們不能因为音节里的“主要元音”在声調現象中起主要作用，就說声調仅仅是元音的事。比方 rén(人)这个音节，e 固然起主要作用，r 和 n 又何尝没有关系？因为这样的音节，声帶的振顫發音是由头貫到尾的，声帶的松紧变化也是由头貫到尾的。rén 的調值是 435，r 便是 3（中度緊張）的开端，n 便是 5（高度緊張）的終止。e 自然長些、响些。不管怎样，它也只是声調的中腰（自然是大部分的），而不能用它代表整个“中升”調的全部。如果說，拟定一个 ě，就概括了包含 e 元音的一切上声音节，还是說不过去。（清輔音作声母，固然沒有声調关系，但介音、韵尾却永远脫不掉关系）。这种借音素解决音节問題，把声調的重任勉强由元音音素担当的办法，值得考虑。这恐怕是太重視“最小的語音單位”了。我觉得，汉语的声調既是超越音素的，我們归納音位时，就可以摆脱这“最小語音單位”的糾纏。

汉语的声調是音素之外能区分語义的东西。这是一般印欧語言所沒有的，它是汉语的特殊要素。要实事求是，我們就要用特殊方法解决特殊問題，不必囿于成說。因此我主張按两个大类归納北京語音的音位：一类是“音素的音位”，一类是“声調的音位”。

本文專談北京語音的“声調音位”。

研究这个問題，必須摆脱汉字的拘束，純粹根据实际語音。北京語音声調若按实际調值來說，有两大类：一类是正常的音节里的“正常声調”，一类是弱化音节里的“短弱声調”，就是一般所說的“輕声”。

“短弱声調”很特別，帶这种声調的音节也可以說是沒有声調的音节，因为这种音节給人的声調感觉是十分淡薄模糊的，有人把它叫“零声調”，也不錯。这种“短弱声調”只能在一連串音节（詞句）中出現。人們嘴里不会孤立地念这样一个音节。比方，“刀子、錘子、斧子、鉋子”，四个“子”都是“短弱声調”。虽然短弱，但它們所处的环境不同，是因受前面音节声調的影响而略有高低之分的。“刀子、錘子”的“子”可以算是“中短”的，“斧子”的“子”可以算是“高短”的，“鉋子”的“子”可以算是“低短”的。不管怎样，这一类“短弱声調”是一种变态的声調，不必和“正常声調”相比，“高短”、“中短”、“低短”可以归为一个音位，总名为“輕声”。（1, 12, 11 归为一个音位，可以“中短” 12 为典型。）

至于“正常声調”，它的調值可以有七个：

- (1) 高平 55，如“优良”的“优”。
- (2) 中升 435，如“煤油”的“油”。
- (3) 降升 214，如“公有”的“有”。
- (4) 低升 12，如“友好”的“友”。
- (5) 低降 31，如“有利”的“有”。
- (6) 全降 51，如“年幼”的“幼”。
- (7) 高降 53，如“右面”的“右”。

若用双音节的詞語为例，就可看出这七个調值出現的环境有同，有不同。

前	55	35	214	51	53	24	211
后	55	灯光	重新	杏花			馬鞍
35	金錢	人民		后門			小时
214	开水	营养		上等		保險	
51	青菜	行政			注意		馬路
53							
24							
211							

归纳音位要有几个条件。同音位的必定是：各有环境，相伴出现，互相补足，不成对比，不起(语义)差别。现在我们就可以按这些条件检查一下上面的表。在双音节的词语中前后都出现有55, 35, 51三个(只有51·51是例外)，只在前边出现的有24, 211, 53三个，只在后边出现的有214一个。可注意的是只在前或只在后出现的，这正表示了它们是“各有环境”的。如214绝不见于前，53, 24, 211绝不见于后，这就可以进一步探索它们的关系了。

先看24和211，两个都只在前不在后，大环境相同，可是“共性”中有什么“特性”没有呢？有的，24永远在214前边，211永远在55, 35, 51前边。这就是“相伴出现”的调值各有不同。同时，和24相伴的只有214，而没有55, 35, 51；和211相伴的有55, 35, 51，恰好没有214。这就是“互相补足”。可以肯定，24和211是同一个音位。它们俩只在前出现，214只在后出现，正可以“互相补足”而且永远“不成对比”。所以214和它们俩是一个音位。再看看是不是符合语义“不起差别”这个条件呢？比方同是一个shǒu(手)的音节，在“手心”一詞中它就是211，在“手掌”一詞中它就是24，在“举手”的詞組中就是214，调值虽不一样，但是听见这个声音的人没有人会是三个不同的东西。

不过，绝不只在后出现的还有一个53，和它们有关系没有呢？没有！因为凡出现53的地方也可以出现211，如“注意”(53, 51)和“马路”(211, 51)。这就成了对比，证明53和“211, 24, 214”不是一个音位。53是一个独立音位么？也不是，因为它正好和51互相补足。51可见于前，可见于后，只是不见于51的前边；而53正补这个缺，而且它唯一的环境就是这里。由此可知53和51是同一个音位。如一个shù(树)的音节，在“树叶”一詞中是53，在“松树”一詞中是51，语义不起差别。

最后再看55, 35这两个调值和“211, 24, 214”这一类，和“53, 51”这一类，都能成对比，起差别；它们彼此

之间也成对比，起差别，例如：

“接收”(55, 55)，“接手”(55, 214)，“接受”(55, 51)；“光大”(55, 51)，“广大”(211, 51)；“生熟”(55, 55)；“升旗”(55, 35)，“生气”(55, 51)；“减荣”(53, 51)，“莧荣”(53, 51)。不必多举，只从这些就可以肯定是两个独立的音位。

这样一来，七个调值归纳为四个声调音位，即是：

(1)“高平”(55)，历史相沿，这个调类叫做“阴平声”。

(2)“中升”(35)，历史相沿，这个调类叫做“阳平声”。

(3)“降升”(214)，“低升”(24)，低降(211)；以“降升”为典型，以后二者为变体。历史相沿，这个调类叫做“上声”。

(4)“全降”(51)，“高降”(53)；以“全降”为典型，以“高降”为变体。历史相沿，这个调类叫做“去声”。

另外再加上“轻声”这一个特别的短弱声调音位，共是五个声调音位。

现在一般在北京语音的教学中，把53叫“半去”，把211叫“半上”，指为去声、上声的“变调”。把24认为是35，说是上声转化为阳平。把24说成35，在一般教学上为了解说简便，是可以的。学习起来，一度之差，也说不到什么精确不精确。但是细细试验，24与35究竟有别。例如：

他姓刘，叫“刘五”(35, 214)；我姓柳，叫“柳五”(24, 214)。人这么多，要“挤死”(24, 214)了！别着急，“急死”(35, 214)也没用。

“柳五”和“刘五”，“挤死”和“急死”，确实是有区别的。“柳”、“挤”分明低得低，升得不太高，和“刘”、“急”的“中升”不一样。我们这样分析，不但近真，并且对于北京语音声调音位的归纳也是有利的。归纳出声调音位，在教学时、研究时，十分清爽；可以避免上声变阳平“调类转化问题”的混乱。（“一、七、八、不”的变调与此不同。）当然，对初学北京语音的人，要不要这样提，是需要考虑的。

安徽省召开方言普查工作会议

安徽省教育厅于4月1日召开了安徽省方言普查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安徽师范学院、合肥师范专科学校的代表和在安徽了解方言普查情况的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同志。

会议通过了“安徽省方言普查工作计划”，并决定成立“安徽省方言普查指导组”、“安徽师范学院方言普查工作组”、“合肥师范专科学校方言普查工作组”。

会议决定：全省74个方言调查点的调查任务，由安徽师范学院、合肥师范专科学校和普通话语音研究班本省毕业学员（未在师范院校工作的）共同担任。在今年年底前应该完成的方言调查任务分配如后：安徽师范学院40个点，合肥师范专科学校24个点，普通话语音研究班本省毕业学员（未在师范院校工作的）10个点。

会后，普查工作组即根据“省方言普查工作计划”，着手拟订工作组的工作计划。安徽师范学院方言普查工作组已经决定在中国语文系高年级学生中，培养一批参加方言普查工作的干部，以便在暑假时，开展较大规模的方言普查工作。

为了保证有效地执行“省方言普查工作计划”，指导组决定：在年底以前，对方言普查工作组的工作进行三次检查。

在会议举行以前，安徽省教育厅、安徽师范学院、合肥师范专科学校就已经调查了安徽部分地区的方言，为全省方言普查打下了基础。（杨长祚）

关于普通話音位

程祥徽

从物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語音現象，任何一种語音系統都是極其紛繁而杂乱的；如果从語言学的观点(即社会的观点)来观察語音，則任何一种語音系統都是(相对的)簡單而有規則的。这是因为語音的本質屬於社会。語音在語言学上的分类比之物理学、生理学的分类要簡單得多。两个(或两个以上)最小語音單位之間如果存在着辨明詞义的关系，才把它們看作不同的音位。音位就是指某种語言(或方言)能够辨明詞义的最小語音單位。^① 音位学就是研究某种語言(或方言)音位系统的科学。音位学是語音学的一个組成部分，沒有音位学，語音学作为一門真正的科学也就不可能存在。可是今天还有人不能認識到这些基本問題。史存直先生說：“音位学可以看做語音学里面的一个特殊部分，也可以讓它脱离語音学而成为一門独立的科学。”^② 語音学如果失去了音位学，那么紛繁的語音归类便不可能准确、可靠，而沒有准确、可靠的語音分类，誰也不会認定語音学能够成为一門科学，正如沒有准确、可靠的元素分类不能使化学成为真正的科学一样。因此把音位学从語音学中抽掉，实际上就否定了語音学的存在。史先生的看法是不能为人們接受的。

其次，史先生还談到“对音位来講，重要的并不是音的客观性質，而是人的主观感觉。”“心理作用在語音中的主要成果是使語音‘类化’，即使声音明显分为若干类”，而史先生所說的語音“类化”(即語音的分类)指的就是音位的归纳。他說：“……从事研究語音的綜合一面，即联系到語音的表达功能来研究語音的分类問題。这就是所謂‘音位学’。”不难看出，史先生認為音位的归纳(即他所說的語音“类化”)，不是决定于語音的社会作用，而是决定于人們的心理作用。这是錯誤的。一切語音的本質都是社会的。在社会的交际中，某几个声音在詞义的表达上沒有区别，人們就把这几个声音划为一类。語音的分类是社会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什么“心理作用的主要成果”。我并不否認語音中的心理作用，但对于語音說来，心理作用是次要的、非本質的，而且心理作用(如腦中語言观念的产生等等)永远以“社会”作为依据。因此在我们談到語言問題时首先得牢牢抓住語言的社会本質，否則常常容易着重心理方面或其他方面以致采取唯心主义的觀點。

具有不同声調(四声)的元音，是否能独立成一个

音位？声調是附在音节上还是只附在元音上？这是归纳普通話音位的一个原則性問題。在这个問題上目前有兩種不同的見解：史存直先生認為“調是附丽在整个音节上”；傅懋勛、張靜兩先生認為“声調单独附丽在元音上”。^③

在史先生看来，音素拼合成音节(这音节可能是單音素，也可能是音素的結合)以后，再在这个完整的音节上附上声調。例如“罵”字，由 m 和 a 拼合成 ma，再在 ma 上面加上声調。把史先生的看法用公式列出来將是这样： $m+a=\boxed{ma}$ 。而傅、張兩先生却主張声調是元音的屬性，音素相同而声調不同的元音應該看作是不同的音位的元音。^④ 傅、張兩先生的公式是： $m+a^{\prime}=\boxed{ma^{\prime}}$ 。这两种观点有其共同的地方，就是都承認声調在普通話里具有辨明詞义的功能；也有其不同的地方，就是，例如，“媽、麻、馬、罵”四字在史先生看来元音是相同的，格式是： \boxed{ma} 、 $\boxed{ma^{\vee}}$ 、 $\boxed{ma^{\prime}}$ 、 $\boxed{ma^{\prime\prime}}$ ；而在傅、張兩先生看来元音是不同的，格式是：

$m\boxed{a^{\prime}}$ 、 $m\boxed{a^{\vee}}$ 、 $m\boxed{a^{\prime\prime}}$ 、 $m\boxed{a^{\prime\prime\prime}}$ 。这样在归纳元音音位时，假定兩派共同認為普通話里有 6 个基本元音，那么傅、張兩先生的元音音位数目就会是 24 个，而史先生的元音音位数目只有 6 个，即前者是后者的四倍。

到底哪一种論点可信呢？我認為傅、張兩先生的論点更加合于普通話音位系統的特点。

声調能够区分普通話的音位，这是誰都得承認的，但是如果采取史先生的說法就会在普通話的音位系統上看不出这一特点来。这里涉及到对音位定义的了解上来了。音位，在我们看来是某种語言(或方言)能够辨明詞义的最小語音單位。这个定义包含了兩層意思：其一是辨明詞义；其二是最大的語音單位。很明显，

① 參看張靜《談北京話的音位》，《中國語文》1957年2月号，13頁。

② 史存直：《北京話音位問題的商榷》，《中國語文》1957年2月号，以下引文同此，不易注。

③ 參看傅懋勛《北京話的音位和拼音字母》，《中國語文》1956年5月号；張靜《談北京話的音位》，《中國語文》1957年2月号。

$[ma]^{-}$ 、 $[ma]^{'}$ 、 $[ma]^{v}$ 、 $[ma]^{^}$ 是四个辨明詞义的复杂語音的結合； $m[a^{-}]$ 、 $m[a^{'}]$ 、 $m[a^{v}]$ 、 $m[a^{^}]$ 里的 $[a^{-}]$ 、 $[a^{'}]$ 、 $[a^{v}]$ 、 $[a^{^}]$ 是四个辨明詞义的最小語音單位。复杂語音結合絕不等于最小語音單位。但是只有辨明詞义的最小語音單位才是音位，辨明詞义的复杂語音結合不算是音位。这样，在史先生归納的音位系統中就根本看不到声調的作用和地位了。所以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史先生的論点实际上是在普通話音位系統中抽掉了声調的特点。当然这就絕不能為我們所接受。

問題还在于声調究竟是不是元音的屬性。我对于这个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們知道，从汉代以来，粗淺地說，反切拼音法的切上字代表声母部分，切下字代

表韵母部分和声調。我們的前人在一兩千年前就懂得了声調是附在元音上的这个道理。但这并不是我所說的声調附在元音上的理由，因为这也算不上是什么理由。我認為普通話的每一个元音都可以独立地成为一个音节；在有輔音拼合的音节中，元音也是不可缺少的。每一个音节都有四声的區別，我們把声調附在元音上实际上就是附在整个音节上了；再則，如果我們承認不同声調的最小語音單位應該归为不同的音位，那么就应当考虑声調究竟附在音节的哪一个成分上了——附在輔音上呢还是附在元音上呢？声調附在輔音上是不可想像的，因为普通話的輔音不能独立成为一个音节，它們絕大多数是無声的清音，試問不能成功独立音节的这些輔音怎能肩負得起声調的重担呢？声調附在元音上才是可能的和客觀的。

“連”字是助詞

張友建

黃誠一同志在《談“連”字》一文（見本刊1956年10月号）中說，“連”字的性質非常接近“越……越……”、“一……就……”这种关联副詞，“因此归做一类似乎比較妥當。”我不同意这个說法，我認為“連”字应当归入助詞，是个特殊的語气助詞。

先說“連”字不应归入关联副詞的道理。关联副詞如“越……越……”、“一……就……”之类有三个特点：1)不是可用可不用的；2)用的时候一般要成对；3)每个关联副詞一定是跟動詞（或形容詞）組合，修飾動詞（或形容詞）的。例如“祥子一跑，就喘不过气”（老舍），这个“一”和“就”不能省掉，而且必須互相呼应；其中“一”修飾“跑”，“就”修飾“喘不过气”。这种用法，極少例外。“連”字就完全不同。看样子，“連”字也和別的虛詞互相呼应。如：

別說尸首，連一点血也沒看見。（管樺）

这天宋师父整整一天連門也沒出。（馬烽）

人都滿了，連立足也難。（魯迅）

可是这样用法的“連”字往往可以去掉。其次，“連”字虽然也能跟動詞組合，但是也常常跟名詞或代名詞組合。黃誠一同志所分析的“連”字的三种情况：1)“連”字后是主語；2)“連”字后是宾語；3)“連”字后是謂語中心詞。*除第三种情况（如“連看都不看”）可以說是跟動詞組合外，(1)(2)两种情况一般都是跟名詞或代詞組合。副詞一般地說是不能跟名詞、代詞組合的。因此从語法特点上說，“連”字跟关联副詞並沒有多少基本的共同点。

为什么說它是特殊的助詞呢？助詞有三类：1)結構助詞；2)时态助詞；3)語气助詞。“連”字在句子里只是帮助副詞（也、都）来加强語气的。它有提頓兼表夸张的作用。因为是提頓，所以能放在主語前面，也能放在宾語和謂語中心詞前面。它放在哪个成分前面就是提頓哪个成分。黎錦熙先生只注意到“連”字放在宾語前面，所以說“連”字是“特介提宾”，这种說法当然是不够全面的。“連”字的作用是提頓說話的人要着重的成分。不要提頓某个成分，話这样說：“这天宋师父整整一天沒出門”，“秧歌队的演員們都笑得蹲在地上直不起腰来了”。要提頓句中某个成分，說就这样說：“这天宋师父整整一天連門也沒出”（馬烽），“連秧歌队的演員們，也都笑得蹲在地上直不起腰来了”（馬烽）。

我們知道語气助詞有个特点是不一定要用，用了的話就加上一種語气。“連”字正有这个特点。不过一般的語气助詞都用在句尾，而“連”字只用在句首或句中，所以說“連”字是个特殊的語气助詞。“連”字所表达的語气就是加重某个成分，表示意义上的夸张。就上面的例句說明一下：一个人通常总是要出門的，可是現在宋师父不出門了，一个人至于不出門，这豈不夸张了宋师父的气憤嗎？秧歌队的演員們正在表演，不会笑的，可是这些演員竟然笑到“蹲在地上直不起腰来了”，这豈不是夸张了宋师父的滑稽嗎？所以我說，“連”字是有提頓某个成分兼表夸张的作用的。用了“連”字，話节省了許多，而意义上的夸张却一样能表达出来，这正是漢語虛詞的妙处。

正因为“連”字是帮助副詞的，所以表面上它們好像一对关联副詞。但是“連”可以不用，而副詞（也、都）一般不能不用。“連”字虽然可以不用，但是用了“連”字，夸张的語气就表現得更加充分。

* 編者按：“連”字后面的句子成分其实也不限于这三种，如“他連看戏都不去”中的“看戏”，一非主語，二非宾語，三非謂語中心詞。而且“連看都不看”里的前一个“看”字也不能分析做謂語中心詞，因为謂語中心詞是后一个“看”字。

汉语的声调在音位系统中的地位

尹仲賢

声调是汉语语音构成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因此，人们在研究汉语音韵的时候都特别重视声调的问题。在描写汉语音位系统时，人们也要考虑如何把声调放在一个适当的地位。目前在描写音位系统时，对声调的处理有三种说法：

1. 把声调看成是独立的音位，和辅音音位、元音音位并重，有几个声调就作为几个声调音位。例如说：北京话有四个声调音位。

2. 把声调看成次于辅音音位和元音音位的东西：辅音、元音都称“音位”，而声调称“调位”。例如说：北京话有四个调位。

3. 把声调和元音结合在一起看，认为声调是区分元音音位的成分（间或也区分辅音音位），每个元音出现几个声调，就分成几个元音音位。例如说：北京话有四个[a]音位：a¹, a², a³, a⁴。①

前两种看法早就有许多人用过。最后一种看法是傅懋勳先生在《拼音汉字中的声调问题》②一文中，介绍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语言学顾问谢尔久琴柯教授在讲课和讨论汉藏语系语言问题时提出来的见解。傅先生赞同这个说法，并且在《北京话的音位与拼音字母》③中实际上根据这种见解，整理出北京话的音位系统，其中共有19个辅音音位和52个元音音位。张静先生的《谈北京话的音位》④，支持傅先生的看法，并加以补充，认为轻声也应和阴、阳、上、去调一样看待，结果整理出北京话的音位有57个，其中辅音音位22个，元音音位35个。史存直先生的《北京话音位问题商榷》（同期）反对傅先生的看法。虽然我的思路和史存直先生在某些问题上接近的，但是我觉得史先生还不能发现傅先生的理论关键，致使讨论还没有完全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傅先生在《北京话的音位与拼音字母》一文中整理出来的北京话的音位系统（特别是元音音位）的“理论”根据，见于他的《拼音汉字中的声调问题》一文。本文想就这篇文章所提出的一些论点

和傅先生商榷。

为什么同是一个汉语声调会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呢？关键不在于元音和辅音的系统跟声韵调的系统混与不混，而在于对音位和声调性质的了解上的分歧。

前两种见解，特别是第一种，几乎普遍地见于过去的方言或语言调查报告中。持这种见解的人虽然认识到了汉语声调的重要并把它看成是音节的音高变

化，但是在整理音位时把声调独立起来，算是声调音位就出了毛病。正像傅先生所批评的那样，他们忘记了声调不能单独发音，这些所谓音位因此失掉了物质基础。“调位”的谈法，也同样没有摆脱这种窘状。

谢尔久琴柯教授和傅先生的见解是明确的，把声调和元音结合起来当作区分元音音位的成分。但傅先生的见解却仍是值得商榷的。

确定汉语的声调在音位系统中的地位，首先要搞清楚汉语声调的特性。元音有几个声调就分成几个音位的说法的前提，是认为汉语声调有区别词义和形态的作用，并把声调看成是辅音和元音的（明显的说是把它看成是纯元音音素的）音高变化。我和傅先生的分歧就在这儿，我认为声调是音节的而不是音素的音高变化。不仅是汉语，我认为所有有声调的语言，它的声调都是这样。

脱离开词，读单个字音，人们常用平调发音。当然，在汉语中，除清辅音外，读元音、浊辅音及半浊鼻边辅音也能发出不同的音高来，但这是毫无意义的。声调具有意义只能是在音节当中。在北京话里，i¹衣、i²移、i³以、i⁴意；u¹屋、u²无、u³五、u⁴勿，能读出不同的四种音高之所以有意义，在主张把声调和元音结合在一起看的人说来，这声调是元音的音高，声调是区分元音音位的依据；可是，这里的i和u已经不能当作单个元音音素看待，而是它们各自已经构成一个音节，否则这种声调的差别也就毫无意义了。吴语和粤语等方言中的单个的鼻辅音读出不同的声调之所以有意义，同样也是因为这些辅音已经构成音节。这种现象对于把声调和元音结合在一起看的人，的确是个大难题，只好在“声调是区分元音音位的成分”下面的括号里加上一句“间或也区分辅音音位”。既然肯定声调是元音的音高，区分元音音位的成分，为什么还能“间或区分”辅音音位呢？这不是互相矛盾吗？傅先生的文章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会“间或区分辅音音位”。矛盾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把本不是元音所独占的声调看成是元音的音高。如果把声调看成是整个音节的音高，浊辅音有声调很容易解释，并

① 这三种看法引自《语言调查常识》第3讲，69页。

② 见《中国语文》1955年9月号，18页。

③ 同上，1956年5月号，1页。

④ 同上，1957年2月号，13页。

且不会出現这种矛盾。汉语的語音，不論它是元音音素或是輔音音素，成音节才有声調，离开音节便沒有声調。一个方块汉字，其語音結構就是一个音节，因此称汉语声調为“字調”的傳統說法是很实际的。这种說法的本身已經表明汉语的声調是整个音节的音高；用这种术语的学者們正是把汉语的声調当作整个音节的问题来对待的。

在汉语的每一个方言里，一个音或几个音組成一个音节，这个音节有它的一定的相对的音高——声調。这种一定的相对的音高是貫串在該音节的每个音素上的，例如，ma¹媽、ma⁴麻、ma⁴馬、ma⁵罵，这几个音节各有各的声調。每个声調都是貫串在整个音节中的各音素上，音素联結在一起發出一个完整的声調，并不是每一个音素發出一个相同的調。例如：“南”这个音节不是 n¹ a¹ n¹ 而是 nan¹。我們从这个簡單的事实里边就可以看出調是整个音节的而不是單个音素的音高問題。过去有人把一个音节分解为“头”（声母）、“頸”（介音）、“腹”（主要元音）、“尾”（韵尾）、“神”（声調）五个成分，說“神”（声調）是貫在全身（整个音节）的精神的比喻是很符合汉语的語言事实的。五度标調符号的制訂及其表示法也合于汉语声調的特点，五度調号是划在一个音节的后边表示它是一个音节的音高。傅先生是主張“声調是区分元音音位成分”的，認為汉语的声調是一个音节中的主要元音的音高，因此把我們上列音节的声調情况解釋成元音声調的鋪开。例如說 nan¹（南）、ma¹（媽），其音节中的声調是[a]元音的声調，其他音虽然能感觉出声調来，是由于[a]音的調向后“鋪开”。在主要元音的前或后的鼻輔音 n、m、ŋ，濁輔音 ʒ 或元音 i、u、y、e、是有声的、可以延長的一些音，主要元音的声調就有可能前后“鋪开”，結果就使声調“鋪”在整个音节上。^①这样的解釋是不妥当的。如果这样的条件是可能的話，也会适应于音的長短問題。可是我們知道音長的問題并不是这样。例如，广州話的“街”[ka:i]和“雞”[kai]，“三”[sa:m]和“心”[sam]的不同是因为“街”、“三”音节中的 a 比“雞”、“心”音节中的 a 長。可是这个主要元音 a 的音長並沒有“鋪开”到 i 或 m 上。也許有人会怀疑我这样举例是把音高和音長等同起来了，其实不是这样，我这样举例正是要把音長和音高的不同性質区别开来。在相同的条件下，音長之所以沒有产生所謂“鋪开”的問題，正說明音長与音高不同，它是單音素的延長。在音高上有人会提出所謂的“鋪开”，問題正是因为音高与音長不同而是整个音节的音高（声調）。

就北京話來說，清輔音作声母的音节，声調在这样音素上是感觉不到的，也是不存在的。例如：[paŋ]（帮）、[fa]（法）等音节中的[p]与[f]音素上是听不

出也不存在声調的。这种現象能否作为否認声調是音节的音高并从而構成主張是元音音高的根据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史存直先生对这个問題的回答是：“…对音位來講，重要的并不是音的客觀性質，而是人的主觀感觉。只要一般人都感觉声調是附丽在整个音节上的，縱令你用仪器測驗，証明某些声母沒有声帶振动的，也絲毫不能够改变人的主觀感觉。”^②我不滿意这样的回答，并且認為史先生过分地強調主觀感觉是不够妥当的。这和史先生在文章一开始把所謂語音的“类推”看作是心理作用在語音中的主要成果的观点是一致的。心理学主义的語言学者所以把音位学叫作“心理語音学”，就是因为他們夸大了心理作用。如果有人真的提出了声調和清輔音無关的理論来駁我，在討論音位时我也不拒絕回答。在汉语中是有这样的事实存在，这是这些輔音本身性質造成的。人們在發清輔音时，作为彈性物体的声帶根本不颤动，这样的音素仅仅是一种气息，因此就談不到也不存在音高的問題。因为这样，音节中作为声母的清輔音就無声調。但是，从此并得不出声調不是整个音节的音高的結論。即使汉语中所有的音节都是以清輔音做声母，也不能把声調看成为元音的音高，只能看成是韵母的声調（“韵調”的說法也不能成立），也不能把声調看成为区分元音音位的成分。

不把声調单独和元音或輔音結合一起，而把它和整个音节結合一起来看，这絕不等于說我是使声調脱离了“自然物質”。因为大家都知道声調是不能单独發音的，現在既然把声調和整个音节結合起来对待，这就意味着声調的物質基础是整个的音节。我認為如果把声調看成为整个音节的音高，并且承認它有物質基础，就不会把声調孤立出来算作“声調音位”或“調位”，也不能把它当成区分元音音位的成分。从音位的概念看来，音位只能是一些簡單的音素構成的基本的典型的語音單位，而不能是一組一組的整个音节。所以在处理音位时，只能把它看作是識別一个音位諸变体的条件之一。这样处理是符合音位理論的。它在音位系統中的地位仅是作为識別音位变体的一种条件。

总结我个人的基本看法有如下三点：

（1）声調的作用。問題只在于不能只看到声調有区别意义这一点，就把它当成音位或区分元音音位的因素。因为不是一切可以区别意义的因素都可以当作音位来处理。还要看它的物質基础是不是最簡單的基本語音單位。作为整个音节的音高的声調，显然不具备这一条件。

（下轉 30 頁）

① 見《中國語文》1955年9月号，19頁。

② 見《中國語文》1957年2月号，12頁。

尖音系統不應該恢復

——駁《論尖團音》

李 濤

大家知道，北京語音是沒有尖團音的區別的。普通話的語音既已確定以北京音為標準，按一般的情形看，尖團音問題似乎沒有再提出的必要。但是徐世松先生在《論尖團音》^①一文中仍然認為有必要提出這個問題，並且根據四個理由，主張北京語音恢復尖音系統，主張拼音文字用字形表示尖團音的區別。

提出問題反復討論是好的，不過徐先生所提出的理由都是沒有力量的。現在試就徐先生所提的理由來商討一下。

第一，說“尖音系統有歷史依據”，這是事實；但是並不能據此證明北京語音需要恢復尖音系統。

古漢語里有過尖音，而現代北京音里沒有尖音，這不同時間的兩件事情聯繫在一起，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漢語在發展過程中，由於北京話當初創造了不分尖團的條件，因而逐漸以至最後消滅了尖團的界限。

如果現代北京話已經喪失了过去所創造的條件，恢復尖音系統的意見是可以考慮的。但是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人發現這樣的事實——北京話如果不恢復尖音系統，它的工具作用就會削弱。

語言是社會現象，它的發展與變化不以人們的愛憎為轉移。要不要恢復尖音系統，北京話本身就會圓滿地回答，不必另外去找根據。既然北京話本身不需要尖音系統，有什麼理由一定強使它恢復拋棄了的語音？

恢復尖音的嘗試，歷史上有人作過，結果是失敗了。要想走通前人走不通的路，就需要有新的發現，不然是不會成功的。“古漢語有過尖音”，過去也有人把它作為恢復尖音的根據，但事實證明它是沒有力量的。不增加新的內容，今天把它重新提出，因為條件相同，它仍然是沒有力量的。“有過尖音”不能成為“現在也必須有尖音”的理由。

第二，說“方言有尖音”，也是事實，但是要注意，方言必須服從普通話。

一個地區廣大、人口眾多的民族，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有着分歧的方言，是語言發展的必然現象，而分歧的方言最後統一於民族共同語，則又是語言發展的必然結果。漢民族雖然有着分歧的方言，但是更重要的是，已經有了民族共同語。其語音就是北京語音。北京語音是按照自己的內部規律發展了的北京方音，不是漢語方音的綜合體。其所以如此是受這一規律支配的：

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過程中可以成為民族語言底基礎並發展為獨立的民族語言。……至於說到這些語言中的其他方言，那末它們喪失了自己的獨特性，溶入這些語言中，並在這些語言中消滅了。^②

漢語的尖音系統，對民族共同語說，它是方言的語音，它遲早是要喪失其獨特性而溶入於北京語音之中的。這一點徐先生也承認，如說：

尖團界限的消滅，……是一種或數種方言在語音演變中的一種現象，這種現象由於方言間的互相接觸（交際）、影響而擴大到較廣的範圍。^③

今天，由於社會不斷發展，方言接觸更為頻繁，方音受北京音的影響更大，因而尖音系統併入團音的現象也就會很自然地擴大到更為廣泛的範圍。

從語言發展的趨勢看，尖音系統在漢語標準音中是保留不住的，我們不應該把希望寄託在主觀願望上。如果因為方言里有就要保留，那麼清濁的區別、輔音韻尾的系統等是否也應該保留在漢語的標準音里呢？如果不保留它們，那麼為什麼又一定要保留尖音系統呢？所以偏愛尖音系統的道理何在，是無法作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來的。

有人說，恢復尖音系統可以便利尖音區的人學習普通話。這是一種幻覺。某些同志所主張恢復的尖音，將是古代精清（從）心（邪）的系統，也就是過去所謂“老國音”的系統，而方言中的尖音則又都是土生土長的，它們之間有着很大的差別。因此，不管拼音文字有無尖團的區別，方言區的人學習，如果說方便，就都方便，如果說不方便，就都不方便。例如普通話的“借光”，不管定為 $\text{ɿ} \dot{\text{i}} \text{e} \langle \text{x} \rangle$ 或是 $\text{p} \dot{\text{i}} \text{e} \langle \text{x} \rangle$ ，尖音區的人都能夠發出這個音來，這是方便；如果說不方便，尖音區的人對於這個讀音都得重新學習。既然是這樣，與其叫能講普通話的人也學 $\text{p} \dot{\text{i}} \text{e} \langle \text{x} \rangle$ ，就不如只叫尖音區的人學 $\text{ɿ} \dot{\text{i}} \text{e} \langle \text{x} \rangle$ 了。恢復尖音對尖音區的人也沒有什麼方便；但對非尖音區的人卻很不方便。因此，“方言有尖音”不能成為北京語音恢復尖音的根據。

第三，尖團音的區別並無利於同音詞問題的解決。

① 見《拼音》1957年2月號。

② 《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43—44頁。

③ 《拼音》1957年2月號，4頁。

北京語音里既然沒有尖團音的區別，在普通話里也就不存在利用尖團音來解決同音詞的問題。如果說尖團的區別只表示在書面上(拼音文字的)，而口語里可以不區別，或是“不十分熟練也不要緊”，誠如徐先生所說：

(這)是一個不成功的假設。要正確地在書面上分尖團，必須正確地在口語中也分尖團，口語中不能正確地分尖團，書面上正確地分尖團會有什麼結果？這等於孤立運用歷史原則，結果會像英、法文的發音與寫法分歧一樣。^①這個分析是正確的，如果從這個原理出發，就會得出拼音文字不必分尖團的結論，因為普通話的語音是不分尖團的。但這與徐先生的原定目的不合。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所以徐先生特別強調要在口語里恢復尖音，正確地區別尖團音。其實，這種願望是違反語言發展規律的，是實現不了的。

拼音文字不能脫離語音，口語里既然沒有尖音，書面上也不應該有尖音。但是如果尖音的恢復確實能夠解決同音詞問題，對於拼音文字的建立有着決定的影響，那還是值得考慮的。然而經過統計調查，發現“尖團的區別有利於同音詞問題的解決”一說並沒有根據。

過去我統計過 1529 個同音詞，結果區分尖團音仅仅能夠解決百分之六即 92 個同音詞。^②如果統計的詞再多一些，尖團音的功用就會更小。例如“機柄”、“疾病”，徐先生認為“分了尖團，同音詞問題就不存在了”，但是再加上一個“急病”，同音詞問題還是不能解決。詞彙是要隨着社會的發展而豐富的，詞的數目會一天比一天多，而詞的數目越多，尖團音區別同音詞的功用

就越小，所以說，尖團音的區別並不會有利於同音詞問題的解決。

同音詞問題在書面上需要解決，到目前為止，比較為多數人同意的辦法是：標注聲調，一音多形。有這兩種辦法已經可以全部地解決問題，如果再區別尖團音，就會徒然增加學習拼音文字的困難。估計尖團音有利於同音詞的解決是不能成為恢復尖音系統的理由的。

第四，區別尖團音會給很多人帶來極大的困難。

認為區別尖團音不會給只有團音的人們帶來很大的困難，是一種沒有根據的樂觀估計。要在非尖音區的口語里恢復尖音系統，不用說，是不可能的。就是僅僅在書面上分開，也是很困難的。因為“拼音文字的尖音寫法對於沒有尖音的人們來說，是文字的一種脫離語音的特別寫法，要想學會，只有死記。”而尖音音節 38 個，組成的語詞可以多到成千上萬，要想“完全記住，不是很簡單的事情。”^③ 1920 年公布的“老國音”終於不得不在 1932 年廢除，並改用“新國音”，主要就是因為沒有人能夠學會和記住那些奇特的讀音。失敗的經驗必須記取，現實必須正視，研究問題必須從實際出發，以樂觀的估計作為立論的根據，是沒有說服力量的。

這本是個老問題，自從前年決定“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這個問題應該說已經解決了；因為不了解為什麼還有人想翻案，所以我也不得不舊話重提。

① 《拼音》1957 年 2 月號，6 頁。

② 《中國語文》1955 年 7 月號，11 頁。

③ 同上。

(接 28 頁)

(2) 元音輔音的系統和聲韻調的系統仅是分析漢語語音結構的不同方法，雖然就元音輔音的系統研究漢語語音，不能說漢語沒有聲調；可是也不能說就聲韻調的系統來研究，就要把聲調看成音位。問題不在於兩個系統的分或混，而在於聲調的性質。如果聲調是音素的，那末從哪一個系統來研究也應把它當作區分音位的因素。聲調不是音素的而是音節的，那末，不管兩個系統是分是混，都不能把它看成是音位。順便說一下，我不同意史存直先生的意見：認為照聲韻調的系統劃分音位，注音字母就可以作為北京音位系統的代表，把 17 個韻母看成是 17 個音位。因為韻母特別是復韻母，它不是一個最簡單的語音單位。我也不認為由於使用不同的拼音字母就可以把一種話劃成不同數目的音位。因為文字是服從語音的，不是語音服從文字，儘管你使用不同的文字，也不能根本改變語音的特點。一個語音不會有兩樣的特點，如果在認識上統一了，

儘管你使用幾種拼音字母，也不會得出幾個音位系統來。

(3) 我不把音高構成的區別當作音位，但並不主張把音長構成的區別排斥在音位範圍之外。我不同意傅先生的說法：“既然‘音長’（長短）能區別元音音位，構成聲調的‘音高’（高低）當然也可以區別元音音位……”。^①也不能反過來說，我既然不把構成聲調的音高當作區分元音音位的因素，也就是不承認音長可以區別元音音位；因為我們不能機械地對待一切語音的特性。音長所構成的區別在區別意義功能上與聲調都是一樣的，但在其他方面就不同了。音長是一個主要元音的延長，不是整個音節的延長，而聲調却是整個音節的音高。正因為這樣，音長可以根據具體語言的情況算是區分元音音位的因素，而聲調却不能。

① 見《中國語文》1955 年 9 月號，18 頁。

清代的古音学創始人顧炎武

——中国語言学史話之六——

王 显

一 生平簡述

顧炎武是江苏崑山人。学者称他为亭林先生。1613年，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官僚的家庭里。他的兒童时代正是明朝統治政权腐化动搖的时候：一方面，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在各地爆發着、蔓延着；另一方面，滿族的侵略者也在貪婪無厭地蚕食着中国的領土。在这样一种内外政治形势之下，他的祖父和养母給他灌輸了一些封建的教育和介紹了许多爱国英雄的故事，这給他一生的政治活动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1644年，滿族侵略者占据了北京，統治了中国。第二年，他兩度参加了当地劳动人民和爱国人士組成的起义軍，但都失败了。在这期間，他的生母和弟弟們被侵略軍杀伤和杀死，养母也絕食自杀，并且留下悲壯沉痛的遺囑：不要作滿清的奴才。这些活生生的有切膚之痛的慘事，更加有力地錘煉了和深刻地教育了起义失败后的顧炎武，使他后来能够坚持爱国节操，成了我国成熟起来。所以这些巨著的完成并陸續刻板行世，都是在他五十四岁以后。根据吳映奎、張穆、席咸所考見的書目，他的著作約有40多种，400多卷。与語言学方面有关的主要著作有《音学五書》38卷，《韵补正》1卷，《唐宋韵补异同》（未刻），《九經誤字》1卷，《石經考》1卷，《金石文字記》6卷，《左傳杜解补正》3卷等書，此外多散見于《日知录》中，《亭林杂录》也談了一点。



顧炎武像

十七世紀中一位杰出的爱国大学者。此后的二、三十年間，顧炎武在黃河南北奔走亡命，走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陝西等地，每到一处，就交結当地抱有故国感情的豪紳，指望和他們共圖恢复。对于当时的一些农民起义軍，由于他的阶级出身以及兒童时代所受的封建教育的限制，他却非常害怕，甚至仍然敌視他們而不敢跟他們結合。这当然就注定了他的意圖只能是个幻想而不会成为事实。1682年，惓惓不忘故国的顧炎武，終于只能帶着他的幻想离开了人間。

顧炎武很早就在他祖父的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他的几部巨著如《天下郡国利病書》、《肇域志》、《日知录》、《音学五書》等都是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开始研究的。那时，他的知識只限于書本上的。后来他参加了革命运动，往后又奔走南北，有了实地的考察，接触了許許多多的学者，这才使他的学識丰富起来，

这才使他的学識丰富起来，

二 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

顧炎武之所以能成为一代的开派宗师，主要在于他对研究方法有所創建，有所革新，并在治学态度上树立了良好的学風。他所創建和革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列三点。

1. 特別注重与社会实际相联系 他不讓自己深深禁錮在學問的象牙塔里，而把學問跟当时的社会問題密切联系起来，把學問当作解决这些問題的工具。他經常关切国計民生的重要問題，如土地問題、稅收問題、学風問題、政权組織問題、人事制度問題，等等，并进而追求这些問題之所以产生以及解决的方法。他的著書立說都是从这一原則出發的。所以也說：“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①“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經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②自然，在阶级偏見的局限下，他对問題的看法以及所提出来的解决办法，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甚而可

① 《亭林文集》卷四，《与人書》之二十五。

② 同上，《与人書》之三。

能是錯誤的和反動的。但是，他這種為着解決當時的國計民生的問題而研究學問的用心，這種理論聯繫實際的治學方法，是值得我們敬佩的。

2. 注意到詳細占有材料，引出結論 他從《論語》中拈出了“博學于文”四個字作為口號，極力反對當時那種“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在他看來，除了書本上的知識以外，凡是環繞在我們周圍的一切，都是我們所借以研究的材料。他認為單從書本上得來的材料不全面，由此而引出的結論，其正確性最高不過“十之五六”^①，要補救這個缺陷，就必須作實地考察。他到外邊去時，總是用驢馬馱着他的原始材料和手稿一道出去，訪問那些富有閱歷的勞動者，仔細核對原始材料和手稿中不符合實際的地方。這個方法，前人如郭造卿^②、陳第^③等都已應用過，不過他又用自己的實踐加以充實、發展，使之成為新的研究方法。

3. 認識到依據時間、地點和條件去觀察問題 顧炎武生長在當時手工業相當發達，並且出現了先進的手工業工場的地區。因此，那些手工業主和工場主們對自由市場的要求，對社會制度作一定改革的要求，不能不影響他的思想。他在《郡縣論一》中說，“知封建之所以變為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聖人起，亦將變而為郡縣。”這實際上就是那些手工業主和工場主們的要求的反映。從這段話里可以看出他已經初步認識到事物是發展的，而且它的發展是一種自然的趨勢，不是任何人的力量所能阻止的。正因為他有這點認識，所以他不固定在一點上來看問題，而是從運動變化中來看問題。例如他不把語音看作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把它分作幾個不同的階段來觀察。^④在考證先秦古音的時候，主要是根據先秦的材料，不讓秦以後的材料去混亂它的疆界；但是又不把秦以後的材料跟先秦古音完全割裂開來。

顧炎武在治學態度上樹立了什麼好的榜樣呢？

首先，他的治學態度是勤懇的。所有跟顧炎武接觸過的人們，都異口同聲地說他從年少的時候起到老死之日止，沒有一天丟開過書本，走路的時候也是邊走邊念。他告誡人們：“有一日未死之身，則有一日未聞之道”^⑤，“君子之于學，死而後已。”^⑥

他的治學態度又是謙虛的。他知道人對於事物的認識是無窮無盡的，不論是什麼的心得和成就，都不可能是人對事物認識的全部的最後的結果，因此對任何心得和成就都不值得驕傲自滿。^⑦他認為驕傲自滿就會把自己的學識封鎖在個人所看到的極其狹小的圈子裡。同時，他又反對自卑，因為自卑就不會去獨立思考，而只一味墨守前人或者依傍別人的成說，也會把自己的學識局限起來。^⑧

他的治學態度又是老實的。他从不抱着門戶宗派的成見，問題是怎樣就是怎樣，既不標奇立異，也不隨聲附和。他極力反對那種不切切實實地深入鑽研，而只浮光掠影，生吞活剝，就寫成著作以譁眾取寵，或者剽竊成說以欺世盜名的壞作風。即使是自己用得功來的，但如前人已經說過，那也應該把這個成果歸之前人，而不應該據為己有。這種態度給了後來的學者極其深刻的影響。

三 古音學和《音學五書》

前人對於古今詞彙的研究很早就寫了專篇，如《爾雅》、《廣雅》和《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當然，這中間也會有因為古今語音的不同所產生的詞彙問題，又漢人鄭玄、劉熙等也指出過古今語音不同的現象，但是他們畢竟沒有寫下談古今語音的專著。後來的學者更沒有重視這個問題，加以系統的研究。六朝時候的絕大部分學者在讀古韻文的時候就只感到用韻有不和諧的地方，却全然沒有意識到這是今古語音發生了變化。碰到這種場合，他們就不加深思地把某字改讀為某音，並且認為古人也是這樣來求和諧的。他們把這種作法叫做“叶韻”“叶句”或

① 參看《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之一。

② 《亭林文集》卷二，《營平二州史事序》：“福之士人郭君造卿，在威大將軍幕府，網羅天下書志略備，又身自行歷薊北諸逆營壘，又遣卒至塞外窮濡源，視旧大寧遺址，還報與書不合，則再遣復按，必得實乃止，作《燕史》數百卷。”

③ 陳第《毛詩古音考·自序》：“又慎子姪之學詩不知古音也，于是稍為考據，列本証旁証二條：本証者，詩自相証也；旁証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錯以諧其韻”。所謂本証旁証都是根據書本上的材料，所謂“宛轉以審其音，參錯以諧其韻”就是參考當時的語音。

④ 參看《音學五書序》。

⑤ 《日知錄》卷七，《朝聞道、夕死可矣》條。

⑥ 《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之六。

⑦ 參看《初刻日知錄自序》。

⑧ 參看《日知錄》卷七《自視歆然》條。

“合韵”。①这种风气到唐代中叶以后更加盛行起来，甚至至于臆改古人文字以求叶韵。宋代的吴棫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古音的。吴棫写了《毛诗补音》、《楚词补音》、《韵补》等书。其中只有《韵补》现在还保存着。《韵补》分五卷，于平声中取“东、支、鱼、真、先、萧、歌、阳、尤”九韵为主，其余各韵则分别注明它们跟这九个韵通转的关系，比如“冬”韵下面注“古通东”，“佳”韵下面注“古转声通支”，“庚”韵下面注“古通真，或转声入阳”。上去入三声基本上是跟平声的这九个韵相承的。乍一看起来，好象他是把古韵分作了九部，实际上并不是的。只要看他把“真、諄、臻、文、殷、元、魂、痕、青、蒸、登、侵”十二个韵合为一类，同时又在这一类里杂收“东、寒、桓、刪、先、仙、庚、耕、談、咸”等韵的字，就可以看出他根本没个界限，差不多每一个韵都可以毫無約束地跟任何一个韵通转。所以，顧炎武在《韵补正》十七真下批評他說：“才老誤以庚耕清青蒸登侵皆通真，而其所收遂至杂入二十余韵之字，予是一字可讀为数音，而决裂部分，蕩弃繩墨，惟其意之所之而無施不可矣。”

跟吴棫同时的郑庠，写了一本《诗古音辨》，分古音为六部。他这本书我們沒有看到，但在熊朋来《經說》和戴震《声韵考》中还能看到它的大綱节目。《經說》中論易詩書古韵一条下說：

詩音旧有九家，吳棫才老作協韵补音，鄭庠作古音辨，吳鄭同時，…為鄭氏之學者，專以真（真）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歡刪山先僊十四韵皆協先僊之音；以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蒸登十二韵相通，皆協陽唐之音；又以魚虞模歌戈麻六韵相通，皆協魚模之音；別以蕭宵爻豪尤侯幽七韵相通，皆協尤侯之音；以侵覃談鹽添嚴咸銜凡九韵相通，皆協侵音。

其中“支、脂、之、微、齐、皆、佳、灰、哈”九个韵沒有談到，据《声韵考》卷三《古音》条小注所作的摘記，它們是合为一部的（毛奇齡《古今通韵，論例》里引到郑書，其中也說“支微齐皆灰五韵皆協支音”，但毛引的是平水韵韵目，显然不是郑書的本面貌，可能他根本没看过郑書，也可能是他把郑書改为平水韵韵目的）。郑庠所說的某韵协某韵之音就是把前者改讀为后者的音，比如把“真”韵的“人”字改讀为“仙”韵的“然”字的音。由此可見，郑庠的分部仍然是建立在叶韵的基础上的。所謂叶韵，就是錢大昕所說“以今韵为宗，强古人以合之”，②也就是江有誥所說的“專就唐韵求其合，不能析唐韵求其分。”③

稍后有个項安世，他从古今語音不同的角度上談到了古韵文的用韵就是很和諧的，并不需要什么叶韵。他說：

凡詩中東字皆叶蕭字韵，南字皆叶侵字韵，下字馬字皆叶朴字韵，母字有字皆叶止字韵…其所通韵皆有定音，非泛然杂用而無別者。于此可見古人呼字，其声之高下与今不同。…而世之儒生独以今《礼部韵略》不許通用，而遂以为詩人用韵皆泛濫無准，而不信其为自然之本声也，不亦陋乎！（《項氏家說》卷四，《詩音》）

不过項安世这段話說得还不很明确，同时他又沒写成專著，所以尽管他有这卓越的見解，可是給与后人的影响却是不大的。

到了明朝末年，焦竑、④陈第兩人才明确古無叶音，陈第并写了《毛詩古音考》、《讀詩拙言》和《屈宋古音义》等專著以論証他們的說法。他說：

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入。于是悉委之叶。夫其果出於叶也，作之非一人，采之非一國，何“母”必讀“米”，非韵“杞”、韵“止”；則韵“社”、韵“喜”矣；“馬”必讀“姥”，非韵“組”韵“黼”，則韵“旅”、韵“土”矣…厥类實繁，難以殫舉。其矩律之嚴，即《唐韵》不啻。此其故何也？（《毛詩古音考》，自序）

夫古今聲音必有异也…自唐以來，皆以今音讀古之辭賦，一有不諧，則曰叶；百有不諧，則百曰叶。借叶之一字而盡該千百字之變，豈不至易而至簡，然而古音亡矣。…先人山木公嘗曰：叶音之說，吾終不信。以近世律絕之詩叶者且寡，乃舉三百篇盡謂之叶，豈理也哉？（《屈宋古音義》，跋）

陈第在古音学上的最大功績在于他闡明了語音随着時間、地点的不同必然發生变异，并且主要地用詩韵本身証实了詩韵韵有定界，字有定音，本很和諧，并不需要随文讀成各种不同的音。吳棫虽然大力搜集了前人用韵不同于今韵的一些材料，把它們叫做古韵，可是他并不真正了解古今語音有着極大的差別。为了和諧的方便，同一个字，他可以讀成种种不同的音，好像古人的韵完全沒有定界，完全沒有定音似的。这就是陈第、吳棫兩人在古音

① 参看江永《古韵标准，例言》和錢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五。

② 《潜研堂文集》卷十五。

③ 《詩經韵讀，凡例》第二条。

④ 焦竑《焦氏笔乘》卷三《古詩無叶音》：“古韵久不傳，學者于《毛詩》、《离騷》皆以今音讀之，其有不合，則强为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騶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虞’与‘玃’，又音‘五紅反’而叶‘蓬’与‘癡’；‘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鳩’与‘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遼’。如此，則‘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豈理也哉？如‘下’今在‘禡’押，而古皆作‘虎’音…‘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逼’音…使非古韵，而自以意叶之，則‘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逼’…而無一字作他音者耶？”

学上的根本区别。自从陈第充分论证了古无叶音,树立了语音上的时地观念,这才给古音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顧炎武的《音学五书》主要就是在陈第的启示下及其成就上写成的。《音学五书》是《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和《古音表》五种书的总名。大概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起,他开始研究古音^①,后来他过着流浪的生活,在黄河中下流一带频频奔走,对于这些不同于他本方言的地方的语音系统有了实际的接触和了解,也给他进行古音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②他这本书前后换过五次稿,自1667年付印以后,不断地刊改,有时刊改到一两百处之多,直到1680年才刊改成书。^③底下先介绍一下五书的大致内容,其次叙述他在古音学上的贡献,最后谈谈前人以及我们对他的学说和理论的批判。

《音论》分上中下三卷,是叙述音学的源流的。上卷谈音韵定义、历史和沿革。中卷谈古无叶音、古韵的部类、古调类的性质及入声的分配系统等问题。下卷谈转注、反切,以及声调和词义的关系等问题。

《诗本音》十卷,把《诗经》的原文全都抄了下来,在韵脚下分别注明《广韵》是什么韵。碰到《广韵》跟古韵发生出入或者完全不同时,就分别加以注明。例如《关雎》“寤寐思服”下注:“古音‘蒲北反’,与‘圃’同。考‘服’字,《诗》凡一十七见,《易》三见,《仪礼》三见,《礼记》二见,《尔雅》一见,《楚辞》六见,并同。先秦两汉之书皆然。后人误入一‘屋’韵。”又如《葛覃》“害澣害否”下注:“五旨。考‘否’字,《诗》凡六见,《易》三见,《楚辞》一见,并‘房以反’。后人误于四十四‘有’韵再出”。这是五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其它各种都是用来阐明和证实它的。

《易音》三卷,体例基本上跟《诗本音》相同,但只节录用韵的部分注出它们的韵,而且是按照“彖辞”“爻辞”等项而类聚在一起的,跟《易经》原文的顺序不尽相同。他之所以把《易》韵注出来,而不给其他的先秦韵文作注,大概是受了陈第所谓《易》音跟《诗》音“时世近而声音同”一说的影响。

《唐韵正》二十卷。它的体例是“其一韵皆同,而中有数字之误者,则止就数字注之,一东是也;一韵皆误,则每字注之,四江是也;同者半,不同者半,则同者注其略,不同者注其详,且明其本二韵而误并为一,五支是也;一韵皆同无误,则不注,二冬、三鍾是也”(《唐韵正》前头的说明语)。凡是那些古韵跟《广韵》不合的字,他先注上《广韵》的反切,其次注出它的古音,然后详细地源源本本地引证隋唐以前的韵文、音读、声训及谐声等资料来证实他所注的古音,最后指明它是从什么时候起发生音变以及它所隶属的整个韵又是从什么时候起发生音变的(不是每个字、每个韵都这样注明了的)。本来这本书主要是用来证实《诗本音》中的注说的,但因文字太长,比如“明”字“行”字的古音的考证就写上七八千字,他怕人家看起来生烦,所以就别开来另成一种,而不直接附在《诗本音》的各个注说下面。但是我们进行研究的时候,正如他在答李子德的信里所说,还必须先从《唐韵正》着手。

《古音表》分上下两卷。顧炎武自认为是他的创作,因为它剖析了《广韵》的韵部和变更了《广韵》入声分配的系統,把《广韵》的二百零六个韵综合成了十部。为了使读者一目了然,特把他的表简化成次页所列的样子。因为入声的分配跟《广韵》有很大的不同,而去声“祭、泰、卦、怪、夬、队、代、廢”八韵的分配也跟《广韵》有出入,所以表中特把这些韵目列出来,其余所举的平声韵目基本上包括了上声和去声。

顧炎武在古音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

一是把《诗》韵《易》韵同谐声结合起来,并且根据谐声的系统把《广韵》的“支、麻、庚、尤”和入声的“沃、觉、藥、鐸、麦、昔”等韵分为两支,入声的“屋”韵分为三支,给后人提出了离析切韵以求古音的方法。他在《唐韵正》中首

① 《音学五书》前头有曹学佺在1643年(崇禎癸未)写的一篇叙,而顧炎武在1680年写的《音学五书后叙》中说:“予纂辑此书,三十余年”(载《亭林文集》卷二,今《音学五书》所载的后叙作“凡三十年”,恐怕有误),据以上推,正跟曹叙所署的年代差不多。因此可以断言他开始研究古音,不得晚于1643年。

② 《音学五书后叙》:“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自随”。毛先舒《韵白》《记顧宁人說韵五条》:“宁人昔游西陵,携所著书于逆旅…与予论韵”。在《唐韵正》中,我们也常看到他参考这些地方的语音来论证古音的地方,如卷一“風”字下说:“今山西人讀風犹作方愴反”;卷四“家”字下说:“古音姑,…今山东青州以东犹存此音,如張家庄、李家庄之类,皆呼为‘姑’,至幽薊之間又轉而为‘各’矣。”

③ 参看《音学五书后叙》、《与潘次耕书》以及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的《音学五书跋》。最近看到一本刘佐临重订的《诗韵辑略》,第一卷前头有刘的叙言和附论,其中一再指称该书为云间顧氏所作。紧接着他的叙言和附论的是《唐宋韵谱异同》,下题“东吴顧炎武述”。看来好像该书就是顧炎武写的,可是它在内容上在体例上跟《音学五书》绝不相似之处,而跟潘恩的《诗韵辑略》却一模一样。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它决不是顧炎武的东西,而是潘恩一书的翻版。然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刘序写于1665年,比《音学五书》开雕还早两年,但是那时他已看到了顧炎武的《音论》;二是该书转载的“唐宋韵谱异同”是并《音论》中的“韵书之始”和“唐宋韵谱异同”两条而为一的,不过《音论》中的这两条的内容比它转载的要充实一些,文字上也有好些更动,正好印证《音学五书后叙》所说的话。

④ 参看徐藏给吳械《韵补》写的序言。

先說明“支”韻古音應該分為兩支，一支歸第二部，與“脂、之”為一類；一支歸第六部，與“歌、戈”為一類。隨後他在“衰”字下注明：“以上字當與六脂、七之通為一韻，凡從支、從氏、從是、從兒、從此、從卑、從麗、從爾、從知、從危之屬皆入此”；又在“霽”字下注明：“以上字當與七歌、八戈通為一韻，凡從多、從為、從麻、從垂、從皮、從脊、從奇、從义、從罢、從离、從也、從差、從麗之屬皆入此。”在他之前，只有人根據諧聲來考求個別字的古音，但是卻沒有人想到根據諧聲來把《廣韻》的韻部加以分析。自從顧炎武首創了這種分析方法，隨後江永又採用它離析了《廣韻》的“虞、先、蕭、肴、豪”，段玉裁、江有誥他們更採用它譜成了上古的韻部表，直到現在，我們在划分上古韻類的時候還不能超越他這種方法之外。

一	東、冬、鍾、江。
二	支半質、脂半、之、櫛昔半職、微物迄、齊屑、祭薛錫半、佳泰月、皆卦沒、灰怪曷、哈夬末、隊黠、代鎋、廢麥半德、尤半屋。
三	魚屋半、虞沃半、模燭覺半、麻藥半、侯鐸半陌麥半昔半。
四	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
五	蕭屋半、宵沃半、肴覺半、豪藥半 鐸半錫半、尤半、幽。
六	歌、戈、麻半、支半。
七	陽、唐、庚半。
八	庚半、耕、清青。
九	蒸、登。
十	侵緝、覃合、談盍、鹽葉、添帖、咸洽、銜狎、嚴業、凡乏

他在離析了《廣韻》的某些韻部以後，又把它們綜合起來，成為十部，這樣就給古韻的韻類劃出了一個輪廓。十部中的六、七、八、九等部後來諸家都無異議，一、三、四、五、十等部後來諸家或析之為二，或析之為三，或析之為四，那主要是出於分韻的體例和審音的精粗疏密的不同，不關乎考古上的錯誤。只有第二部，《詩》韻本是截然分為三類的，他把它們揉合在一起，則是考古和審音上的大錯誤。總的來說，他所分的十部，“于音理之剖判，實能籠罩諸家而為之先導。”^① 先前吳棫雖然也研究古韻，但他對於“古之正音，古之部分”，實際上是“茫乎未之知”的。^② 鄭庠是分了六部，可是並不是古音的分部。^③ 陳第只考証了《詩經》、《楚辭》中一些字的古讀，也沒有系統地給我們指出一個古韻部類的輪廓。所以，古韻的分部實際上只是從顧炎武開始的。但是由於他在很大程度上還受着漢代以後的韻文的束縛^④，又過多地注意於書面材料的研究，音理上的分析較少^⑤，所以他所分的韻部就不免於粗疏和錯誤。這實際上也是受了當時古音學的知識水平的限制。魏了翁說得好，“創者多闕疎，而因仍者易精審”^⑥，如果顧炎武晚生百把年，他的造就不一定趕不上王念孫；而如王念孫早生百把年，他的造就也不一定會高過顧炎武。

二是變更《廣韻》入聲的分配系統，從而揭露了上古入聲跟陰聲的關係。至晚是從陸法言寫下《切韻》以來，入聲配陽聲很少有人懷疑過。顧炎武在研究古音的時候，從《詩》韻中入聲跟平上去合用的情況、經傳異文的通轉、前人的音讀以及說文的諧聲等材料里發現入聲分配系統並不是從來就是這樣，於是就根據這些材料把《廣韻》的入聲系統重新加以安排，只保存了少數幾個韻的舊有面貌。他在《音論中》《論近代入聲之誤》條下說：

① 曾星笠先生《聲韻學講義》。

② 參看江有誥《詩經韻讀，凡例》第二條。

③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之一：“宋鄭庠分古韻為六部……其說合于漢魏及唐之杜甫、韓愈所用，而于周秦未能合也”。

④ 江有誥《詩經韻讀，凡例》第二條：“崑山顧氏始能離析《唐韻》以求古韻，故得十部，然猶牽于漢以後音也。”

⑤ 江永《古韻標準，例言》：“細考《音學五書》，亦多滲漏……《古音表》分十部，离合處尚有未精，其分配入聲多未當。此亦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

⑥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六，《吳彩鸞庚韵后序》，《四部叢刊》本 473 頁。

韵書之序：平聲一“東”、二“冬”，入聲一“屋”、二“沃”，若將以“屋”承“東”，以“沃”承“冬”者，久仍其誤而莫察也。“屋”之平聲爲烏，故《小戎》以韵“驅鼻”，不協於“東董送”可知也。“沃”之平聲爲天，故《揚之水》以韵“鑿礫樂”，不協於“冬腫宋”可知也。“衛”轉去而音“遂”，故《月令》有“審端徑衛”之文。“曷”轉去而音“害”，故《孟子》有“時日害喪”之引。“質”爲“傳質爲臣”之“質”。“覺”爲“尙寐無覺”之“覺”。“沒”音“妹”也，見於子產之書。“燭”音“主”也^①，見於孝武之紀……茲既本之五經，參之傳記，而亦略取《說文》形聲之指，不惟通其本音，而又可轉之於平上去。……故歌戈麻三韵舊無入聲，侵覃以下九韵舊有入聲，今因之；餘則反之。

这种更动，对古音学的发展是有巨大作用的，因为必须打破《切韵》入声系统的束缚，才有可能接近真正的古音。^② 尽管他“泥于方音”，或者“考证未审”，以致他所重新更定的入声系统大多欠当^③，但是由他提出的上古入声配陰声的原则却是后来一致公认的。

从江永以来，人们对顾炎武的批评几乎集中在他的“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几句话上。^④ 上头已经说过，他初步地认识到了发展是事物必然的规律，在研究当时的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时总要看这方法在当时能不能行得通，“而不为泥古之空言”^⑤，难道他会忽然胡塗起来，真正想把当时的语音恢复成三代的系统吗？从他答复李子德的信看来，他是痛恨唐宋以来那种不了解古音就凭着主观想像而把古人的文字乱改一通的坏学风，才发愤研究古音的。他想告诉人家：古音跟今音是不同的，要读古书必须懂得古音，不能在用今音读不通的地方就乱加塗改。他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很显然，他的研究古音并不是因为当时的语音说得合乎古而要把它恢复到古代去的。^⑥ 再读他在《韵补正序》（是在《音学五书序》前一年写的）中所说的“使得如才老者，与之講習，以明六经之音，复三代之旧，亦岂其难”，我们就更清楚他所主张的复古，根本不是指的语音，而是指的古书的音。这就是说，他是要把六朝以来那种从心所欲、顺口而叶的“古音”恢复它原来的面目。由此看来，从江永以来对他这几句话的批评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至于他在《音学五书序》中责怪周顒、沈约等人不该根据汉魏以来的韵文写成韵谱，以致把古音都亡失了，因此他根据先秦的韵文来纠正他们，而且特地把他的五书之一叫做《唐韵正》。这实在是他认识上的一个大错误。因为周顒、沈约等人写韵谱的目的是在记录当时的语音，根本不是在考求古音的系统，保存古音的面目。这样，他们所要根据的书面材料，自然只能是与当时语言相合或者相近的汉魏以下的韵文，而不能是与当时语音距离很远的先秦韵文；他们所划分的韵部以及对每个韵部中的小韵所拟的反切，自然也只能合于或者近于汉魏以下的韵文，而不能更多地合于先秦的韵文。他没有认清这点，就轻易地指摘前人，动不动就说，某字后人误入某韵，某字后人混入某韵，某字后人误于某韵再出，诸如此类，无怪乎从江永以来人们对他这点提出严正的批评了。^⑦

除了上述认识上的错误以外，他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也还存在着漏洞和缺点，可分三点来谈。第一是没有把时间地点的观念贯彻到底，以致使他的理论自陷于矛盾。他在《音学五书序》中说：“……诗三百五篇，上自商颂，下逮陈灵，以十五国之远，千数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尝有异。帝舜之歌，皋陶之賡，箕子之陈，文王、周公之所系，无弗同者。”从这段话看来，他是把春秋中叶以前的上下千几百年，纵横千几百里的语音都看成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说，他否认了那上下千几百年之间语音发生过变化，否认了那纵横千几百里之间有着方音的差别。这当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已经确切知道舜歌和《商颂》等并不是唐虞夏商的作品，因此用它们来论证唐虞夏商的语音同于《诗》韵的音，正如吴械用欧阳修、苏轼等人的韵文来考求先秦古音一样，是不科学的，根本不可靠的。拿《易》韵

① 《唐韵正》卷十五：“燭”，之欲切。去声则音注，《汉书·武帝纪》：“地祇见，光集于灵壇，一夜三燭”，服虔曰：“燭音炷”（“炷”字百衲本作“注”，跟“去声则音注”一說正合，应该更正。事见汉武帝元封四年）。据此，应当說“燭音注也”。

② 参看江有誥《入声表·凡例》第二条。

③ 参看江有誥《入声表·凡例》一、七兩条。

④ 《古韵标准·例言》在引証了这几句之后就批评他說：“……观明初編《洪武正韵》就今韵書稍有易置，犹不能使之通行，而况欲复古乎？”“顧氏《音学五书》与愚之《古韵标准》皆考古存古之書，非能使之复古也。”其实，《音論》中所說的“三代之音之絕而复存，其必自今日始乎”，也正表明了他的書只是为存古用的。

⑤ 見全祖望《鮑琦亭集》十三，《顧亭林先生神道表》。

⑥ 在写这篇序言的前四年，他住在傅青主家里，傅因为他平日喜談古音，一天早上对他喊道：“汀芒矣！”他听了莫名其妙，后来知道“汀芒”就是說的“天明”的古音，他也觉得好笑起来（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二《唐以前音学諸書》条）。因此，即使他原来有着复古的思想，经过这次教訓，也应该認識到“用古于今”是根本行不通的。

⑦ 江永《古韵标准》：“《唐韵正》一書考音之流变甚詳，而凡今韵不合古音者，一例以为訛誤，恐周顒、沈约、陆法言諸人不任受其咎。”（第二部总論）“必曰某字后人誤入某韵，混入某韵，此顧氏之过論。”（例言）

來說，就有跟《詩》韻顯著不同的地方。而且他也觀察到了這些^①，那末又怎能撇開這些事實而武斷地說“文王、周公之所系，無弗同者”呢？至于十五國國風的用韻也不完全相同，他在秦風《小戎》篇、鄘風《七月》篇中也曾指出過，并且斷定那是“出于方音^②”，那末也就不能否認春秋中葉以前的縱橫千几百里之間有着方音的存在了。這種矛盾之所以發生，就是由於他沒有把語音隨着時間地點的不同而發生差異的理論貫徹到底。

第二是把古今語音的演變局限在韻母上頭。他所注的古音，除了轉引《廣韻》以前的那些反語之外，大都是簡單地將《廣韻》的切語下字換一換，例如“雄”字《廣韻》音羽弓切，他就說“古音羽陵反”；“風”字《廣韻》音方戎切，他就說“古音方愔反”；“双”字《廣韻》音所江切，他就說“古音所工反”，“幢”字《廣韻》音宅江切，他就說“古音宅工反”^③……總而言之，只有韻母才變化，聲母什麼也不變化，這當然是不符合實際的。所以孔廣森批評他說：“顧氏古音反切輒就《唐韻》之紐而改其韻，非也。古今音變，韻既大訛，紐豈無異？”^④正因為他對於語音演變的了解是片面的，形而上學的，所以在上古調類問題上也自陷於矛盾。一方面，他認為當時雖然沒有平上去入的名稱，但是“自有遲疾輕重之分”，所以“古人之詩……平多韻平，仄多韻仄”，“其入與入為韻什之七八”。這種遲疾輕重的分別就是後來所謂調類的分別，“其重其疾則為入，為去，為上；其輕其遲則為平”。他並且根據入聲字十之七八跟入聲字相韻的現象，確定古人實有入聲。另一方面，他又接受陳第的影響，提出“四聲一貫”的說法^⑤，認為遲疾輕重之間並沒有“此疆爾界之分”，同一個字，既可讀平，又可讀仄，只要求它“諧于音，順于耳”，並沒什麼固定的調。他不懂得《詩》《易》中某些字的調類之所以跟《廣韻》不同是由於古今聲調也發生了變化的原故，而想用“四聲一貫”的說法來解釋這個現象，自然是解釋不通的。所以，他這說法遭到同時人毛先舒的反駁^⑥，而在後來也很少有人接受它。

綜合上述兩點，我們可以說他在研究方法上還嚴重地存在着形而上學和主觀主義的毛病。這個毛病在《唐韻正》中也表現得很明顯。在那裡，他旁征博引，費盡心力，然而只是孤立地考求了各個字的音變現象的最早出現時期，沒有進一步地指出它們作為整個語音系統是從什麼時候發生音變的。某些韻他雖然指出了它的音變發生在什麼時代，可是這個時代跟他在各個字下所注的音變時代是不相應的。以江韻為例，他說江韻的“降”字在戰國時代就進入陽韻，“逢、邦、龐”等字在漢代也已進入陽韻，“江”字到劉宋時才進入陽韻，所有這些，都發生在南北朝以前^⑦，可是他在江韻末尾作出案語說：“江韻與東冬鍾同用，南北朝猶然。唐以下始雜入陽韻。”這個案語之所以不跟各個字的小注相應，就在於他形而上學地把各個字的音變看作是一回事，而這些字所求屬的韻的音變又是一回事，把它們割裂開來。據他所看到的，《易林》把“邦”字跟陽韻相韻的不下六七處，東陽合用的，《易林》中很多，也不止“邦”字一個字，而且不但《易林》如此，其他的漢代作品中也有這個現象，正如他所說的“漢人用韻已雜，東冬陽唐往往并見”。對於這個鐵的事實，他不去深入研究，找出其所以然，只是因為跟他的江韻是從唐代以後才雜入陽韻的案語不合，就硬說這些材料都不足作為根據，未免主觀武斷。

總起來說，顧炎武雖然有上述的一些錯誤和缺點，但是他在古音學上給後來人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這種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他的治學方法和治學態度還是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的。

① 《易音》卷二《乾彖傳》“萬國咸寧”下注：“按真諄臻不與耕清青相通，然古人于耕清青中字往往讀入真諄臻韻者，當由方音之不同，未可以為據也。《詩》三百五篇并無此音。”（按《詩》中古“真、耕”雜用的也有兩處，不過只限于“真”部的“領”字，在《節南山》第七章中它跟“耕”部的“騁”字押韻，在《桑扈》第二章中它跟“耕”部的“屏”字押韻。這裡說詩中并無此音，未免考証失實。）

② 《小戎》三章下注：“古蒸侵二韻不相通，此以‘音’與‘興’韻，《大明》以‘林心’與‘興’韻，豈方音之不同邪？”《七月》七章下注：“侵韻字與東同用者三見，此章之‘陰’，《蕩》首章之‘諶’，《云漢》二章之‘臨’，若此者蓋出于方音耳。”

③ 見《唐韻正》卷一。

④ 見《詩聲類》“屑”字注下。

⑤ 參看江永《古韻標準·例言》，《叢書集成》本9—10頁。

⑥ 參看《韻白》《音韻彙語》二十五條之十四。

⑦ 參看《唐韻正》卷一。所有他在江韻中注明音變時代的字，都列舉在這裡。

更正 本刊1956年11月號38面左18行的前一個“呢”應為“泥”，31、32行的“31”應為“31”，40面右倒15行後一個“牛虻”應為“牛忙”；1957年4月號封4左18行“下卷”應為“下編”，左倒3行的“(ts等)”應為“(tsi)”；5月號17面右倒12行的“學”應為“學”，40面右1行的“學述”應為“學術”。

汉语盲文音素化和系统化的改进






潘 山















一 “系统盲文”的优点和缺点

周有光先生在《中国语文》1956年9月号上发表《汉语盲文的音素化和系统化》一文。这篇文章基本上可以达到用音素化和系统化的原理来表示字母的目的，更容易达到摸读起来不费力和刻写起来不费力的要求。总之，是比新盲字好。关于它的具体优点，周先生的文章中已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可是，“系统盲文”，除了周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自己提出一些缺点外，我认为还有下列一些缺点：

(一)在韵母方面

(一)代表e的音素点子设计不圆满，甚至破坏了认识韵母符号的规律。因为设计代表e的音素点子 (1,4)，第1点既不能再代表i，而第4点又不能单独代表e，结果把“ie写成 (1, 2, 3); ei写成 (1, 3, 4)”，就不但这两个符号的写法不圆满，而且破坏了音素化的原则，甚至还破坏了认识韵母的总规律。因为“系统盲文”的韵母认识规律，“音素点子是按着点子顺序(1,2,3,4,5,6)来认识的”。把ei写成了，按照音素点子的顺序，它是1, 3, 4，而1, 3, 4照理就是i, a, e (周先生所设计的九种音素点子中，曾规定第4点代表-i或e(ɛ)的)，就成了uae，韵母当中当然没有这样的结合韵母；可是，要根据1, 4, 3来认识ei，势必破坏了认识韵母符号的规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二)系统盲文把、作为独立音节的a、u，就和韵母a、u重复，u又和代表韵尾-u或o(ɔ)的点子相混淆。又把作为ou，则更会使学者糊涂。因为、、左边的三点都相同。既然设计符号都要音素化，而此三点却无着落，假若有作用的话，那一定会使人误认为aeu 为uau 为ieu或eu (1,4代表e)，这样就影响了音素化和系统化。

(二)在声母方面

(一)系统化的方法本末颠倒，而且繁琐混乱。“系统盲文”的全部声符，包括凡，一共才定19个，而点子的

名称就有“尖音点”、“吐气点”、“联系点”、“类别点”，“枢纽声母”的符号以及“基础点子”等六种，并且它们存在着交叠情形，运用起来这样加一点，那样少一点，整个六点制盲符通通才是六个小圆点，多一点和少一点有这么多的名堂，怎么能够叫人“馥繁于简”。

说它的方法本末颠倒，是它的设计及其运用方法，并不是从各类声母中先去找找出枢纽声母作为每类声母的枢纽或基础，然后以它为基础再去设计各种点；而是首先依着各别声母的发音方法去设计出它们的点子名称。结果不能把“基础点子”作为各类声母的“基础”，仅让它存在于“枢纽声符”之中，并且与“类别点”共存于“枢纽声符”之中，如果记忆的方法“主要的”不是“基础点子”，那还可以发挥“枢纽声符”的作用，可是他明明说记忆枢纽声符“主要是‘基础点子’”，这样一来，不但使得“基础点子”不能作为“基础”，同时又使得“枢纽声母”不能作为“枢纽”，并且还使得“类别点”也不能作为各类声母的“类别”符号。结果，说“记好枢纽声母的符号（主要是‘基础点子’），加上系统化的规律，就可以推想出全部声母符号”（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就完全成了一句空话。

“系统盲文”第一类枢纽声母符号，除去右边的类别点，余下的基础点子是；第二类枢纽声母符号是，除去类别点，余下的是基础点是；第三类的枢纽声母符号是，除去类别点，余下的基础点是；第四类的枢纽声母符号是，除去类别点，余下的基础点是。把上述的枢纽声母符号的“基础点子”归纳一下：(1), (2), (3), (4)。可以看出四类枢纽声母符号的“基础点子”实际上只有两种。周先生说，“记好枢纽声母的符号（主要是‘基础点子’），而不说“主要是”枢纽声母符号，这样又怎么“就可以推想出全部声母的符号”呢？其实，莫说不可以推想出全部声母的符号，就是这种“基础点子”属于哪一类声母符号的“基础点子”也都推想不出来，甚至连是不是“基础点子”也会搞不清。因此，这是声母符号方面的最大缺点。

(二)声母的“类别点”，点子有重复。例如：规定

“b、p、m 一类的类别点是4,6(⠠⠠⠠⠠)”,而规定“g、k、h 一类的类别点也是4,6(⠠⠠⠠⠠)”。这样,一方面表现出这样的规定是“多此一举”,另一方面,摸读时无从把它们分出两类的声母。

(三)“类别点”种类和“枢纽声母”种类不统一。因为六种“类别点”实际上只是五种,在摸读时已经使得两类难于分辨,而规定“枢纽声母”又有七种,这又使得不容易从“枢纽声母”中去分辨“类别点”和不容易去记住“枢纽声母”。

(四)用第3点作“吐气点”和用第1点作“尖音点”的规则不能完全解释声母符号的第3点和第1点。“系统盲文”对用第3点作“吐气点”适用于吐气声母和第1点作“尖音点”适用于z、c、s三个尖音声母的范围虽然明确规定了,可是对m、f、n、l、h等声母符号也像吐气声母一样,多一个第3点而并没有给予一个名目,对b、p、m、f、d、t、l、rh等声母的符号也像尖音声母一样多一个第1点也没有给予一个名目,这样,在“手到音到”的情形下,就可能发生混淆,以为这些声母也是吐气声母或尖音声母,甚至还可能发生更大的误会,既可能把不是尖音声母的b、p、m、f误认为是尖音声母,又可能把真正是尖音声母的d、t、n、l等反认为不是尖音声母。因为事实上,d、t、n、l倒是货真价实的尖音组的尖音声母,而z、c、s还是舌尖前组的尖音声母。

以上是我对“系统盲文”的韵母符号和声母符号所见到的缺点。为使盲文真正达到音素化和系统化,以便于盲人学习,我认为还有加以改进的必要。

二 韵母符号的改进

“系统盲文”不够圆满的主要原因是音素点子设计得有缺点,因此,在改进韵母符号的设计中,首先就要改进音素点子。

现在改进的“音素点子”一共也是九种:

(1) 1 (⠠) 代表 i。

(2) 2 (⠠) 代表 u。

(3) 1,2 结合 (⠠⠠) 代表 y。

(4) 3 (⠠) 代表 a。

(5) 4 (⠠) 代表 o 或 e (e 与韵尾 -i 结合时,改用第1点代表)。

(6) 4,5 结合 (⠠⠠) 代表韵尾 -i。

(7) 5,6 结合 (⠠⠠) 代表韵尾 -u。

(8) 5 (⠠) 代表 -n (不作声母符号用)。

(9) 6 (⠠) 代表 η。

以上九种音素点子,除了作复韵母的结合韵尾用的(6)(7)(8)(9)四种音素点子外,其余代表 a、o、e、i、u、y 的音素点子,是既用作单韵母,也用作复韵母的,同时,也还把它们用作自成音节的符号。

有了上述九种音素点子,就可以解决“系统盲文”对 ie、ei 的那种写法不圆满的情形和其他缺点,自然也可以圆满地写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下面一律简称“拼音方案”)里面的全部韵母的符号:

(1) a 韵开头的:

a ai au an aη

(2) o 韵开头的:

o ou

“拼音方案”里没有 eu, 不会把 ou 读成 eu。

(3) e 韵开头的:

e ei en eη

o 和 e 同是一个符号点子,这里不过是重复把它在这一组的韵母里列出来。⠠⠠代表 ei (这里的第1点代表 e, 在第5种音素点子中已说明了)。“拼音方案”里没有 on, 这里不致于把 en 读成 on, 同样,也不致于把 eη 读成 on。

(4) i 韵开头的:

i ia ie iau iu
ian in iaη iη

“拼音方案”里没有 io, 不致把 ie 误读为 io。

(5) u 韵开头的:

u ua uo uai ui
uan un uaη uη

“拼音方案”里面没有 ue, 不致把 uo 误读成 ue。

(6) y 韵开头的:

y ye yan yn yη

“拼音方案”里面沒有 y_o，不致把 y_e 讀成 y_o。

綜觀上面用九种音素点子写成“拼音方案”中的全部韵母的符号，在个人看来是比較滿意的。因为它既解决了“系統盲文”ie 和 ei 那种不圓滿的写法和破坏摸讀点順序的規律以及其他足以引起混淆的情形，同时，又能完全按照音素結構系統地写出全部韵母。因此，只要能够記住改进后的九种音素点子，就可以摸讀和刻写出全部韵母。

三 声母符号的改进

在声母方面必須把全部声母符号徹底地加以改組。經過改組以后，要作如下三条規定：

(1) 把全部声母按照順序分为下列四类：

1. 唇齿类：b—p m f

这类声母一共四个。b、p、m 是双唇音，f 是唇齿音。因为唇齿音只有一个字母，所以把它和 b、p、m 合为一类。b 發音时不送气，p 送气。“b—p”表示它們是一对。不送气的列在前，送气的列在后。

2. 舌尖类：d—t n l

这类声母一共四个。d 不送气，t 送气。“d—t”是一对。不送气的列在前，送气的列在后。

3. 舌根类：g—k h

这类声母在“拼音方案”中本来一共是四个，因为習慣上很少把 ŋ 和它們一起念。同时因为在音素点子里面已有 ŋ 的符号，所以这里只列出三个。“g—k”是一对。不送气的列在前，送气的列在后。


4. 舌尖前后类：


a. 舌尖前音組：z—c s


b. 舌尖后音組：zh—ch sh rh

这类声母共七个。a 組的舌尖前組声母“z—c”，表示是一对。b 組的舌尖后組的声母“zh—ch”，也表示是一对。送气的列在前，不送气的列在后。至于 z—zh、c—ch、s—sh 的写法，是用来表示它們舌前后的关系，所以也把它們各作成一对。在前的表示是舌尖前組的声母，在后的表示是舌尖后組的声母。


(2) 把每类声母中的第 3 个声母作为該类的“樞紐声母”。“樞紐声母”符号的全部点子，就是該类声母符号共有的基础点子。“樞紐声母”的符号，可以称为“樞紐声符”，以別于其他声符，它們一共分为四类五种：


1. 唇音樞紐声符是 2, 5, 6 結合 ，代表 m；

2. 舌尖樞紐声符是 1, 4, 6 結合 ，代表 n；

3. 舌根樞紐声符是 1, 2, 3 結合 ，代表 h；

4. 舌前后樞紐声符，分为：

1) 舌前樞紐声符是 1, 3, 4, 5 結合 ，代表 s；

2) 舌后樞紐声符是 1, 2, 4, 6 結合 ，代表 sh。

(3) 每类声母符号增加点子的情形，以該类“樞紐声符”为樞紐：在它前面的，比它多一个点子；在它后面的，也比它多一个点子。在它前面的送气声母和不送气声母的点数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兩者的点子位置完全上下倒置。除了这个联系順序的总規則之外，每类声母符号的联系加点規則如次：

1. 唇音声符，在“唇音樞紐声符”后面的，加在右边第 4 点；在前面的，加在左边第 3 点。

2. 舌尖声符，在“舌尖樞紐声符”后面的，加在左边第 3 点；在前面的，加在右边第 5 点。

3. 舌根声符，在“舌根樞紐声符”前面的，加在右边第 4 点。

4. 舌前声符，在“舌前樞紐声符”前面的，加在左边第 2 点。

5. 舌后声符，在“舌后樞紐声符”后面的，加在左边第 3 点；在前面的，加在右边第 5 点。






这五项加点規則簡單說来，就是：

第一类，在后加右上，在前加左下；
















第二类，在后加左下，在前加右中；

第三类，在前加右上；

第四类，舌前組加左中；舌后組，在后加左下，在前加右中。

根据以上的三項規定，只要了解全部声母的分类，每类有哪些声母及其順序，并記住每类声母的“樞紐声符”及第 (3) 条的联系加点規則，就可以很容易地推出全部声母符号来。比方：記住了  是第一类“樞紐声符”，就知道这类声符的点子中都有 1, 5, 6 結合的 ，在它后面的声符加右上，f 的符号就是 ；在它前面的加左下，p 的符号就是 。p 是送气声母，和它对应的不送气声母在它前面，按照規定，也可以推出 b 的符号是 。

現在把改进的盲文声母符号排列如次：

b	p	m	f	d	t	n	l
							
		①				①	
g	k	h		zh	ch	sh	rh
							
		①				①	

① 有 · 点者为每一类的“樞紐声符”。

z c s①



此外, Λ (er)用e的符号 $\cdot\cdot\cdot$, 在音节末尾写成 r

时,用 rh $\cdot\cdot\cdot$ 的反式 $\cdot\cdot\cdot$ 。表示声调的“声点”,可以规定

5表上声,1,4结合表去声,5,6结合表阳平②,阳平也一般不标调,它跟他调对立时可以只标他调。声点也可以作分隔音节的符号。

此外, μ 、 \angle 、 τ 三个声母的读法和 zh、ch、sh、rh、z、

c、s 作为独立音节时候加点的办法,也跟“系统盲文”一样采用新盲字的办法。

对全部声母符号作了如上的改组,它就不会再有“系统盲文”那些不圆满的现象,而且也系统化了,并且在系统化中又做到了简化。

① z c s 和 zh ch sh 是相对应的,所以它们用和 zh ch sh 相反的符号表示。

② 这里的标调符号及 er 的符号,和作者自己设计的韵母符号有重复之处,容易发生混淆,似乎应该另行设计一下。——编者

西南师范学院方言普查工作简况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于1956年2月在三、四年级成立了现代汉语科学研究小组,开展方言调查工作。同年3月,四川省方言调查指导组成立,指定西南师范学院调查川东区50个县的方言。科学小组的活动就按照分配的任务进行。半学期后,有三个同学各完成了一个点的调查工作,编好了同音字表,各写了一本“××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的小册子。其余的同学,大多数都作出了同音字表。后因指导小组工作的刘又辛教授生病,工作曾停止了半年多。

为了保证完成这一严肃的政治任务,西南师范学院领导上非常重视这个工作,并给予大力支持。例如:曾两次派教师去北京“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学习。1957年2月间又批准中文系专门成立“汉语方言调查办公室”,指派教师脱产负责这项工作,并给办公室配备了专职辅助人员。规定本期中文系二年级“现代汉语学年作业”的具体内容就是进行方言调查。教务处每周给安排了4—6学时的讲课或调查活动时间。这些积极的措施给方言调查工作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由于原来参加的同学有的即将毕业,因而现在能继续参加这个工作的已为数不多,必须重新组织人来工作。本期开学前,方言调查办公室在中文系二三年级中组织了80几位同学参加方言调查。这些同学都是现代汉语课成绩较好、热心推广普通话的积极分子。

办公室把整个方言调查工作分成三个阶段来进行:

一 训练 训练的时间约六周左右,每周上课四学时。训练的内容是:1)国际音标,2)声调练习,3)记音练习,4)音位常识,5)方言调查方法。(主要是前三项)

二 调查 训练结束后,根据同学的记音能力和调查地区编成若干小组——原则上确定三个同学调查一个点。“调查小组”在教师指导下按照“汉语方言调查简表”记出各点方音。

三 编写报告 记完音后,用“汉语方言调查字表整理卡片”整理调查材料,作出同音字表。然后编写“××方言调查报告”及“××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手册。

为了保证调查质量,克服指导教师人手少的矛盾,办公室把原来训练过现在还能参加这个工作的几位同学培养成辅导员,让他们再跟新参加的同学一同听课,给他们一些时间进修,以便使他们将来分担一部分指导教师的工作。尽管增加了辅导员,可是方言点太多,普遍开始记音时还是感到指导人太少。办公室打算通过“细致地安排”来克服这个困难。例如共有六个指导人,每人分别参加一个点活动,如果每个点每次活动只占2—4学时,每个指导人每天至少可以指导三个组(上午、下午、晚上各一组),这样一天就可有18个点活动。那么,就50个点的每一个点而言,两天多就可轮到一次有指导人参加他们的活动。

为了能找到合适的发音合作人,办公室印了“语音调查表”,根据中文系六百多位同学的填表,有39个点可以找到满意的发音人,剩下的11个点准备在其他系科找。发音人多半是选一年级的同学,他们大多离开家乡不久,乡音还没有多大变化。

为了使发音人和记音人能更好的合作,办公室已商得系领导和系团总支同意,开始记音时,他们将给同学们作一些鼓励、动员工作。

由于有领导上的大力支持和同学们的工作热情,办公室预计这学期可以记完40个点的方音,整理出初步的调查报告。下学期可以做完其他10个点的记音工作,并将根据这些报告资料分别写出“××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手册。明年上半年将和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学院从事方言调查工作的同志取得联系,写出四川方言的调查总报告。(霍时雨)

语文短评

234 不错，在恒河沙数的无数的书籍里，汗牛充栋的坏书的确不在少数…（徐中玉：《论文艺教学和语文问题》95页）

“恒河沙数的”跟“无数的”重复；“汗牛充栋”跟“不在少数”重复（这个成语出自柳宗元文：“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意思就是多，不是坏）。这句话应该把“恒河沙数”、“汗牛充栋”这种陈词滥调去掉。（鲁凡）

235 七年来，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了我们多多少少的帮助和支持，鼓励和指教啊！（光明日报 1957 年 4 月 16 日 4 版）

1)“多多少少”跟“多少”的意义不同。在感叹句里用“多少”强调多；“多多少少”的意思是不太多，不能用在感叹句。这句话的“多多少少的”应改为“多少”。2)“指教”应改为“指导”。（董乾贵）

236 联队…在防守时又未能很好地钳制住波兰队的得分主力，前两节在自己的篮下被对方如入无人之境，因此一开始便一直占下风…。（人民日报 1957 年 1 月 29 日 4 版）

我们可以说“篮下屡屡被对方攻入”，也可以说“在自己的篮下对方如入无人之境”。“如入无人之境”是对动作的描写，本身不是一种动作，不能在前面用“被”字。（王自强）

237 当前最重要的一环在于把现有的科学技术为群众所掌握，成为同血吸虫病战斗的武器。…（人民日报 1957 年 4 月 24 日 7 版）

“把”字不能跟“为…所”连用。改法：把“把”字改为“让”，在“成为”前加上“使它”两字。（苏济森）

238 …因为 1942 年“良友”只替他出了上半部，可是也没有给他自己所看见。（人民日报 1957 年 5 月 17 日 8 版）

表示被动的只有“为…所…”、“被…所…”的格式，没有“给…所…”的格式。这句话中的“所”字应去掉。（所佳）

239 象灌音片那样的朗诵能否达到充分感染的目的，很多的人表示怀疑；会吟诗的人都认为传统的吟诗法能体现诗歌的音乐性比普通朗诵强。我也是属于后者之一。（语文教学 1957 年 4 月号 23 页）

1) 用“前者”和“后者”，必须上文里有明白提出的两个不同的事物。这句话前后分句的意义是相承的，“会吟诗的人”包括在“表示怀疑”的人里边，“后者”的字样用不上。可以改说“我也有同样的看法”。2) “属于”跟“之一”意义相同，不能并用。3) “吟诗法”后面的“能”和“诗歌”可省去。（而中）

240 在诗篇中，虽然诗人大发异想，希望穷苦的人们，都能象他那样穿上柔和温暖的皮衣，但也说明了诗人对生活极端贫困的农民是始终关怀的。（范宁：《白居易》34 页）

1) 用“虽然…但是”连贯起来的句子，意义上有着先让步后转折的关系，本句的意义是前后相承的，“虽然…但也”用不上，应去掉。2) “说明”前加个“这”字较好。3) 第三个逗号可不用。（马蔚藩）

241 他提出了问题之后，自己不表示意见，并且要我表示意见。（中国语文 1956 年 10 月号 5 页）

“并且”是表示层进的关联词，这里没有层进的意思。应该把并且改为“却”，或者干脆去掉。（李文）

242 …它们的质量不是比沿海的低，就是成本比沿海的高…。（人民日报 1956 年 7 月 15 日社论）

“不是…就是”在句子的结构里必须处于对称的位置上。但是在本句里它们的位置是参差的。应该改为：“它们不是质量比沿海的低，就是成本比沿海的高”。（石安石）

243 可是，作为一个深闺少女，未来的统治者，想表现出她的性格本质，才能的力量，就必须通过对她的特征行动的选择与表现。（人民文学 1956 年 4 月号 53 页）

“作为…少女…统治者”是说明《红楼梦》中探春的身分，“想表现…”的显然另有其人，决不是探春本人。这句话的“作为”用错了，如果改为“对于”，语意就连贯了。这句话中的“才能的力量”也费解。（李祖彝）

244 广大的农村青年表现了无比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中国青年报 1956 年 10 月 28 日社论）

“无比”是说明“热情”的，现在用来说明“走”是说不通的。应改为：“…表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比的热情”。（敏生、小篆）

245 从教育方针调查中，我的体会与意见（人民教育 1956 年 11 月号文章标题）

1) “从…中”跟“我的”配合不上。2) 调查的是“教育方针执行情况”，说“教育方针调查”不当。应改为：“我在调查教育

方針执行情况中的体会与意見”(刘凱鳴,黃樹功)

246 中城一小老教师丁絳霞与第九中学教师蔡模夫归到茶座里来了,他倆在观看魔术表演。(杭州日报1956年12月31日1版)

1) 照第一分句看,好像来了三个人。2) 第一分句的“来了”是动态的,第二分句的“在”是静态的,兩者用在同一場合,意义上有矛盾。应改为:“…丁絳霞和她的丈夫第九中学教师蔡模到茶座里来了,他倆是来看魔术表演的。”(莫善乐)

247 而西安又是一个新兴的,發展極快的工業和文教城市,因此某些方面的緊張还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西安日报1957年4月9日2版)

看起来,倒好像希望“緊張”似的,本意当然不是如此。其实,“还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的是緊張現象(指物资供应方面)的消除,不是“緊張”本身。可以改为:“因此物资供应的緊張还需要一个相当長的时间才能緩和。”(符景垣)

248 那时耿济之先生正在苏联使館工作…。(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8版)

“苏联使館”只能理解为苏联駐华使館,这里指的是中国駐苏联使館,“中国駐”三字不能省。(潘中柔)

249 对于血吸虫病应按照最近召开的全国會議所决定的方針貫徹下去…。(健康报1957年元旦社論)

貫徹的應該是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血吸虫病跟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是兩個相反的概念,不能以此代彼,否則就要把好事說成坏事了。(黃微远)

250 六亿人口每人每年多穿一身衣服,用布七尺半,全国就需要棉布四千五百万匹,只略少于英国1955年的棉布总产量約四千八百万匹。(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社論)

这句话有歧义,可以把四千八百万匹理解为比英国棉布总产量少多少的数字,虽然从两个数字比較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只要把“約”字改为“——”,这句话就确定而明白了。(赵長信)

251 去年冬季許多地区都有人說,修水利可以推到明年春天。(人民日报1957年2月3日社論)

去年冬季有人說:“修水利可以推到明年春天”。現在引述这句话,要是不加引号,“明年”應該改为“今年”;否則不是推到1957年,而是推到1958年去了。(孫方)

252 只有这样,作家的感觉才会敏銳,才会强烈,才能准确地把握住新的人物品質,才能創造新的英雄形象。(蕭殷:《論生活、藝術和眞实》51頁)

不同主語的分句,主語是不可承前省略的,这句话中“把握…品質”、“創造…形象”的不是“作家的感觉”而是作家本人。应在第一个“才能…”之前加上“作家”。(惠修)

253 周恩来总理所到之处,曾受到了加德滿都和尼泊尔各地人民極为热烈而友好的欢迎。(人民日报1957年1月30日社論)

“受到…欢迎”的是周恩来总理,不是他所到的地方。“到哪儿(都受欢迎)”,通;說成“所到之处”就不通。(孫方)

254 今年的各項業務工作努力的目标,应積極地以圍繞消灭危害最严重的疾病进行。(健康报1957年元旦社論)

“应積極地…进行”只能說明“工作”,不能說明目标。应改为:“今年的各項業務工作,应以消灭危害最严重的疾病为主要目标。”(黃微远)

255 今年的“五四”正是全国知識界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會議和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后,在广泛地热烈地討論着进一步貫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問題。(光明日报1957年5月4日社論)

正是什么?没有下文,應該在全句后加上“的时候”三字。(沈錫銘)

256 这时,群众狂热的心和信陵君狂热的心,象烈火一般融解在一起…(人民日报1957年3月2日7版)

固体的东西才能“融解”,“烈火”是不能“融解”的。应把“融解”改为“融合”。(周溶泉)

257 鬼子兵死了的、半死不活的都躺在血泊里乱喊乱叫。(輔導員11期13頁)

死了的还能乱喊乱叫嗎?应改为:“鬼子兵死了的、半死不活的都躺在血泊里,后者还在乱喊乱叫。”(边紹和)

258 就任憑你怎么內行,裁判者还必得通过大众。專家不是自封的;作者即必須由讀者来承認;歌、彈、演、奏、書、画即必須由观众来支持。(人民文学1957年4月号2頁)

1) “裁判者必須通过大众”引起两个疑問:一、通过大众幹什么?二、裁判者不就是大众,是另有其人?2) “作者必須由讀者来承認”,“作者”不等于“作家”,作者的資格無須有人承認。3) 支持“歌、彈、奏”者应是“听众”,不是“观众”。4) 标点也不合意思的層次。可改为:“任憑你怎么內行,也必得通过大众的裁判,專家不是自封的。作家必須得到讀者的承認,音乐家、演員、書法家、画家必須得到听众和观众的支持。”(刘丕烈)

书刊评论

《普通语音学纲要》，罗常培、王均编著。科学出版社，1957年2月第一版。32开，226页，定价精装本2.00元，平装本0.85元。

近年来大家感到高等学校语言专业在讲授语音学时缺乏一本既能结合中国实际又能概括一般原理的新教本，罗常培先生和王均先生编著的这本书虽然不是专为大学作教本而写的，但是它完全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本书的初稿在1954—55年曾以《语音学常识》的名称在本刊上连载（作者署名田恭），过后读者就非常希望印出单行本。可是两位作者或病或忙，延至最近才从事整理、修订、增删，并改用这个书名出版。

本书初稿原是罗常培先生以自己二十多年来积累的教学资料为基础，同王均先生分工合作地编写出来的。这次经过修订，除各章互有增删而举例更加丰富外，特别在语音学理论方面尽量采用了苏联的先进学说。

大家都知道，近代语言学所以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主要是由于语音学的建立。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如果不先掌握语音学的基础知识，那是不可想像的；所以说“语音学是语言学一切部门的必要基础”。这个道理，作者在本书第一章第二节里讲得十分清楚。从这个道理看来，语音学的知识，不仅是语言专业学生必修的，也是一切语文工作者所必需的。因此，这一本多年来国内仅见的普通语音学的奠基工作的书，不止适宜于作大学教本，还适用于一般的学习。

初学的人乍读本书，对其中语音描写的细致、举例说明的广泛，好像一时难以捉摸；可是，如果能循序渐进，逐步研读，必然能掌握住本书的特色。作者举例以普通话为主，普通话没有的然后举各地方言，汉语没有的再举兄弟民族语言；为补充说明中国语言所没有的语音现象，或为描写、比较上的便利，才引用一些外国语的例子。

这次修订，以第二章“语音的基础”、第三章“语音的分类”，和第七章“音位和音位学”增订较多，吸收了不少新的资料，订正了一些术语，此外，关于音位理论方面也有相当的补充，在批判资产阶级学者唯心主义的音位理论的同时，对苏联的先进学说多所阐发，可是对西欧语言学者在语音学方面肯定有哪些是可吸取的成就，介绍得不多。第三章讲语音的分类中，如果能增加各种辅音的发音部位图，可能对初学者更有帮助。

国内学术性出版物常常忽略了书后的索引工作。本书可能因为付印仓促，没有附上索引。为了便利读者，希望再版时加入。（劳君方）

《普通语言学》，岑麒祥编著。科学出版社，1957年3月第一版。32开，188页，定价道林本1.20元，报纸本0.65元。

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年青的语言工作者迫切要求语言学家们多给他们写些入门书，岑麒祥先生编著的《普通语言学》、罗常培、王均先生著的《普通语音学纲要》、王力先生

著的《汉语史稿》的同时出版，对年青同志们来说是久旱的甘雨，就是在语言学界也算是大喜事。

岑先生的书是在北京大学讲授普通语言学时所编的讲义，曾经由北京大学铅印过。作者说，他是参照苏联的教学大纲编写的。苏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出普通语言学的课本，因此，岑先生的这一工作是具有首创的性质。

苏联的教学大纲中设有三个与普通语言学有关的科目：（1）语言学引论，（2）语言学史，（3）普通语言学。本书虽然是专门为了第三种科目而写的讲义，但是由于目前语言学史这个科目还没有开出，所以本书中历史的叙述多了一些。本书的两个重点是：（1）语言学的对象问题，（2）语言学的特殊方法。

在第一个重点里，作者用了许多篇幅来批判施来格尔和缪勒的自然主义，保罗等新语法学派的个人心理主义，索绪尔和梅耶的心理社会学主义，布龙达尔的结构主义，浮士勒的美学唯心主义。接着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语言本质、起源和发展的基本原理。在第二个重点里，着重地讨论了历史比较法和静态分析方法。

作者注意到联系中国的情况来增减一些内容，比方，精简了十月革命前一些与我们关系不大的俄国语言学家的学说，又增加了一些对我国语言学界关系比较密切的英美语言学家唯心主义的批判，还联系到我国文字改革和语法规律问题发挥了作者的见解。由于同学们不能接受太多的外国例子，作者在举例时尽量采用汉语的例子。这说明作者在学习苏联当中努力融会贯通，避免生搬硬套。这些都是本书的优点。

在解放后用汉语出版的普通语言学 and 语言学概论，连翻译带编著只有三本（契科巴瓦、布达可夫、高名凯），岑先生的这一本在简史、对各学派的介绍和批判（马尔除外）和历史比较法三方面，比前面三本书给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材料，对于中国语言学界尤其是年青同志们是有现实意义的。静态分析方法一章里，作者在个别地方提出了与以前的普通语言学作者的讲法不完全相同的个人意见，比方说，汉语不但有构词形态，也有构形形态（164—5页），汉语语法也应该有形态学的一部分（162页），汉语肯定是有词类区别的（169—71页），汉语不能认为是纯粹的孤立语（181页），语法构造由综合结构变为分析结构不能认为是语言发展的唯一的规律（182页），等等。这些意见可以跟契科巴瓦的比较陈旧的意见对比。岑先生的这些新见是汉语研究对普通语言学的影响的具体反映。

本书由于“参考资料相当缺乏”，“顾到同学们的接受能力”（作者“序”），又限于篇幅，所以对各个问题就很难发挥得很透澈。比方作者对王力、吕叔湘、朱德熙（162页）、高名凯（170页）等先生的批评就过于简单，缺乏论证。

对于各学派的批判往往是肯定的少，否定的多，这是几年前一般做学问的方法，现在看来是不恰当的。读者在阅读时应该多多进行独立思考。比方在否定保罗等的类推理论时，说它只是语言中的一种偶然的现象（32页），这种说法未免偏颇。对于结构主义的批判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它一无是

处;但是結構主义跟其他語言學派別不同,它是現代一種有地位的活的思潮,不應該輕率加以忽視。蘇聯語言學界現在正在展開對它而不是對另外一些學派的討論,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作者在許多地方企圖擺脫前人在理論上的一些錯誤和片面性,提出更完整更概括的看法,但是並不是到處都很成功的。比方在談到詞類區分時說,“在另外一些形態比較簡單或已經變成了簡單的語言里就會碰到許多無可克服的困難”(167頁)。既然困難是“無可克服的”,那麼漢語自然就是沒有詞類了,這和作者原來的意圖是有衝突的。這裡用了“無可克服的”這樣的口吻,其實是作者無意識地复制了前人的一些說法而已。又如作者肯定“聾啞人們所用的手勢也可以叫做語言”(77頁),“聾啞的人採用手勢也是以有聲語言做根據的。我們可以借助於手勢使他們了解我們日常說話的方法和規則,使他們能夠讀書、寫字,以及跟別人交流思想,不過那是用了視覺來代替聽覺使他們能夠用符號跟別人交際罷了”(97頁),這些說法都是正確的;但是作者又引用了斯大林的話,說語言學所研究的是會說話的正常人,而非不正常的不會說話的聾啞人,聾啞人用由於視覺、觸覺、味覺、嗅覺而形成的形象、知覺和觀念來產生思想。這些話把聾啞人的手勢語言(作者認為還是語言,不是手勢)排除在語言學研究範圍之外,又把聾啞人的思維限制在觀念及觀念以前的東西上面,顯然跟作者自己的論點不完全一致。所以這段引文是不必要的。接着,作者又把“手勢語”用在馬爾的含義上,說它不能發展思維,不能充當交際工具。這又是由於無意識地复制了斯大林的話而把馬爾的“手勢語”和自己上面所肯定的可以稱為語言的手勢語言混為一談了。像這樣的例子在本書里還可以發現許多。

雖然有這些缺點,但是本書作為在中國出版的第一本普通語言學入門書,是值得每一個願意從事語言工作的人閱讀和研究的。(力山)

《北京語音常識》,王勤編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第一版。32開,127頁,定價0.34元

這本書的內容着重對北京語音內部規律的分析,全書除了“引言”外,共分“記音符號”、“語音分類”、“重音、語調音變”、“文章朗讀”等七章。凡有關北京語音的聲、韻、調及其變化等各方面,本書都作了常識性的闡述和一般性的介紹。

學習北京語音,除了在理性上要懂得它的內部規律,更重要的是要在感性上多多練習,因為這是“口耳之學”。只有這樣,理性知識的作用才不落空。作者在“引言”中強調了這一點,並指出學習北京語音“起碼要做到三勤”——嘴勤、耳勤、手勤。也就是要“勤說勤問”,“留心聽廣播、文學朗讀留聲片和電影、話劇演員的發音”,“勤寫”和“勤查正音字典”(10頁)。這樣的提法是正確的。書本的知識頂多只能“告訴我們每個音的準確的發音部位、發音方法和一些語音上的道理”(4頁)。然而懂了這些並不等於就能說好普通話。

在“記音符號”一章里,作者介紹了注音字母、漢語拼音方案 and 國際音標三種。關於第二種,作者是这样說的:“……1956年11月21日漢語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正式地通過了拼音方案修正案。並提請國務院批准公布。”措辭上很可能會引起讀者的誤解,以為這個方案已成定案,並可能誤解為已經正式公布。我認為,在國務院尚未批准正式方案的時候,要舉拼音方案,最好還是以拼音方案(草案)為準。

關於j、w兩個字母,作者說,漢語拼音方案採取它的理由,除了作為“隔音號”外,還因為是:“當我們說[i]或以[i]開頭的一些音節時,在[i]的前面的確有一個半子音[j]”(49頁)。後一個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不如就干脆承認這兩個字母是純粹用於隔音。文改會在《關於修正漢語拼音方案的初步意見》一文的說明中就說起有“不少人主張取消j和w。”

作者幾乎用一半的篇幅介紹了北京語音的音類和發音、拼音的方法等等。有些地方未免偏於繁瑣的理論探討,而沒有注意聯繫實際;費力多而見效少。譬如:全國各方言都有與北京語音相同的音素,說明時不妨在理論上簡略一些,而多舉幾個方言里相同的音來比擬,這樣收到的效果一定會更大。這是一個值得提出的問題,目前有關指導學習普通話的著作似乎都偏重分析音理,少談實際的例證。光是在語音理論的圈子里說明某音的舌位以及發音方法等等而不多舉例證,是很難叫人領會並解決實際問題的。(葵开)

《山東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57年第1期,1957年2月出版,定價(道林本)1.20元。

本期登載了殷孟倫先生的《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簡釋》(《反紐圖》是附在《玉篇》後面的幾個圖表,原題“沙門神珙撰”)一文,長約一萬六千字。在文章前面,作者提出了三個問題:1)究竟這種圖式憑什麼條件構合而成?2)內中所用各種名目應怎樣解釋?3)採用這種圖式對於反切究竟能夠說明些什麼問題?後面的五大段文章,都是為了解答這三個問題立論的。在第一大段里,作者“為了便於說明並使說明文字同原圖對照起見”,抄錄了原序和原圖,並根據各種版本和其他有關文件,把序文和原圖加以校正;在第二大段里,作者先解釋了圖式的總標目:“四聲、五音、九弄”,下面又根據雙聲、疊韻之說,說明了原圖的構造基礎。在第三大段里,說明了五個圓圖構成的道理,並且把五個圓圖中共同具有的正反、到反、正疊韻、傍疊韻、傍疊重道、正疊重道、正到雙聲、傍到雙聲、正雙聲、傍雙聲等十項,根據江有誥、岡井慎吾等的說法和著者個人的體會,加以解說。在第四大段里,說明了兩個方圖構成的道理,又把九弄的每個名稱:反音、雙聲、正韻、傍韻、疊韻、正紐、傍紐、羅文、綺錯,根據江有誥等人的說法,加以解釋。第五大段是這篇文章的總結,總結上面四大段文章的說法,並說明寫這篇文章的意義。

通觀全文,眉目清楚,解釋淺顯,明暢易曉,頗便初學。讀了這篇文章,對漢語音韻學史和等韻學的起源,都能有所啟發。這是這篇文章的優點。另外有兩點值得提出來討論一下:1)反切創於東漢初年,一般講音韻學的人都採用這種說法。反切開始創制的時候,切字和被切字的讀音,應該是一致的,根據切字完全可以讀出被切字的讀音來;但是過了一個時期,字音起了變化,根據切字不能讀出被切字的讀音來,於是大家就想方法解決這個問題。《反紐圖》就是在這種需要之下產生出來的。《反紐圖》和後來宋元等韻學家所講的門法應該是同樣性質的東西,這一點很重要,然而著者沒有提到;只泛泛說了几句:“……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也是根據雙聲疊韻取音的辦法,有了進一步發展的產物,反音取讀練習的方式之所以多種多樣化,我們說它完全是歷史的產物,這不是沒有根據的。”這樣,就把問題滑過去了。2)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是根據陰陽、五行的說法制成的。兩個方圖所以配陰陽,五個圓圖

所以配五行。不把这种玄学根据指出来，反紐圖的構成道理不可能講个明白。但是作者也并没有講到这一点，只說：“一个圖圖看明白了，其他四个完全一样；構成的道理本来在一个圖中使用已經足够，但是因为要照顧宮商角徵羽五音方面，所以就分作了五个圖圖。”“这两个方圖所列的首目完全一样（只是一个由右到左，一个由左到右），其全圖組織形式也是完全相同。但因說明的字音不同，所以分作兩圖。”这些话也还欠透辟。（李学魯）

本期还發表了赵太侔先生的《关于汉字简化問題》。这篇論文共分七章。第一、二兩章分析了国务院1956年1月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的三个简化表，強調指出方案有“不可克服”的缺点，認為汉字的简化方法有进一步系統研究的必要。第三、四、五、六章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認為汉字简化方法不能再用过时的办法，應該以草体字的基本形体来简化汉字。其中四、五兩章不仅列举了作者初步整理出来的206个草体字基本形体，还举例說明草体字基本形体对汉字偏旁的同化作用，認為可以用这206个“字母”式的基本形体来書写目前通行的六七千个汉字；并且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实施的办法，比方：根据手写体来改造印刷体，廢除宋体字，按步骤分期进行，等等。第七章则是作者恐怕主張不能实现而提出来的讓步办法。他說：“如果認為全盤改造印刷体工程太大……宋体字經過适当简化之后，也可以不再进行进一步的简化……”，应“赶快制定一套相应的草体化的手写体，公布使用。”同时，作者还希望“無論采取甚么样的简化办法，都不應該再主观地創造新簡字……以免加重汉字的混乱状态。”

这篇文章应当引起对汉字简化問題有兴趣的人的重視和討論。这里只打算談談个人的意見：

第一，現行汉字简化方案的“述而不作”、“約定俗成”的方针應該肯定是正确的。个别的字简化得不好，也是有的；但不宜因此牽涉到原則。而且，汉字简化过程中产生的缺点，还应该联系到为汉字体系所局限的情况来看。作者在提出自己主張的同时，过多地指責現行方案，看来似乎無此必要。

第二，作者介紹草体字基本形体的时候，認為草体字优点很多：1）書写流利，笔势連貫，易于学习；2）形体虽然簡單，沒有互相重复互相混淆的缺点；3）有系統、有規律，容易掌握，等等。这些說法頗有道理，但也有不少問題。我們姑且拋开別的不談，只从草体字的推广来看就是一个大难题。假定我們承認在知識分子当中推行困难不大，可是初学者一开始就要学习几百个草体字的基本形体，这种做法是否现实，頗值得考虑。自然，也許作者会說，外国人初学文字不也是从学习手写体开始的么？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兩点：1）假定以草体字的基本形体如作者所說的作为“字母”来看，数量比外文字母多好几倍，而且形体有的过簡，有的过繁，不像外文字母那样繁簡适当；2）草体字的基本形体的組合情况远比外文字母之間的組合情况复杂。仅仅从这两点来看，一个初学者單从書写上掌握草体字的基本形体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三，作者認為草体字基本形体简化汉字偏旁的同化作用——若干原来不同的偏旁被草体字简化成一样的形体，是草体字在書写上的简化“規律”。可是这方面的規律到了閱讀的範圍里却变成了極大的缺点。这个缺点，恐怕每一个草体字書法家在閱讀自己手迹的时候都能体会出来。可以設想，把这样不便于閱讀的草体字基本形体在群众中去推广，是否

“定能得到欢迎”？

第四，作者也估計到草体字即使能够得到推行，也不可能馬上把宋体字全部廢除，而需要分期逐步实施。实际上問題不在于草体字是否能够推行和如何推行，而在于从現行简化字到汉语拼音文字的过程中，既要为实行拼音文字創造条件，又要大力进行草体字的推行，这是否必要。

最后，作者希望至少能公布草体化的手写体，希望不要再随意創造新簡字，这些建議是切合实际的。（張有一）

本期又發表了周迟明先生的《汉语的使动性 复式动词》，全文共分五节：一、汉语动词的特点；二、使动性复式动词的意义、性質、类别、范围；三、使动性复式动词的起原問題；四、使动性复式动词的历史發展情况；五、一个附帶問題。

作者認為汉语中有三种可分可合的复式动词：1）“出去、拿来、跑进、站拢、想起来、放下去”之类是“連动性复式动词”，2）“說明、喚醒、搞好、打断、用不着、办得了”之类是“使动性复式动词”，3）“当做、变为、化成、分作、合成为、轉变为”之类是“同动性复式动词”。本文專論使动性复式动词。作者对这个名称的解釋是：“大体說来，所謂使动性复式动词，就是由两个意义上互相关連的动词配合使用来表示一个整体活动的一种复音动词。这个整体的活动包含两个構成部分：用第一个構成部分的动词来表示活动，用第二个構成部分的动词来表示活动所产生或引起的效果”（190頁）。換言之，本文所討論的对象就是王力先生所說的“使成式”。不过王先生的使成式是就句子論，而周先生的使动性复式动词是就詞論。作者的主要意圖是在于說明这种复式动词的类别、范围和它們的起原、發展。至于为什么它們是复式动词而不是动补結構的詞組，实是汉语語法上一个饒有兴味的問題，呂叔湘、朱德熙兩先生亦尝及之（見《語法修辭講話》26頁），甚望作者再加論證。

这篇历史語法的論文是很見工力的：作者所搜集的材料非常丰富，排比归納也頗有条理，对使动性复式动词的合用式、分用式和附加部分（即詞嵌“得”和“不”）的發展情况的叙述也很清晰。但是作者在处理材料的方法上有两个傾向是值得商榷的。一是征引材料时的“以多取胜”——某一語法形式萌芽的时候，材料难得，往往每个例証都是宝贵的；但是当它成長以后，例証俯拾即是，就無須博引。本文引例似嫌过多，如魏晉以后合用式的例子中，第二構成部分为“杀”字的，就有“斫杀、看杀、刺杀、笑杀（2見）、槌杀、押杀、愁杀、冻杀、打杀、踏杀、忙杀、埋怨杀”十三个，实無必要。二是断定起原时的“喜早恶迟”——例如：1）作者引甲骨刻辞中“王正尸方”等“正”字六例，明知“正”就是“征”，但又設問：“‘正’字是‘征’字的同音假借呢？还是形容詞作为使动词用？”终于据孔穎达釋《尚書·胤征》的“征者正也”断定“使动用法在刻辞中已經存在”（200—201頁）。2）又引《尚書》“天用剿絕其命”（夏書，甘誓）、“其犹可扑灭”（商書，盤庚）等例，推測“使动性复式动词在殷代大概已經發生”（203—204頁）。3）又引“風飄蓬飞”（曹植，朔風詩）、“風吹窗簾动”（华山畿）等例說明兩汉以后分用式使动性复式动词中插入“兼語”所用的詞已扩充了范围，但是作者明知前例（按后例何独不然）“不大恰当”，因为“‘風飄’和‘蓬飞’也未尝不可以看做并列結構”（214頁），而又不肯割愛。4）又引“樓高望不見”（晉無名氏，西洲曲）等例推測，“不”字“用做使动性复式动词的詞嵌，大約起于兩晉时代”，但是作者明知沈德潛《古詩源》定这首詩为梁武帝所作，“时代当然还要后

移”(218頁)。5)又引“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窗而走”(世說新語,規箴篇)這個孤証推測詞嵌“得”字“用在合用式中,大概起于六朝”,但是作者明知從“劉宋直到唐末一個長時期內看不到一個同一類型的例子”,而偏要臆測“這一定是由於我沒有查到”(222—223頁)。其實這句“爭”下可逗,而“得”是動詞(比照:“得免、得赦”)。上述的情況可分兩類:一是例句本身似是而非的,一是作品年代可疑的。作者大都明知,而又故意瞞解。同時又因辨句不夠嚴謹,還無意中闖入了一些可疑的甚至無關的例子。如“亡走、摧折”(205頁)、會見、銷歇(206頁)、歇滅、靡滅(207頁)”,這些都未嘗不可以認作並列結構。又如“呂布刺董卓身死”、“汨添九曲黃河溢”(216頁),也恐非帶兼語的分用式使動性複式動詞。又如“直饒珠寶如山岳,遮不綰羅滿殿堂”(妙法蓮華經變文),作者引作分用式使動性複式動詞中加詞嵌“不”的例子,說“這句是‘綰羅遮不滿殿堂’的變式”(221頁)。按“遮不”當即“遮莫”,猶云“儘教”也,是從屬連詞,與“直饒”互文;兩句對仗甚工。《提季布變文》中有句云:“直饒墮却千金賞,遮莫高捷万槌銀。”可以參証。

此外還有些地方可以斟酌:

一、作者說:“也有一小部分的(按早期的例子中其實不在少數,)使動性複式動詞,凡是所以成為使動性複式動詞的條件已無不具備,但是實際上却常常不使用這兩個詞嵌(按指‘得’和‘不’)。譬如‘擴大、形成、証明、破壞、規定、修正、改良、革新’等等,明明都是使動性複式動詞,可是在書面上或口頭上却不易看到或聽到(按與上文措詞有出入)使用這兩個詞嵌的。這大概是習慣使然,有的也許由於上下兩個詞的意義搭配上(按此語費解,上文云“是由兩個意義上互相關連的動詞配合使用”,則此處“由於”下似脫“跟”字)。儘管這樣,它們使用這兩個詞嵌的可能性是依然存在的”(195頁)。可見“得、不”不是鑒定使動性複式動詞的必要條件(反之,188頁指出連動性複式動詞也可以加這兩個詞嵌)。但是接着又說,過去對於“決定”和“完成”不敢確定是使動性複式動詞,後來看到魯迅、茅盾的文章里有“決不定”,周恩來的報告中有“完不成”,才決定它們也是。而且認為“拿能不能用‘得’或‘不’作詞嵌或有沒有這種可能性作為衡量一個複音詞是不是使動性複式動詞的標準,是比較客觀的”(195頁)。“有沒有這種可能性”的說法是不切實際,難以憑信的,不免主觀上先認定它是使動性複式動詞,然後以為它有這種可能性。因此事實上只是用能不能加“得、不”當做主要的甚至必要的條件,從而否定了上文所謂“凡是成為使動性複式動詞的條件”。此則表現出邏輯上的不夠嚴密。若此“可能性”是指“發展上的可能性”,似亦當言明。

二、作者說:使動性複式動詞的第二構成部分是“表示那個活動所產生或引起的效果”的,而在解釋實例時又分做三種

說法:1)“看見、迷住、點破、說明”表示效果;2)抹殺、打死、擠到、殺盡、洗粗、跌倒、踏平、打跑、弄糟、睡着、偷光、笑掉”表示結果;3)“睜大、留定、傳遍、安好、過慣、猜透”表示效驗。三者區別何在,作者並未交代,我們也無從領悟;即使真能划分清楚,也不免過於著重了詞彙意義。

三、作者把“三十個例句中的使動性複式動詞(按論例句為三十,論動詞為三十一,漏列“蒸熟”)歸納起來”,分為三類:1)帶有賓語,整個動詞的動作不但及到賓語所代表的事物,而且還使它在性質上、數量上、形體上等等發生相應的變化的;2)帶有賓語,整個動詞的動作也及到賓語所代表的事物,但不管它會不會或者有沒有發生變化的;3)不帶賓語,整個動詞的動作不影響到別的事物的。所謂帶不帶賓語,應該是指這些動詞所在的具體的句子說的;但是檢查作者認為帶有賓語的26個例子,即使不排除“把”字句(包括王力先生的“處置式”和“繼事式”)中的受事者,竟然有12個是不帶賓語的,因為受事者作了被動句或主動句的主語。要是離開具體的句子,單就它們有沒有帶賓語的能力來說,那末何以“急坏”能帶賓語,而“累坏”却又不能?這是一。一、二兩類的解說也是難以理解的,為什麼“打死”的動作使賓語所代表的事物發生相應的變化,而“殺盡”的動作對事物會不會或者有沒有發生變化却是不管的?“老头子已經點破了題”的“點破”對“題”的變化是不管的,然則“戳破了紙老虎”的“戳破”對“紙老虎”的變化又如何?這是二。作者說:“若應用語法上的術語來說明,那末第一第二兩類可以合稱為‘及物的使動性複式動詞’;第三類就可稱為‘不及物的使動性複式動詞’”(194頁)。由此可見,一、二兩類的區分,從語法的角度來看是既不合理也無必要的。

四、作者統計現代漢語中使成性複式動詞的第二構成部分的頻率,它們跟每個動詞(少數是形容詞)結合的重複次數都是一起計算的。因此跟“見”字結合的詞只有13個,而頻率為527,反之,跟“完、好”結合的詞幾乎不可勝數,而頻率為141與114;跟“强”字結合的恐怕只有“加、增”等幾個字,而頻率為98;反之,跟“掉”字結合的詞一口气能數上二三十,而頻率為54。由此可見,統計時不扣除重複數字,對於了解它們的結合能力(從複式動詞的角度看是構詞能力)是沒有意義的。

五、作者也把“春風細雨霑衣溼”的“衣”字之類稱作“兼語”,而對於“兼語”的解釋也是同時擔任賓語和主語兩種職務。這個名稱和解釋,對於“複式動詞說”是很不適宜的,因為一個實詞不能同時是一個動詞的賓語和主語。如果必須區別於“目連剃除髮鬚了”的“髮鬚”之類,不妨一起稱作賓語,然後划分兩個小類。

至於這篇論文的工力和成績,上文已經提到。我們指出一些缺點,無非是求全責備,希望作者更進一步。(蕭父)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舉行座談會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於5月16日、20日、27日在北京連續舉行關於文字改革問題的座談會,廣泛征求對文字改革方針、簡化漢字及文改會工作方面的意見。先後應邀到會的有:唐蘭、錢文浩、翦伯贊、茅以升、翁文灝、周亞衛、陳夢家、李長之、俞平伯、張德慶、蕭璋、胡庶華、陶坤、曾世英、袁翰青、梁思成、鄭振鐸、楊晦、傅東華、王伯祥、艾青、陳定民、楚圖南、江超西、袁家驊、葛洛、謝無量等;此外應邀的還有北京各報社、各語文雜誌社和新华社的記者。本刊許多編委也出席了座談會。

會上對文字改革方針的意見大別為三類:1)完全同意漢語拼音化,2)同意拼音化,但是應照顧到民族形式,3)反對拼音化。發言中對漢字簡化工作和文字改革委員會其他工作中的缺點也提出了批評。

座談會將繼續舉行。發言記錄由文改會整理後將印成單行本公開發售。(潘慎)



也談关于介詞結構作謂語

史振嘩

关于“介詞結構作謂語”的問題，最近《中国語文》上有兩篇文章提出了相反的看法。黎錦熙、刘世儒兩位先生認為“這間屋子朝南”里的“朝”是動詞，不是介詞，并且說初中課本《漢語》把“朝南”解作介詞結構作謂語，是“拘泥了‘朝’字只算介詞，不再是動詞，機械地比附外國語”（見本刊1957年2月號16頁）。梁吟先生不同意這個說法。他認為“少數介詞結構可以作謂語”，“朝”不能是動詞（見本刊1957年3月號6頁）。他的主要論點有二。

第一個論點是：就詞法而論，不把“朝”處理為動詞、介詞兩屬，“那是為了照顧到動詞的語法特點之一：能夠用肯定否定相連的方式表示疑問，如‘他在不在？’——‘在’或‘不在’。‘朝’不具備這個語法特點，在問句和答句中都不能單獨作謂語，因此只能說‘這間房子朝（南）不朝南？’——‘朝南’或‘不朝南’。要是兼屬動詞和介詞，那末在動詞的這一語法特點中就有了例外。”

但是只拿這一個語法特點來斷定“朝”不能作動詞，是說不過去的。因為動詞對賓語有很大的依賴性時，往往不能用肯定否定相連的方式表示疑問。例如“着迷”的“着”和“失火”的“失”，都不能說成“他着不（沒）着”和“這工廠失不（沒）失”的問句。若依上述的標準，“着”和“失”豈非也成了介詞！而且梁先生在拿動詞的這個語法特點做標準的時候，卻忘了動詞的另一個重要的語法特點：“能夠帶上‘着、了、過’這些時態助詞表示一些附加的意義”（《漢語》課本第三冊，51頁）。介詞則不能加“着、了、過”等表示變化（《漢語》課本第三冊，115頁）。然而“朝”作謂語時是可以加“着、了、過”表示時態的。例如：

風向標的箭頭正朝着南呢。

風向標的箭頭已經朝了南。

這家的大門從前朝過南，後來改得朝了北。

若說這種用法的“朝”仍是介詞，豈不是承認介詞也有可以加“着、了、過”表示時態的語法特點，而又增添一個例外嗎？

梁先生的第二個論點是：就句法論，“有兩個事物的動句……一般都可以有三種平行的句式：‘他不喝茶：茶他不喝：他茶也不喝’；‘他不坐汽車：汽車他不坐：他汽車也不坐’。但是‘這間屋子（不）朝南’的朝永遠離不開南”，所以不可能說成“南這間屋子不朝”，“這間屋子南也不朝”。

但是用“動句的三種句式”也不能說明“朝”不能做動詞。且看“他沒（不）着迷”，能有“迷他沒（不）着”、“他迷也沒（不）着”的句式嗎？“這工廠沒（不）失火”，能有“火這工廠沒（不）失”、“這工廠火也沒（不）失”的句式嗎？“他不（沒）在場”（梁先生承認這“在”是動詞），能有“場他不（沒）在”、“他場也不（沒）在”的句式嗎？那末，這裡的“着、失、在”也該算介詞嗎？而且《漢語》課本所舉的另外一個“介詞結構作謂語”的例子“你往東，我往西”，却偏偏能有這三種句式，例如：

你不往東，不往西，要到哪兒去呢？

東你不往，西你也不往，要到哪兒去呢？

你東也不往，西也不往，要到哪兒去呢？

這又怎樣解釋呢？可見這個“句法特點”並不足以決定“朝”不能是動詞，“朝南”的“朝”做動詞也並沒給句法增添例外。

當然，對於區分詞類來說，語法特點是很重要的；不過更應該注意到什麼是語法特點和怎樣全面地掌握語法特點。

一封討論文字改革的信

〔編者按〕本刊收到陳夢家先生轉來關錫同志給他的信，現在把這信和陳先生的答復一同發表如下：

陳夢家先生：

您在二月四日光明日報上發表的《略論文字學》一篇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我很同意您的看法。我對語言文字沒有什麼研究，但是我非常關心祖國的文化，對文字改革一事曾作些粗淺的研究分析。現在，我想通過通信的方式來討論這個問題。

先談談我對文字改革（指拼音化）的看法。我認為漢字完全沒有拼音的必要，它利益很小很小，害處很大很大。您不是在文章里說過“用了三千多年的漢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道路，一定有它的客觀原因”嗎？是的，確有它的客觀原因。並且它的原因很多很重要。主要是方塊漢字符合漢語的條件，拼音文字絕不符合我們的語言。請看：漢語沒有象歐美諸國語尾變化的，它們的單語里有許多的實際發音的子音成分，我統計過一本英語字典，有單獨發音的子音的語數占百分之七十四，每單語中有子音一個至四個，完全無子音的字占百分之二十六。所以西語非用拼音字不可，漢語則無此類現象。西語音節相距時間不定，而日語每個音節幾乎是有節奏地均勻地一個連一個。西語拼音文字結合狀態是不固定的，是變化的。漢語怎麼樣呢？字母結合狀態祇有四百來種，費了許多事把漢語分析成“音素文字”，結果仍是固定地結合起來。人們費了許多事學會了拼音的規矩，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請看，這還叫什麼“拼音文字”呢？用這四百來個字（打字、印刷將把每個音節的字母固定起來，以便打、排）來代替所有的漢字能有好處嗎？

拼音字雖好學，但用它來學知識就難了。漢字同音字太多（不是同音詞的問題），僅表音不表意的字是難懂的。它如果是我們知識範圍內的詞，那我們還能容易懂，如是生疏的事物，那可就難猜了。即使有上下文聯系，亦不能完全猜着。就拿各高等學校各專業各科課程來說吧，它的新詞（這些詞都是用幾個有意義的字組成的）也不知有多少，如不用“望文生義”的漢字，那真是不堪設想了。拼音字在孤立的情形下更是麻煩了，上書店看不懂書脊上的書名，劇院、電影院掛的新劇名看不懂，報紙上的圖書目錄和其它廣告以及標題都不容易一望而知。總而言之，拼音字是好學不好懂，漢字是不好學可好懂。我們還要注意一樣事，人一生學字的時間很短，用字的時

間很長，所以即使汉字难学也要用的。何况汉字并不是象有些人宣傳的那樣难学，誰沒从学字的阶段經過呢？我們并没受到那些“苦头”。再看看小学生，每天可以說淨玩，看不出他們因学汉字而費了額外多的時間和腦力而苦惱。

方塊汉字不能应用現代科学技术，也是主張文字改革的重要理由。但这已不成理由了，邮电部已經試制成功中文电傳打字机，可以直接用汉字打电报。汉字排鑄机国内已有数处試制，去年在北京、上海展出的“日本商品展覽会”中有电气自动排鑄机。去年《科学画报》九月号曾报导了上海大威电机厂制成快速的中文打字机，比万能式快三倍，体輕小，成本賤一半。

積極主張文字改革的一些同志，大力宣傳工农兵群众都贊成文字改革，实际并不这样，只要相近的朋友同志之間說起来时，几乎是人人反对。可是大力宣傳說是群众一致拥护文字改革的結果，把毛主席也迷惑了，所以毛主席在1951年对馬叙倫先生談話時曾說过：“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有人借此更大事宣傳起来，实际毛主席是为了符合群众的意見而說此話，但群众并不是贊成文字改革。何况毛主席不是語言文字学專家，对此不可能一点不中肯的地方也沒有。

“改革”就是象征进步，反对改革就是落后、保守，人們多半有此錯覺。于是人們对文字改革虽有意見，但不敢公开表示出来。我認为这是对祖国不負責的态度。一个真正爱国者应当打破这种陈旧的观点，至于“順大坡”也跟着贊成文字改革，也可以說是一种市儈行为。在“百家爭鳴”的号召下，关心祖国文化教育的人們，應該積極提出久鬱未發的意見。以使祖国的文化能够避免走向黑暗之途。

汉语不应拼音化的理由很多，在此不能詳談，以后我打算写一篇反对文字改革的文章。

現在再談談汉字簡化的問題。誠然象您所說：“現在頒布的簡体字，在公布前所作的討論是不够充分的，日常听到許多意見。”現在頒布的簡字中，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也实在多。它的坏影响很大。我对簡体字的意見也是有的，我曾写了一万余字的文章，但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同志們并不接受正确的意見，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汉字的簡化是为了初学汉字的人“好学”呢？还是为了已經掌握汉字的人的“好写”呢？这是汉字簡化的關鍵問題，对此应有明确的認識和措施。

这應該肯定的說，汉字簡化是为了初学字的人而簡化，至于已經掌握了汉字的人，不用文改会頒布簡化汉字，他們在写字时，根本就写簡体字甚至行書、草書。所以汉字簡化对已掌握汉字的人們來說意义是不大的。

但是文改会并未照这个原則办事，仅仅是为了簡化而簡化，單純地把汉字笔划减少了而已，所以这个工作变得不理想了。甚至比原来汉字难学难認了。

形声字是很好学很好懂的文字，如按这个方向把汉字改进一下，对扫盲和初入学的小学生來說是有莫大好处的（但是汉字如果好学了，文字改革的理由就要破产，主張文字改革的人当然不願来破坏自己所坚持的理由）。但是許多簡体字把音符破坏了，例如，盘、际、标、烛、时、疔、队、框……虽然笔划少，但初学者却要增加負担，不能按已会的音符讀出音来。傳統的簡字是为“好写”而創造的，如当作“正字”就不合格了，所

以根据“約定俗成”的簡字作正式文字是不恰当的。

簡化后造成文字的混乱，不是同音的字，但它的声符相同，这对初学者真是絆脚石。如“队臥”、“击陆”、“关郑联”、“兴举誉”、“乱辞敌适”、“办苏协”、“这刘”、“区风冈”、“头买卖实”、“称弥”……，这种現象是很不好的。但是你如果向文改会提出这种問題时，他們会举出“酸、饒、駿、梭”的例子来証明汉字自来就有这种現象。我們真不明白現在費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来作汉字簡化的工作，是要使汉字改进呢，还是要使汉字惡化呢？为什么不向汉字的优点看齐，而偏要向它的缺点看齐呢？

至于“层尝坛运动会”、“难观鸡对树戏仅邓风赵”中的“云”“又”代替了那么多的偏旁，这使初学者就得一个个死記啦。这种例子更是不合理的。

現在这些簡体字作正式文字用时，确存在一些严重的問題，原因是現在的簡化工作沒照顧到初学的人。原来的汉字也确存在許多缺点，应当通过此次簡化，使汉字进一步合理化。

汉字簡化工作仍在进行，国内的文字学家以及关心祖国文化的人們應該積極提出意見，想出妥善办法，以使汉字簡化工作能够作得好些。那些認为汉字是临时性的文字，不久就要被拼音字所代替，于是对汉字簡化工作不認真，不作長远打算，不为初学者着想的作法是完全錯誤的。我們不要求完全合乎“六書”的原則，但为了尽量使文字好認、好懂，在學習时实际上不但不增加負担，倒反能帮助學習的。

要談的話虽然很多，但字已經写了不少了。我說的不一定正确，我希望能得到陈先生的指正。

此致

敬礼

关錫 1957.2.22

[附記]我在二月底收到《光明日报》这封信，寄信人特别声明，不要將此信轉給文改会或《中国語文》，以为这是白費。这原于寄信人曾經有过这样的經驗。我認为，信中所涉及的，是一个普通的人对于文字改革的意見，至少是真诚的，更何况也有不少对的地方，《中国語文》就應該赶快登載这类群众的意見。群众对于語文的知識，可以是不高明的，但不能說成是幼稚的。可以是不很正确的，但不一定像專家那末有成見——那些可能是对的成見，也可能是極錯誤的成見。文字改革是一切使用漢字的人的事，群众都有說話的权利；他們說的話可以是不在行的，但不一定都是錯的，我們办刊物的人就應該尽量早登快登。群众是刊物讀者的絕大多数，他們比少数的“專家”更有权用此刊物园地發表反对或怀疑的意見。倘使我也在刊物編者的心目中当作一个“專家”，那么我願意負責推荐这篇平常的通信。这篇通信当中，倘使有些不高明的幼稚的成分在內，还是值得讀者和“專家”們深思的，尤其值得我們当編輯的深思的，我們应当主动的爭取讀者的来信，参加这项討論。

这封信，我托人轉交《中国語文》，由于許多編者轉来轉去“审閱”，延誤了許久，我对写信人表示歉意。但編者先生們同意發表此信，我表示欣慰。我自己也是一个群众，十分贊成这篇通信中的精神。这就是我对于写信人的答复。

陈夢家 五月廿四日

海南方言中同义字的“訓讀”現象

詹伯慧

海南島上的汉族人民，絕大多數操一種屬於閩南話系統的方言。这种方言在詞彙上有一点很特別的地方，这就是同义字的“訓讀”（姑且这么称呼）現象，这种現象不仅在其它汉语方言中少见（不是沒有），就是跟閩語系統的其它方言比較，也是很突出的。

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些在意义上有关連的語詞（广义的同义词），在現代海南方言中，只保留了其中的一个語音，其余的一个（或更多）已經失去了它本身的語音。这样，就令人感到这几个語詞在口头上已經不能分別，而是“合而为一”了。可是，在書面語言中，当你不是用嘴說而是用笔写的时候，这几个不同的詞却又恢复了它們各自的面貌。在海南人的心目中，这些有关的概念听起来的时候，它們只能有唯一的音；可是，写成文字的时候，它們却又應該各就其位。

例如“懂”跟“識”这两个字，海南人全都唸 bak¹，就連“知識分子”也唸成 tai¹ bak¹ hun¹ tsi¹ 了。可是，如果写成文字，就絕不会有人把“知識分子”誤写成为“知懂分子”。

类似的情形不少，下面再举几个例子来看看：

“看見”唸作 mo¹ ki¹，跟“望見”同音，写起字来，“看見”仍是“看見”，“望見”仍是“望見”，不会混淆。“下雨”唸作 lo¹ t¹ hou¹，跟“落雨”同音，写起字来，“下”跟“落”是不会相混的。“兄”唸作 ko¹，跟“哥”同音，但“兄弟”不会誤写成“哥弟”。“晚”唸作 am¹，跟“暗”同音，但“今晚”不会誤写成“今暗”。“黑”唸作 ou¹，跟“烏”同音，但“黑暗”不会誤写成“烏暗”。“思”唸作 tio¹，跟“想”同音，但“意思”不会誤写成“意想”。“細”唸作 iu¹，跟“幼”同音，但“細小”不会誤写成“幼小”。“即”唸作 tsiu¹，跟“就”同音，但“立即”不会誤写成“立就”。更奇怪的是“不”“沒”“無”“否”这几个否定詞一律唸作 bo¹。“沒有”是 bo¹ ju¹，“不去”是 bo¹ hu¹，“有無”是 u¹ bo¹，“去否”是 hu¹ bo¹。尽管如此，写成文字彼此还是涇渭分明的。

大家都知道，汉语中有不少同音詞，这些同音詞也是兩個不同的字同讀一个音的。可是，同音詞之所以同音，可以說完全是偶然的，它們往往是几个在意义上風馬牛不相及的詞，仅仅在語音上偶然一致罢了。这跟上述海南方言中的“訓讀”現象显然不同。

海南方言这种“訓讀”的現象如何产生的呢？我想可以这样解釋：在詞彙發展的过程中，意义上有关連的某些語詞，其中有一个在口語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这一个詞往往是比较后起的），以至于最后把另一个詞从口語中排挤出去。这时候实际上，在口头上已經只有一个詞了，自然只有一种讀音。可是，另一方面，在書面語言中，这个在口头上被淘汰了的詞却借着汉字非拼音的特点而保留了下来，繼續在書面上使用。这样，在書面語言全国力求統一的情况下，当海南人在書面上遇見这些在他們口头上已經失去地位的語詞时，就只好用那个在口头上占有地位的詞的讀音来讀它了。結果就形成了上面所說的这种情况。

每册定价人民幣 0.24 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本刊上期 5 月 22 日出版

中國語文

月刊

1957 年 6 月号

总第 60 期

1957 年 6 月 22 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员会
北京海甸中关村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 45 号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總發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代訂代銷处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預定：三个月 0.72 元，半年 1.44 元，全年 2.88 元；寄費：1. 平郵寄費不計，2. 挂號郵費由訂戶負擔。

1—29,402 册